

I N A D I F F E R E N T V O I C E



国 家 “ 九 五 ” 重 点 图 书

不同的声音

〔美〕卡罗尔·吉利根 著

肖巍 译

——
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

中央编译出版社

新世纪学术译丛

不同的声音



新世纪学术译丛

ISBN 7-80109-302-X



9 787801 093028 >

ISBN 7-80109-302-X/C · 44 定价: 19.80元

〔美〕卡罗尔·吉利根 著

不同的声音

——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

[美]卡罗尔·吉利根 著

肖 巍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97-0712

copyright © 1982, 1993 by Carol Gilliga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本书中文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授予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未经许可,不得复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美)吉利根(Gilligan, C.)著;肖巍译.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12

书名原文:In A Different Voice

ISBN 7-80109-302-X

I.不…

II.吉… ②肖…

III.妇女心理学

IV. B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3094 号

不同的声音

卡罗尔·吉利根 著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117130(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170 千字

印 张:7.625

版 次:1999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6000 册

定 价:19.80 元

译者前言

卡罗尔·吉利根现为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本书是她的代表作,198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至1993年已陆续出了32版,发行50余万册,在西方世界被视为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经典著作。在1986-1991年的《社会科学和科学引用索引》中,本书出现了1100余次。1994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津哲学辞典》也把它称作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中有影响、有争议的著作。美国《华盛顿邮报》写道:“对于我们中那些寻求更好地理解男女两性在公共和个人生活问题上的思考方式,以及男女两性价值观差异的人们,(这本书)是至关重要的。”《纽约时代书评》也写道:“道德发展的理论并不是纯粹抽象的。它们关系到作为个人和

政治斗争武器的抚养子女的方式,以及男女两性的自尊,这就是卡罗尔·吉利根的著作为什么有意义的原因。”

在翻译过程中,我一直屏息凝神地与作者进行无声的对话,我渴望知道她究竟在讲什么,为什么这样一本书在西方社会有50多万的读者,他们从这本书中读出了什么?通览全书,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同的声音”意味着对于人们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男女两性与子女关系的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作者涉猎了心理学、伦理学、文学等领域,结合对于男女发展,尤其是对于女性道德发展的经验研究把这种“不同”与男女的声音结合在一起。本书建立在三种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大学生研究,流产决定研究以及权利与责任研究。在研究中,吉利根通过访谈的方式考察人们的自我概念和道德概念,考察他们对道德冲突和道德选择的体验,让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循着这些声音去描绘女性心理和道德发展的轨迹。当这些“不同的声音”回荡在心理学、伦理学、道德教育以及妇女研究等领域时,人们便似乎有了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法国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家露丝·依利格瑞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两性差别即使算不上最热门的话题,也肯定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按海德格尔的说法,每个时代的人都会热衷于探讨一个问题,而且仅仅是一个。对性别差异的研究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从理智上获得拯救的关键课题。”^[1]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以性别视角研究伦理学在西方社会已成为一种时尚。道德是否可以性别化?男女之间是否有着不同的道德原则和评价标准?道德与性别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些问题愈发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回顾历史,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在道德上把男

女两性区别开来,并且对女性的本质和美德作了详尽的论述。他认为,“男人和女人共同的地方在于他们都具有人类的特点,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性。”“我们用不着争论到底是男性优于女性,还是女性优于男性,或者两种性别是相等的,因为,每一种性别的人在按照他或她特有的方向奔赴大自然的目的时,要是同另一种性别的人再相象一点的话,那反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完善了。”^[2]他由此主张女性的美德是在婚姻内对男性的依附和顺从,一个独立的、以家庭幸福之外为追求目标的女性就是丢掉了自己可贵的美德。男性的美德是自主、自决、坚忍和独立,而女性则应学习服从、温顺、谦卑和贞洁。18、19世纪的女性主义者对卢梭的这种观点持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的主要代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批评了卢梭把德性性别化的观点,认为道德对男女两性意味着同一个东西,人们强调的女性美德实际上是以女性的服从以及作为人的尊严的损害为前提的。“我否认美德有性别之分,就连端庄谦逊也不例外。”^[3]因此,“沃斯通克拉夫特得出结论说,对妇女来说,自己被视为道德的最便捷的途径便是成为‘男人’,即表现出通常与男人联系在一起的心理特性。”^[4]然而,19世纪的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不仅存在着女性美德,而且这些美德要优于男性,社会解放必须通过妇女在道德上的影响来完成。

20世纪的一些女性主义者也承认女性在道德上的差别,并且试图重新解释女性美德,把它们作为争取男女平等运动的基础。例如,在争取妇女选举权问题上,这些人主张男性的本质和心理特性是侵略和破坏,他们创造了暴力、战争和对资本的垄断,女性的本质和美德是关怀、有教养和富有同情心,因此社会的和平稳定本身就要求妇女来参政。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一

些西方学者从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承认男女两性的差别入手,以对道德发生的认识论研究,以及对女性道德发展的经验研究为基础分析道德与性别的关系,把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和具体。

吉利根曾明确地表示,“我描述的不同声音并非是以性别,而是以主题为特征的。它与妇女的结合是一种经验上的观察,我主要通过妇女的声音来追溯不同声音的发展。但是,这种结合并不是绝对的,这里作出的男女声音的对比强调了两种思考方式的差异,集中于解释问题而并不表明对任一性别的概括。”^[5]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从“不同的声音”与女性经验的联系中,从吉利根对于与劳伦斯·柯尔伯格“三水平六阶段”道德发展模式不同的女性道德发展的建构中,看出她在道德与性别关系问题上的颇有震撼力的回答。事实上,人们已经无法把吉利根的理论同性别割裂开来,这正如琼·C·特朗托分析的那样,“虽然吉利根从未明确宣称自己研究的不同声音是性别化了的的声音,但是人们通常从她的争辩中读出对于性别差异的描述。”^[6]无疑地,在性别上把道德区分开来等于步入了雷区,因为人们首先就要发问:男女两性在道德发展上的不同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如果说是由生物因素决定的,这无疑犯了女性主义者极力批判的性别本质论的错误,即认为女性生来具有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感情型、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性别特征,这些也恰好是历史上妇女受压迫的根据。如果说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那么吉利根所发现的差异便是各种社会因素的差异,包括了文化、种族、阶级等因素,所以她对一小部分白人妇女的抽样研究仅仅具有此时此地的作为一个点的意义,很难具有普遍性。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不得不提及,如果强调差异的社会意义,

那么就必须在社会历史中看待女性的道德发展,既然以往的社会是男权的社会,女性在这样的社会里形成的道德发展的特点无疑打上了男权的烙印,我们再以这些特点为妇女解放呐喊,是否有利用男权下的女性“缺点”来争取男女平等之嫌?

或许是想避开这种争论,吉利根有意限定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宣布男女两性的差异是自然的还是教养的,妇女优于男人还是反之,以及男女是否的确不同,或者何者是更好的问题并不属于自己研究的范围,而“我的问题是,我们对于现实和真理的知觉:我们如何去认识,我们如何去听,我们如何去看以及我们如何去讲。我的问题是关于声音和关系的问题。我的问题关系到心理过程和理论,尤为关系到男性体验代表了整个人类体验的理论——使妇女生活黯然失色以及使她们保持沉默的理论。”^[7]由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吉利根是从发现和表达女性的声音入手,在心理学领域研究女性的道德发展,但她的研究目的却试图超越男女在道德上的二元对立,进入一个融合阴阳两性的伦理世界。我们或许还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她只是描述了女性的声音和道德发展是什么的问题,而无意于解释为什么的问题。她为许多问题的回答保留了空间,“对于所描述的不同起源,对于它们跨越时代和文化,在更广泛的人们当中的体现,我并没有作出陈述。显然,这些不同来自把社会地位和权力因素,与生殖生物学结合起来所形成的男女体验以及两性之间关系的社会背景。我的兴趣在于体验与思考的相互作用,在于声音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话,在于我们倾听自己和他人的方式,在于我们讲述的关于自己生活的故事。”^[8]尽管她作出了种种努力避免人们对自己的误解,然而事实却是:不论她如何进行申辩,不论她是否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或者是如何进行回答,

她都无法使自己逃脱被争论、被褒贬、被误解、被评头品足的命运，这仅仅是由于她已经步入了雷区。

伦理学重视的是关系，因此如何界定，如何说明、如何建立、如何维系伦理关系就成为伦理学家着重思考的问题。通常在人文科学中，在澄清一种关系时总是先建构一个“我”，再有一个与我相对的另一方，这就涉及到一个方法论问题，即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去定义“我”和“关系”。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 K.J. 沃伦认为，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联系最终是概念的联系，它植根于家长制的概念框架。这种概念框架有三个重要特征：1、价值等级思维，认为处于等级结构上层的价值要优于下层的价值；2、价值二元对立，把事物分成相互对立排斥的双方，使其中的一方比另一方有更高的价值；3、统治逻辑，即对于任何 X 和 Y，若 X 价值高于 Y，则 X 支配 Y 被认为是正当的。尽管我们无法苟同这种观点把客观存在的关系最终归结为黑格尔式的概念结构，但它所揭示的关系定义中的价值观问题却很有见地。在西方女性主义者看来，西方文化沿袭的是一种父权制传统，以这种文化传统说明男女之间的伦理关系必然导致对妇女的剥削压迫，这既是人类历史上的错误，又是哲学伦理学理论中的误区。既然女性一直是这种历史和理论错误的受害者，她们就有理由反对和消除这种剥削压迫。

吉利根的理论也具有这样的革命意义，她认为以往人们对自我和关系的界定仅仅采取了一种方式——以男性为主体的界定，并把男性的自我和关系当成整个人类的自我和关系，而她却开始听出不同的声音，即谈论道德问题的两种方式，描述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两种方式。在吉利根看来，道德问题说到底是人类的关系问题，而关系需要联系。它不仅依赖于移情或倾听他人，

学习他人的语言,采纳他人观点的能力,也取决于有一种声音和语言。以往的人们,无论男女在谈论这种关系时都犯了错误。男人们认为,如果他们遵循苏格拉底的箴言认识了自己,他们也将认识妇女,妇女则认为,只有在认识他人的情况下,她们才能逐渐地认识自己。因此,男女在策略上的不谋而合不仅使妇女无法表达自己对关系的体验,也围绕着一方的沉默建立起了关系——男人不知道自己已同妇女失去联系,妇女也不知道已同自身失去联系。吉利根所完成的工作是以女性的体验为基础建立起一种关怀伦理学,让人们听到女性对自我和关系的描述,但是,她并不想打破代表父权制的公正伦理,而是寻求用关怀伦理来修正和补充它。尽管如此,关怀伦理学理论的建立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其实每一个生命都需要关怀”。从作为个体的人来讲,每个人一生中都离不开关怀和被关怀。从作为类的人来说,如果失去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人类就无法生存和延续下去。因此,“如果道德哲学关心人们生活的幸福,我们就有理由期望关怀在道德理论中拥有重要的意义。”^[9]同时,关怀伦理学也是对西方社会以男性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伦理学和心理学传统的挑战;是对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决定的公正伦理盈天下所造成的紧张伦理关系的缓和;是对西方心理学理论中仅仅强调攻击性、分离和防御性,西方伦理学理论中仅仅强调自我和个人权利,忽视人们之间的关系、关怀和情感,贬低女性价值的批评、纠正和补充。

在与吉利根的交流中,还有一点令我感到欣慰,自己最初完全是出于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兴趣翻译这本书的,随着工作的进展,我越发地看到一片更广阔的蓝天,极目望去,我似乎已经不

再在乎或关注女性主义理论本身讲了一些什么内容,而是看到人性研究的一片更开阔的地带——从最初以对男性的研究代替对人性的研究;女性主义者了解自己的迫切愿望,对研究女性意义的强调以及对关系的探索;最终人类在充分理解两性基础上的互动……。我也看到进行关怀伦理教育,培养人的基本道德素质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人类的发展总要把上一代人的品德风范传递下去,无论意识形态的特点如何,道德教育工作都为培养下一代所必需。道德教育并不是某一个社会和文化特有的现象,因而学习和借鉴西方的道德教育思路和方法就显得十分必要。道德教育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是一个过程性的研究。我们从对吉利根阅读中可以看到西方社会的道德教育是如何进行的,看到它如何结合心理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等学科一并成为一项全社会的系统工程。道德价值观的培养,道德教育的前提是把握个体道德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因此吉利根对女性道德发展的研究很值得我们借鉴。同时,从现实的应用来看,吉利根开创的“关怀伦理学”也具有跨文化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我国的一些教育工作者已经注意到“关心”教育问题,针对我们目前特有的独生子女现象,开始呼吁“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学会关心的时代”,一些中小学也把这种教育摆上日程。我们没有必要接受西方社会道德教育的全部内容,但我们大有必要学习别人的方法和长处,在他人的启发下走出自己的道路。当今的时代是一个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不断分化和交融的时代,我国的道德教育虽然一直得到全社会的关注,但成效却不尽人意,这同我们的学科分工过细,一直过于关注群体的道德发展,对于个体道德的发展规律、过程和特点缺乏系统的跨学科研究有关。如果把目前在心理学、伦理学和教育学中对于道德教育的研究融为

一体,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乃至整个社会系统地把握,研究出适合中国国情和青少年特点的道德发展规律,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便会获得最坚实的根基——每个公民的道德素质。当然,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对一代一代人的发展去追溯、去观察、去分析,甚至无法在一代研究者的有生之年总结出一代人的道德发展规律,但只要我们今天从事了这项事业,接力棒就一定会传下去,后人一定会做得更好。

走笔于此,吉利根理论的女性主义长裙似乎飘然而去,但我却有一种自信——女性主义理论的意义或许原本就不该属于女性主义本身。

在这里,我并不想对吉利根的这本著作过多的评论,唯恐这样做会肢解她的理论。本书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角度,供各种人去阅读,每个人或许都能从中读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东西。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还是一个正在成长着的孩子,对一个偌大的世界充满着好奇和兴趣,她的内心交织着无数的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渴望,对未来满怀憧憬。匆匆而过的世人也越来越多地驻足察看这个孩子的成长,设想她的未来。我们对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刚刚起步,对这一理论的分析 and 评价来日方长,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一篇介绍性的序言,权作一个有幸先行的读者的一些不成熟的感想。

1997年5月于北京万寿寺

注 释

- [1]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72 页。
- [2]卢梭:《爱弥儿》,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527 页。
- [3]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63 页。
- [4] Rosemarie Tong: *Feminine and Feminist Ethics*,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P34。
- [5], [7], [8] 参见本书第 37 页,第 15 页,第 37 页。
- [6], [9] Joan C. Tronto: *Moral Boundaries*,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Inc. 1993, P82, P125。

1993 年版致读者

我是在 70 年代早期妇女运动再度崛起时开始写作《不同的声音》的。现在当我谈起 1970 年春天的情况时，大学生是不相信的。当时反对越战的示威运动正处于高潮时期，在肯特州立大学学生遭到国民警卫军枪击后，哈佛的结业考试被取消了，也没有举行毕业典礼。大学一度陷于瘫痪，知识基础开始受到重新审查。

1973 年，在美国最高法院通过“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使流产合法化之后，人们同样提出了妇女与男人、孩子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最高法院使妇女的自我表达合法化，使她们的声音在负有生死责任的复杂关系问题上起着决定作用时，许多妇女开始意识到一种妨碍自

己讲话能力的内在声音的力量。这种内在的或者内在化了的的声音告诫妇女,在这种关系问题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是“自私的”,或许她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欲望的东西,或许自己的体验无法为对于去做什么事情的思考提供一种可靠指导。妇女经常感到,说出甚至知道自己欲望的或者思考的东西是危险的——这扰乱了他人,因此会有一种随之而来的被抛弃、被报复的威胁。在我的研究背景下,在与妇女遵循保密协定的交谈中,在通常的权威形象由于我逐渐地熟识她们而被推翻的情况下,许多妇女实际上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而且在通常是痛苦的和困难的处境中,也知道自己所思考的将是最好的抉择。然而,许多妇女担心如果自己说出来,其他人会谴责或伤害自己,担心其他人不会倾听或者理解,担心讲出来只会带来进一步的困惑,因此最好是为了显示出“无私”而放弃自己的声音,保持住和平。

“如果我为自己讲话,”一天一个研究生在口试时对我说,然后便不讲了。听到这种游离的声音——她本人与正在说出来的话语的分离,她开始去探讨自己与说出来的和没有说出来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她正在为谁讲话,她与自己的关联在哪里?作为“罗诉韦德案”判决的直接后果,许多妇女对“家庭中天使”的道德(诗人巴特摩尔使这种 19 世纪的女性美德偶像流芳百世)公开提出质疑:妇女的言行仅仅是为了他人?当妇女通过体验关系中沉默的结果,发现无私行为所导致的麻烦之后,她们开始把“天使”道德揭露为一种不道德:它放弃了声音,摆脱了责任和关系。天使的声音是通过妇女躯体讲出来的维多利亚式男人的声音。V. 伍尔夫(Virginia Woolf)认识到,如果自己开始写作让妇女认识到有必要消除虚假的女性声音,以便为自己说话,那么就必须扼制住这个“天使”。

我感兴趣的正是这种说出来的选择。妇女从为了保持“关系”而作出无私表现中所察觉到的问题,对于释放她们的声音至关重要,并使人们有可能听到妇女认识到的东西。这似乎是穿透问题的表层来探寻人类对话的潜流:人们认识到的、尚未认识到的东西,感觉到的但没有表达出来的东西。妇女作出不讲出来的选择,或者更确切地说使自己同正在讲出来的东西分离开来,这或是深思熟虑的或是漫不经心的,或是有意的选择或是由身体迫使的——通过限制把声音同音域和发声联系起来的通道,通过在头脑中保持声音的高度以使它不去表达人们深层的情感或把情感和思想混合起来,或者是通过改变声音,把它变为一种更具有防范性的、非人格化的表达或者语调。选择不说出来通常是善意的和出于保护心理的,出于关心人们的情感,以及认识到自己和他人生活现实的动机。许多妇女还通过限制自己的声音,有意和无意地使一种男人声音的文明永久化,使一种基于同妇女分离的生活秩序永久化。

从E.埃里克森(Erik Erikson)那里,我学到了人们的生活不能脱离历史,生活的历史与历史学、心理学、政治学根深蒂固地缠绕在一起。在倾听妇女的过程中,我听出了不同,并且发现它使妇女的声音从心理学和历史学两个方面发生变化。它的确改变了声音:如何来讲人类的故事,也改变了讲故事的人。

在我开始写作《不同的声音》20年后的今天,我发现自己连同这本书都处于活跃而热烈的,通常是有争议的关于妇女声音、不同以及知识基础,或者是我们经常称作“准则”的讨论中,也加入到关于两性关系,两性与子女关系的讨论中。在心理学领域,这些问题已经导致对于研究方法、心理评价的实践,以及心理治疗的认真再思考。在教育领域,这些问题也是激进的和影响深

远的。从那些生活与我迥然不同，或者工作领域相去甚远的人们那里，我已经学会以新的方式来听自己的声音。例如作为一名心理学家，对我似乎显而易见的是，身体上的、家庭关系的差异、社会以及文化环境的差异将导致心理上的差异。在倾听法学专家意见，尤其是在 M. 米尼诺《创造所有差异》一书中，我开始领会不同的谈话方式，或条理化的差异的法律后果，并且理解到一些人根本不愿意把差异表达出来。

我也在《纽约书评》(1993年6月10日)发表的 R. 德沃金新近的论文《女性主义与流产》中发现了强烈的反响。德沃金通过女性主义法学家的著作注意到 M. 贝伦凯和我访谈过的妇女，本书的第三、第四章记录了这些妇女的声音。在写作20年后，他仍为我当时如此引人注目的发现而感到吃惊：这些妇女的声音与在公开的流产争论中使用的术语(“关于权利与谋杀的耸人听闻的修辞”)之间存在着差异。在进一步倾听青少年和成年妇女的声音之后，他发现它们具有深刻的启示性，这使得他得出与我当时相同的结论，那时这个结论似乎是一种激进的和落落寡合的观点：“流产的决定并不是与所有其他决定分开的单独的问题，而是人们在生活中必须作出选择的极为引人关注的一例。”

在《不同的声音》问世以来的这些年里，许多人向我讲述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婚姻、自己的离异、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关系以及子女。我对人们寄来的大量来信、书籍和文章表示感谢，它们通常来自我还不曾到过的地方，有时来自我根本去不了的地方。他们的体验、他们提供的不同声音的实例、以及他们的观点常常以极富创造性的方式扩展和复杂化了我写出的东西。在这段时期，我正与 L. M. 布朗、A. 罗杰斯以及“哈佛妇女心理与女

孩发展项目”的其他成员一起合作。我们设立的这个项目把妇女心理与女孩的声音联系起来,在心理学上显现出一种新的声音,像V.伍尔夫在30年代所讲的那样,“发现新的词汇和创造新的方法”,这表达出一种希望:妇女的生活、教育、进入职业部门可能打破暴力和主宰的历史循环。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过程中,我感到了同J.B.米勒(Jean Baker Miller)著作意义深远的密切联系,并从她那激进的看法——“妇女状况是理解心理秩序的关键环节”中获得启示。

正如我一直在解释的政治秩序与男女生活心理的联系一样,我越发认识到妇女的声音在维持和改变父权制社会中的决定作用。通过积极地参与这一变化过程,我发现自己连同这本著作成为心理学上和政治上火爆争论的核心,在这种争论中,心智和体力都近乎消耗殆尽。

在倾听人们对《不同的声音》的反应时,我经常听出在我写作中一再经历的两步过程:倾听妇女,听出某种新的、不同的讲话方式;进而又听出这种不同如何迅速地消解在陈旧的思维范畴里,以至于失去它的新奇性和寓意:是自然的还是教养的?妇女优于男人还是反之?当我听到自己的工作以男女是否确实(本质上)不同,或者何者更好来理解时,我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声音,因为这些并不是我的问题。而我的问题是,我们对于现实和真理的知觉:我们如何去认识,我们如何去听,我们如何去看以及我们如何去讲。我的问题是关于声音和关系的问题。我的问题关系到心理过程和理论,尤为关系到男性体验代表了整个人类体验的理论——使妇女生活黯然失色以及使她们保持沉默的理论。我看到通过保持这些对于人类生活的观察和讲话方式,男人忽视了妇女,妇女忽视了自身。按照心理发展进程,男

人的分离过程对妇女来说,便是需要进行内在区分或者心理分裂的失去联系的过程。

这些并不完全是我个人的抽象推论,我的工作建立在倾听的基础上。我在男人和女人的声音中收集分离和失去联系的声音。我开始提出疑问:男性在讲述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时,或者更一般地讲述人性时,通常像是他们并没有生活在与妇女的联系中,似乎妇女在某种意义上并非是他们的一部分,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我也提出这样的问题:妇女如何逐渐地表白自己,好像她们是无私的,好像她们没有声音或者体验到欲望?妇女对于要无私就意味着不存在于关系中的发现是革命性的,因为这个发现对于那既维持父权制或者文明,又由它们维持的与妇女的分离,妇女与自身失去联系提出挑战。这些在爱或关系名义下对心理过程的辩护同以道德名义对暴力和侵犯的辩护是等量的。

反驳这种对暴力和侵犯辩护的不同声音是一种有关关系的的声音:坚持联系,最重要的是坚持与妇女联系的声音,这样,长期以来在自主性、自我和自由名义下证明是正确的心理分离就不再作为人类发展的绝对必要条件出现,而是作为人类的问题出现。

如果对他人敏感,在与他人的联系中行为,关心而不是对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不闻不问,以及关注他人的生活是好事的话,那么我要向妇女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对自己作出反应是“自私的”,我的问题的逻辑与她们自我谴责的力量,准备好自我放弃和自我背叛的力量正相抵触。“问得好,”许多妇女回答说。当我在哈佛与 E. 埃里克森和 L. 柯尔伯格一起工作,按照弗洛伊德和皮亚杰的传统教授心理学时,我记得在课堂上一个女同学提问题的情景,她的问题以突发的灵感阐明了我们正在讨论的

主题的实质。我对这番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我也能听到自己内在分离的声音：我对这位女同学说，“这是一个好问题，”然后又说，“但它并不是我们这里要谈论的问题。”

在提出我本人以及其他妇女与长久以来体现无私意识的“我们”的关系问题时，我也对男人与这个“我们”的关系提出问题。《奥德修纪》和《伊利亚特纪》以及其他英雄传说——关于激进的分離和暴力的故事是男人讲给自己的有代表性的故事吗？关于人类生活最基本的问题——如何生活和想做什么——是涉及到人们关系的基本问题，因为人们的生活在心理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是深切联系着的。重构这些问题就是对关系的现实作出解释——如何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生活，面对冲突时应当如何去做——我发现自己听出男女声音的不同。突然间给人带来新感觉的妇女声音，以及妇女对冲突的探讨经常带有深刻的启发性，因为这种坚定的目光紧紧地盯在关系秩序和联系上面。注重关系使得妇女的声音在一个专注于分离，执迷于建立和维系人们之间边界的世界——像是 R. 弗罗斯特的诗句《新英格兰人》所说的那样，“好篱笆带来好邻居”的世界里听起来是“不同的”。然而，当我开始写作时，对关系的注重在大多数人那里仍旧是“妇女的问题”。

在美国的社会背景下，分离、独立和自主的价值观具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如此地被移民浪潮增强，如此地根深蒂固于自然权利的传统之中，使得人们把下列东西当做了事实：人们生来是彼此分离的、独立的和自主的。若对这些“事实”提出疑问似乎就是对自由的价值表示怀疑。然而，这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对分离的质疑与对自由的质疑并不相干，这只是涉及到对关系的看法和说明。举个平常的例子，不管一个人想起哥伦布时会想到

什么——无论他如何判断这个人以及他的使命——事实都是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人们一直都在那里生活。无论一个人出于什么截然不同的意向去听取 A. 希尔自己作出的与 C. 托马斯关系的证词，事实上许多妇女都确切地懂得她正在讲什么，因为她们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过类似的事情。至于被改写的哥伦布的故事，自主性的假象都由声音或观点上的激烈变化而驱散：美国印第安人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在工作场合谈论性就是骚扰。我的工作集中在一点便是认识到在心理学中，在更大范围的社会里，价值被当做事实接受下来。

《不同的声音》出版之后的一些年里，在许多人向我提出的问题当中，有三个问题频频出现并且深入到我作品的核心：声音问题，不同问题以及男女发展问题。在思考这些问题和借鉴他人成果的过程中，我越发地以超出本书写作时的认识方式去理解声音、不同和发展。我也越发清楚地看出本书的两部分结构：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心理发展的关系，包括了心理学理论变为约定俗成的方式。在外围部分的章节（第一、第二和第六章）中，我介绍了关系的声音并把它同传统上谈论自我、关系以及道德的方式相对照，同时也说明了误解、冲突和发展的潜在可能。在内部的章节（第三、第四和第五章）中，我把妇女的心理发展重构为集中在联系上的努力，而不是以心理学家一直谈论妇女的方式——作为达到分离方面的问题来谈论妇女。

我先从声音谈起。戏剧发声学教师 K. 林克莱特的著作使我对声音有了新的理解，也更加深了对我本人著作的理解。她对人声音的分析为我的心理学奠定了生理基础——一种理解身体上，语言上，也包括心理上声音如何发生作用的方式，因此也是一种解释我已经描述的一些心理过程的方式。我已经学会了

回声,并逐渐地以一种新的方式理解声音在关系中是如何发出的——它如何依据关系来展开或被限制——这来自演员、导演以及发声教师 N. 诺埃尔,她的工作建立在林克莱特和 T. 帕克工作的基础上。在这家剧院工作的所有妇女不仅深刻理解了心理声音,而且对生理和文化声音也有了一种理解。林克莱特讲了《释放自然的聲音》,这是她第一本著作的名字,她所谈的是人们能够听出一种声道畅通的声音(在身体上与呼吸和发音相联系,在心理上与情感和思想相联系,在文化上与语言的丰富资源相联系的声音)与一种受到妨碍和阻塞的声音之间的区别。在与林克莱特一道工作之后,我已经听出和体验到她所描述的区别。我也从与埃诺尔的一道工作中,学会了分拣关系的共鸣以及领会人们声音上的变化,这些变化出现在当他们的声音取得了与他人的共鸣或者被他人共鸣的场合,以及他们的声音毫无反响,或是反响令人恐怖,他们开始声音呆板或者降调的场合。

随着我研究经验基础的这种激动人心的扩展,我发现更容易回答人们提出的、我所指的“声音”是什么的问题。我所指的声音就是声音。我想说,在我看来答案是简单的,声音也意味着倾听。我会回忆起在没有共鸣时去讲是什么样的感觉,当我开始写作时它是什么样子,现在它仍旧对许多人是什么样子,有时,它仍旧对我是什么样子。发出一种声音意味着是人类。有什么东西要说意味着是一个人。但是,讲话依赖于倾听和被倾听;它是一种强烈的关系行为。

当人们问到我所指的声音是什么,以及我想象中更具有反应性的问题是什么时,我回答说,我所指的声音类似于人们在讲出自我的核心时所表达的内容。声音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它由呼吸和发音、词汇和音韵以及语言构成。声音是连接内外在

世界的一种强有力的心理工具和通道。讲述和倾听是心理呼吸的一种形式。这种在人们中间正在进行着的关系交流是以不同而多样的语言和文化为中介的。由于这些理由,声音是理解心理、社会和文化秩序的新钥匙——一种关系的石蕊试纸和心理健康的标尺。

在河岸版的莎士比亚戏剧《爱的徒劳》的导言中,A.巴顿对文化和声音讨论中听起来真诚的语言作出评述:“语言不能在真空中存在。即使在看起来最平常和最诙谐的程度上,它也是人们之间交流的工具,要求讲者考虑听者的本性和情感。在爱中最重要的就是真诚——在更为一般的关系里也是如此。在这部关于爱和语言的戏剧中,当男人证明并不了解自己声称所爱的妇女之后,两性之间的爱情就需要语言上的变化:“人们优雅而坚定地派遣这个男人去学习妇女始终明白的东西:怎样恰到好处地讲出事实和现实的情感,而不把它作为逃避、闲适的娱乐或者缺乏理性的残酷的手段。”

在《口技声音》中,E.哈维(Elizabeth Harvey)解释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现在也是如此)男人为什么,以及从何时开始选择去塑造妇女的声音,或者通过妇女的躯体来说话,以这种方式口技化自己声音的问题。我发现她的分析大有裨益,因为她很明确地区分开一个是否男人能够认识什么是妇女,因此能够代表妇女讲话的认识论问题与伦理政治问题之间的差异:男人代表妇女讲出的,或者塑造出的一种女性声音的伦理和政治是什么?当我与妇女交谈矛盾的体验时,发现许多妇女都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时期把被塑造的、或者社会建构的女性声音与她们听到的自己的声音区分开来,而且妇女是能够听出不同的。放弃声音就是放弃关系,也放弃了伴随这一选择而来的一切。这一

方面是因为声音与选择之间的联系——“罗诉韦德案”的决定开创或者合法化了对许多男女来说的一种心理和政治发展过程。

这些促使我对不同问题进行思考。在 70 年代早期,当我作为研究助手与 L. 柯尔伯格一起工作时,我发现他的论证是强有力的:对于大屠杀和“中途”(Middle Passage)的后果,心理学家或社会科学家采取伦理中立或者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认为人们对价值不能谈出任何东西,或者所有价值在文化上都是相对的是站不住脚的。在暴行面前,采取如此这般的袖手旁观的立场无疑等同于同谋。但是,柯尔伯格和其他人信奉的、按照传统社会科学研究准则来说所谓的客观立场忽视了声音的特殊性,以及对于形成观点的必不可少的建构。无论这种立场多么地好心和具有应急作用,它都是基于一种掩饰了权力和曲解了知识的绝对正确的中立观点。

我一直试图把对不同的讨论从相对主义转到关系上来,把不同看成人们状况的标志而不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R. 奥尔特(Robert Alter)在《圣经的描述艺术》中观察到,古希伯来作家发展起描述的艺术,因为只有通过描述他们才能“在变化着的时代,在与他人无情的和令人迷惑的关系中”,把人们的生活观念反映表达出来。在当代社会,我发现妇女作家,尤其是吸取了口述和听说传统,也利用了衰落而复杂的不同经历的美国黑人诗人和小说家,正在把艺术声音化过程中起着先锋作用,这种艺术对于现在令许多人关注的问题作出反应:如何以一种重新建构我们对于关系的讨论,以及对于真理说明的方式对不同作出说明。

在谈论不同,以及随之把“不同”理论化中的问题在于一种方便,即在一个只关注标准的社会中,在统计学的奴役下,在历史领域的清教徒中,可以方便地不同变成偏离,把偏离变成罪

恶。T. 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最蓝的眼睛》解释了柏拉图对美的选择,或者一种“母亲”、“父亲”或者“家庭”的理想模式对那些身体上不符合这些标准,父母和家庭满足不了这一理想的孩子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这本早期的小说中,莫里森给出了强暴自己女儿的父亲的声音,划出一条使人们不仅有可能从女儿的观点,也能从父亲的观点理解和说出这种侵害如何能够发生的心理界线。在《被爱》中,莫里森也给出了母亲的声音,她由于不愿看到女儿被抓回去作奴隶而杀死了她,莫里森以这种方式解释了在心理学和道德发展文献中一直逃避的一个心理学和伦理学问题:关怀意味着什么,或者它对于一个爱子女的,生活在种族歧视和暴力社会——一个对男女双方都造成伤害的社会中的妇女,它又能潜在地意味着或者包含着什么?

我发现,自己被现行的关于不同的争论所困惑的地方,也是我发现这些争论没有讲出来的和有摆不脱的相似性的地方——在这里人们不清楚是谁在讲,被谈论的人们并没有发出声音,对话无止无休地在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兜圈子,并且把风向转到最古老的哲学或者本体论问题——是否存在着一个阿基米德支点,是否存在着一个上帝。一个朋友引用司汤达的话说,“上帝的唯一借口是他不存在,”甚至在当代的循环中,这个对话又回到性别和差异,主宰和权力问题。我发现性别差异是生物学决定的,还是社会建构的问题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这种提问的方式暗示着人们——无论男女——都或者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或者是社会化的产物——这意味着没有人发出声音——而在没有人发出声音的情况下,也没有进行抵抗和创造的可能性,或者来源于心理方面的一种变化的可能性。最令人感到麻烦的是,目前的心理学或被降至社会学或生物学,或者是这

两者的某种结合,这就为那种令人震惊的 H. 阿伦特和 G. 奥韦尔控制铺平了道路——用手捂住嘴,掐住喉咙,让声音窒息和闷抑住语言,这就为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准则创造了条件,也为心理上的麻木开辟道路,这种麻木与目前令人好奇的一个难以言形的词“宣传”联系起来。

道德问题是人们的关系问题,在追溯关怀伦理学发展的过程中,我解释了非暴力的人类关系的心理学基础。这种关系伦理学超越了古老的自私与无私的对立,这一对立一直是道德讨论的主题。许多人对于超越这些错误两分法的声音的研究,表明了一种努力,即企图把道德讨论的趋向从如何达到客观性和分离问题转向如何进行反应和关怀问题。政治经济学家、《通道,声音与忠诚》的作者 A. 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把通道的平坦与声音的混乱和令人心碎进行对比。出去比进来更为容易,因而关系需要勇气和情感投入,这是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充分注意和受到珍视的妇女的力量。

关系需要联系。它不仅依赖于移情或倾听他人,学习他们的语言,采纳他们观点的能力,也取决于有一种声音和语言。我所描述的男女差异着重于一种趋向——即男女都犯了不同的关系错误——男人们认为,如果他们遵循苏格拉底的箴言认识了自己,他们也将认识妇女,妇女则认为,只有在认识他人的情况下,她们才能逐渐地认识自己。因此,男女在策略上的不谋而合不仅失去了妇女关系体验方面的声音,也围绕着一方的沉默建立起了关系——男人不知道自己已同妇女失去联系,妇女也不知道已同自身失去联系。许多关于爱和关系的谈论都小心翼翼地掩盖了这些真理。

近来关于妇女心理发展的研究直接触及到这个问题。哈佛

妇女心理和女孩发展研究项目在对妇女声音的考察中,把发展的时间从后向前推移,从成年追溯到青春期,从青春期追溯到童年。把成年妇女,包括本书给出的妇女声音作为起点,我们一直在倾听女子学校青春期女性从心底发出的声音,以及男女混校的男女青年,校外俱乐部里的男女青年内心的声音。一旦我们熟悉了青春期的标志,我们便随着某种信心的权衡,带着新的问题进入更年轻的女孩世界,开始了为期5年的对7-18岁女孩的研究,以及3年的把女孩和妇女都包括进来的预防项目的探索。

在这一研究过程中,L.M.布朗,A.罗杰斯和我本人逐渐地在女孩声音中听出不同的变化,观察到这种声音上的变化与女孩关系以及自我意识上的变化正相吻合。例如,我们开始听出处于青春期边缘的女孩所描述的不知所措的状况——她们感觉到的心理困境——即如果她们说出正在感觉和思考的事情,没有人想同她们在一起,如果她们不说,她们将一直是孤独的,没有人知道对于她们正在发生着什么。正如一个女孩所谈的那样,“没有人想同我在一起,我的声音曲高和寡。”在说出这番话后,她又来缓解自己的难解之谜,解释说,“然而一个人必须要有关系。”

在倾听这些女孩关系困境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对心理学理论进行了重新思考,倾听令我们自己和其他妇女焕然一新。我们为这些年轻姑娘的坦率和大胆,为她们说真话的决心,为她们对保持关系的热烈渴望感到震惊。同时,我们也目睹了女孩边界向着放弃自己所知的东西、自己牢牢把握的东西迈进,当她们转过头来面对与自己体验并不一致的社会现实结构时,某种分离就变得不可避免了。在一个心理上根源于、历史上维系

在有权势的男人体验的世界里,女孩进入和经历成年标志着自我怀疑的开始,以及认识的开端,无论怎么挣脱,妇女都需要在体验和通常呈现为现实的东西之间进行一种分离性的割裂。

当我们的研究为女孩抵制这种分离提供证据时,也为她们与许多妇女相似的心理区分提供说明:越发地不明白一个人认识到什么,倾听上的困难以及倾听一个人声音的困难,身心的分离,思想与情感的分离,运用他人声音去表达而不是表达出自己的内在世界,以至于关系不再为探索一个人的内在生活与他人世界之间的联系提供通道。

突然间变得清楚的是,为什么本书中艾米的声音令许多妇女吃惊,为什么它给某些妇女留下一种意味深长的不安感觉。艾米的话“依情况而定”一直被许多妇女重复,她们也抵制对复杂的人类问题作出公式般的解决。但是,艾米对以这类公式解决人类冲突局限性的强调使某些妇女像似作为传统心理学家那样地倾听她的声音:把它听成是软弱无力的、不确定的、逃避的和天真的。访谈过艾米的心理学家知道,她对于被问及问题的回答导致她被评价为并不是非常“成熟的”——没有清晰的自我意识,在抽象思维或者道德判断能力方面没有得到充分地发展——这也是她们为什么不断地向艾米重复问题,以便再次给她机会的理由。

15岁时,艾米自身内产生了怀疑的声音,导致了在两种交替出现的声音之间的斗争。在15岁的访谈时,她正处于积极分离,对自己知道的东西似懂非懂的过程中。例如,她看到坚持一个人应当偷药去挽救生命垂危的穷人的麻烦,即使当她知道自己生活的城市每天都有穷人由于缺乏药物而濒于死亡时,她也不打算偷药去挽救他们。11岁时,她只是说偷药不是解决这个

问题的好办法,事实上人们大概会通过放任这个病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药品和死去,而且潜在包含着脱离关系和丢下不管,可能也有减少经济负担的意思。然而,她在15岁时能够从谈论道德冲突的方式中看出逻辑,她也把这种冲突看成是对关系的威胁和脱离了现实,同时她也明白了一种推论方式——需要作出一系列的分离,开始改变与自我的关系,使自己的现实感朦胧不清的方式。她记不清自己11岁时说了什么,在一种以及另一种探讨问题的途径之间来回摇摆,15岁时,艾米处在思想的变化过程中。

这种思想上的变化也是心灵上的变化,我们在青春期女性那里不断地观察到这种变化,这使得我的同事A.罗杰斯认为姑娘们失去了她们“平时的勇气”,或者发现似乎一直是平常的东西——有一种声音和处于关系之中——现在变得不平常了,某种东西只是在最安全、最隐秘的关系中才能得以体验。女性青春期的这种与公共世界的心理隔离发展起妇女体验私人化的阶段,并且妨碍了妇女政治声音的发展以及在公共世界的出现。青春期女性声音与体验的分离,致使她们并不说出自己知道什么,因此后来也就不知道自己知道什么,这是一种预兆——许多妇女感到有一条体验的毯子从她们身下拉了出来,或者越发地不把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当做真实的,而是当做虚构的东西来体验。

同时,通过记录勇敢的姑娘有力而有勇气的声音,通过整理她们对保持自己声音与关系最佳方式的探求,哈佛项目的研究为构成本书问题的基础提供证据,这些问题是通过一种新方式提出来的。正在进行的人类关于分离与联系,公正与关怀,权利与责任,权力与爱的对话呈现出新的转折,这发生在女性走向成熟,并在许多社会中公开地发出声音和有了选举权,以及对于根

据这些两分法进入对话进行抵制的时候。先前一直作为青春期发展标志,作为心理学事实的分离与独立似乎不再是必要的或者不可避免的,不再是自然的或有利的。从本书中许多妇女走过的、通常她本人和他人付出很大代价的“无私”之路回头也不再是一条必然的行程。本书中的抵制和11岁女孩艾米的勇气与在流产决定研究中的一些青少年更为随便的声音之间的分离,可能反映出关系的失去而不是没有建立起关系——当妇女把道德冲突建构成自私与无私行为的选择时,人们能够听出这种关系的失去。

把对妇女心理发展的这种理解同实际是关于男人发展理论的人类发展理论联系起来,我已经得出下列理论:男性在儿童早期有代表性地体验到的关系危机对妇女来说出现在青春期;这种男孩和女孩的关系危机包括了与妇女的分离,而这种分离是为父权制社会的永久化所必不可少的;妇女心理发展具有一种潜在的革命性,这不仅是因为妇女的状况,也由于女孩的抵制。女孩为反对失去声音而努力,为抵制确立一种内在的区分或分裂,以至于她们的大部分自我都脱离关系而努力,因为在女孩的心理发展过程中,她们对于文化所规定的分离的抵制要迟于男孩,所以她们的抵制也更为清晰、更为有力、更发自于内心,因此也取得更大的反响;它在男女对关系的欲望中得到回响,并且重新揭开以往心理上的创伤,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关系可能性以及新的生活方式。正如女孩变成无声的欲望,以及实现不了的可能性的载体一样,她们也不可避免地处于巨大的冒险、甚至是危险之中。

J.B·米勒利用自己作为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分析学家的优势,在同治疗中的妇女一起工作,进行妇女心理发展的研究中,

观察到在女孩和妇女发展过程中,在她们试图建立和保持关系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矛盾是她们大部分的自我都置身于关系之外。米勒的这个矛盾公式构成了重新理解妇女心理的关键,并带来对心理痛苦和麻烦的颇有说服力的重新思考。

米勒和我本人都为这一事实而感到吃惊——尽管我们从不同的方向对妇女和女孩进行研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工作,我们在妇女心理学与普遍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方面取得了极为相同的见解。一种新的女孩和妇女能被听到、被看到的心理学理论是对父权秩序——只有通过销蚀妇女的体验才能保持的父权秩序——的一种不可避免的挑战。充分地展现妇女和女孩的体验成为一种激进的努力,尽管这是一种完全直接意义上的展现。因此,在与妇女和女孩的联系中,在教学、研究、友谊和母爱之中,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这是一场潜在的革命。

在心理学教学中,我经常读弗洛伊德的著作《文明与缺憾》,他在这一著作中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男人创立了一种文化,而他们又以这般的不满生活在其中?我曾与学生讨论说谎者悖论——“罗马人说,罗马人总是说谎”——在弗洛伊德把与童年关系的分离,与长辈人的对立看成为文明过程所必需时,当皮亚杰认为,假定要优于现实时,这一悖论变得令许多处于青春期的的人着迷。我渐渐地以不同的方式来倾听这一悖论只是最近的事。“罗马人说,罗马人总是说谎”包含着一个关于帝国主义的事实真理:任何帝国秩序的中心都有一个谎言。

这是J.康拉德预言性的和有争议的小说《黑暗的心》中的一个观点。当马洛旅行到当时属于比利时的刚果时,他开始寻找受“一群有德之士”派遣的库尔兹先生,这群欧洲人把自己看成是给非洲人带来光明、进步和文明的人。马洛相信,库尔兹将

以与普遍的腐败、冷漠、暴力和疾病不同的开明帝国主义的眼光重现自己的信念。当他深入到腹地时，马洛得知库尔兹快死了。在与奄奄一息的库尔兹先生会面时，他发现了最后的腐败。在库尔兹准备发回比利时公司的报告下面有他装运的象牙，他已经潦草地写下被二十世纪反复认定的词句：对差异问题的最终解决——“消灭所有这些畜生”。这位垂死的库尔兹先生本人也作出了评价：他最后的话是，“恐怖！恐怖！”

马洛认为自己不能忍受谎言，谎言令世界麻木，“像是吞食了腐烂的东西”。但在这本书的结尾，他对库尔兹先生的未婚妻说了谎，这位没有名分的欧洲妇女等待着库尔兹，对他仍然记忆犹新。当马洛到比利时访问她，并把库尔兹遗物中发现的她的肖像归还给她时，她问库尔兹留下了什么遗言，马洛对她说了谎话：“他临终前说出来的一句话是——您的名字。”

这个小谎从词义上是个圆场谎，因为它掩饰了与库尔兹一直生活在一起的一位黑人妇女，事实上她一直与库尔兹在一起。在这个妇女身上体现出的种族差异问题触及到通常什么是妇女之间最痛苦、最困难的差异问题的核心：白人妇女一直直接卷入其中的战争罪行。

在过去的两年多里，我参加了一个由 11 名妇女组成的团体，其中有 5 名白人，5 名黑人和 1 名西班牙妇女。我们通过提出自己同女孩的关系问题来探讨自己与未来人的关系。我们作为黑人、白人和西班牙妇女与黑人、白人和西班牙女孩的关系在哪里？我们如何能够建立和维系超越种族界限的联系，并以这种方式促进打破而不是使种族统治和暴力循环永久化？

按照康拉德小说与众不同的方式，马洛判断自己对库尔兹未婚妻说谎是正确的——对待自己如同对待在甲板上等候涨潮

时听他讲故事的人们：

“我听到一声轻轻的叹息，紧接着我的心便停住不跳了，它突然死死地停住，因为一声狂喜的和可怕的叫喊，因为这声出于不可想象的胜利和难以名状的痛苦的叫喊。‘我早知道这个——我早有把握的！’……她早知道。她早有把握。我听到了她的哭泣；她用手捂住脸。我似乎感到这座房子在自己能逃走之前便会倒塌下来，天会塌下来压在我的头上。然而却平安无事。天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儿塌下来。我疑惑不定的是，如果我把库尔兹所应得的那份公正给予他的话，天会塌下来吗？他不是说过自己只想要公正吗？但是我不能。我不能告诉她。那未免太黑暗了——暗无天日。”

这种种族与性别，殖民主义与男性叙事的交叉也标志着谎言矛盾与关系矛盾的汇集：在男女共同生活的和“文明”的地方制造了令人感到束缚的镣铐。关于进步的谎言与涉及到关系的谎言结合起来，它既欺骗了妇女和男人，也抹杀了妇女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一交叉把本书的两个部分结合起来——在心理学理论中把男人作为整个人类代表的谎言，在妇女心理发展上，女孩和妇女改变了自己的声音，以使自己适于关系的意象(image)以及被虚假的女性声音所传递的美德。

谎言令人厌倦：这是女性主义和心理分析的共同见解。我所写作的《不同的声音》把妇女的声音带进心理学理论，重新建构了男女两性的对话。一直令我惊奇的发现是，自从这本书问世以来，自己的体验如何在其他妇女那里得到呼应，而且也以不同的方式如何在男人那里得到共鸣。因而，目前对于声音和关系的主题，对于联系的关切，以及对于分离代价的关注已经成为发展着的对话的一部分，而这在70年代似乎还是新事物。

“你们感觉需要巨人，”本书开篇引用的《樱桃园》一场戏中朗涅芙斯卡娅夫人对罗伯辛说。契诃夫听到关于这个主人公传说的这种评论，以及作为一个妇女评论来发展、或者是以一种女性声音来解释的故事。这些不同的阐述揭示出本书没有解除的一种紧张关系：是否在谈论人类生活和关系的两种方式之间存在着无休止的对峙，其中一种方式是基于联系，另一种是基于分离；抑或一种长期以来一直与发展和进步相联系的关于人类生活和关系的思维方式，是否能够对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作出让步，后面一种思维方式始于这样的前提：我们不是生活在分离中，而是生活在关系中。

一直把进步或美德同分离或者独立联系起来，在心理发展或者健康名义下倡导与妇女分离的心理学发展理论，自我与道德概念是危险的，因为它们在科学的装饰下掩盖了一种假象：分离或者与妇女脱离关系是有益的。妇女的声音不断地出现在人们的对话中，这一带有根本性的脱离关系的问题为谎言提供了温床。一旦妇女进入对话，不可避免地涌现出来的关系和差异问题目前便在地方、国家乃至国际范围内成了最紧迫的问题。就男人的分离，妇女的失去联系使现有的社会秩序永久化而言，政治已经心理化了。心理发展进程，以及抵制这些分离和失去联系的能力也变成政治行为。

我并没有修改《不同的声音》，因为它已经成为它所描述的进步——人们正在经历的通过放开妇女的喉咙，去改变世界的声音，并由此开始一种新对话的历史进步的一部分。

1993 年 6 月于英国剑桥大学

我感谢 M. 哈默、M. 雅各布斯、T. 布伦南以及 O. 奥尼尔对这篇再版序言初稿的热情而富有见地的反应。我也借此机会对 D. 奥斯汀、A. 罗杰斯表示我最深切的谢意。我感谢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参加“剑桥妇女论坛”和在纽纳姆学院参加“妇女系统讲座”的人们，感谢在乌得勒支大学参加由 S. 克罗尔和 S. 塞维恩赫森组织的讲座的人们，在这些地方，我征求到了对本书最初的意见并从讨论中获益。

致 谢

在感谢其他人的慷慨以及对本书的贡献时,我首先要提及参与到我所报告的研究中来的男人、妇女以及孩子们。他们在描述自我和生活时的思索,他们对道德问题作出回答时的耐心,以及他们对自己道德冲突和选择体验意愿的讨论为本书奠定了基础。我特别要感谢参与流产决定研究的妇女们;她们期冀的正是以自身的体验为他人提供可能的帮助。

所有的研究都是合作努力的结果,我也要感谢在流产决定研究中的合作者 M. 贝伦凯;在大学生研究中的 M. 默菲;以及在权利与责任研究中的 M. 默菲、S. 兰代尔、N. 莱昂,许多访谈都是他们完成的,许多观点都出自我们共同的讨论。研究设计反映出他们的贡献;这也

同样反映在研究成果中,反映在他们的奉献精神以及勤奋工作中。M.巴西切、S.贝纳克、D.赫尔塞泽、N.雅各布斯、R.基根、D.拉皮德斯以及S.里斯也对本书作出重要的贡献。在对暴力意象研究中,我的合作者S.波拉克作出了创意这项研究的观察。

使本书有可能问世的资助来源于“斯潘塞基金”,这笔基金经哈佛有关部门同意用于流产决定研究;在大学生研究中,我们也获得了“威廉·F·米尔顿基金”和“国家精神健康学会小额补助部门”的资助;“国家教育学会”也为权利与责任的研究提供资助。“梅隆基金会”提供的研究员基金使我能够在韦尔斯利学院的妇女研究中心进行一年的研究。

另外的支持来自我在哈佛的同事们:L.柯尔伯格启发了我对道德的研究,多年来他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D.麦克莱兰、G.戈塞勒斯多年来也一直使我的工作获得灵感,并给予我最慷慨的鼓励;从B.惠廷那里我开拓了自己的视野;W.佩里的研究预示了我的研究。我也感谢一同教学的P.斯帕克斯和S.恩格尔,他们扩展和澄清了我的见解;我感谢U.布朗芬布伦纳、M.霍纳、J.利连费尔德、M.诺特曼、巴巴拉和P.罗森克兰茨以及D.尤林对于扩展我的研究工作范围的建议;感谢J.吉勒作为编辑的启发;感谢J.马丁对初稿作出的全面评价;感谢V.莱普兰特为最后定稿提出的许多明智的建议。

第一章和第三章最初刊登在《哈佛教育评论》上,我感谢编委会的学生细致地关心和帮助。“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善意地允许把第六章以不同形式再次发表于由这个理事会资助的,由J.吉勒编辑的一本书中。

我对哈佛大学出版社的E.沃纳怀有深深的谢意,是他支持

传播了我在这本书中的观点,我也特别受益于一些朋友,我感谢 M. 默菲、N. 莱昂、J. B. 米勒以及 C. 罗布,感谢他们的欣然倾听和阅读,感谢他们的积极反响。我感谢我的儿子乔恩、蒂姆和克里斯——感谢他们的兴趣和热情所带来的快乐,感谢他们的观点和理解力,感谢他们一如既往的鼓励和支持。我也要感谢我的先生 J. 吉利根,感谢他深邃的洞察力,清晰的思路,感谢他的帮助,他的幽默以及他的视角。

序 言

在过去十余年来，我一直在倾听人们谈论道德和自我。在这一过程中，我开始听出这些声音中的差别——谈论道德问题的两种方式，描述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两种方式。在心理学文献中代表着发展过程各个环节的差异突然间以相互对应的主题出现，并与生命周期交织在一起，以变化着的形式再现于人们的判断、好奇心以及思考当中。这种观察的机会来自为了探讨在道德冲突和选择情况下，判断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而对妇女进行的抽样研究。与我数年来一直阅读和讲授的对认同以及道德发展的心理描述相悖的是，妇女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注意到在解释妇女发展时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把这些问题与妇女

一再地被排除在关键性的心理学理论建构研究之外联系起来。

本书记录的是对关系思考的不同方式,并把这些方式同心理学和文学著作中,同我的研究数据中的男女声音结合在一起。人们注意到在心理学著作中,妇女体验与人类发展描述并不一致,这种情况通常一直被当做妇女发展上的问题。然而,妇女无法适应现有的人类发展模式或许表明了描述方面的问题,对人们状况认识上的局限性以及对某些生活真理的忽略。

我描述的不同声音并非是以性别,而是以主题为特征的。它与妇女的结合是一种经验上的观察,我主要通过妇女的声音来追溯不同声音的发展。但是,这种结合并不是绝对的,这里作出的男女声音的对比强调了两种思考方式的差异,集中于解释问题而并不表明对任一性别的概括。在对发展的追溯中,我说明了对每一性别而言这些声音的相互作用,并且强调它们的汇合标志着危机与变化时期的来临。对于所描述的不同的起源,对于它们跨越时代和文化,在更广泛的人们当中的体现,我并没有作出陈述。显然,这些不同来自把社会地位和权力因素,与生殖生物学结合起来所形成的男女体验以及两性之间关系的社会背景。我的兴趣在于体验与思考的相互作用,在于声音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话,在于我们倾听自己和他人的方式,在于我们讲述的关于自己生活的故事。

本书涉及到三种研究,体现了我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假定:人们谈论自己生活的方式是有意义的;他们使用的语言以及所进行的联系揭示了自己所见到的,并且在其中行为的那个世界。全部研究都依靠访谈,包括了一系列相同的问题——关于自我概念和道德概念,关于冲突和选择的体验。访谈的方法是顺着人们的语言和思维逻辑,访谈者提出进一步的问题以便澄

清特定回答的含义。

大学生研究通过把他们的自我观、道德观与道德冲突的体验,作出生活选择的体验联系起来,解释成年早期的认同以及道德发展。在二年级选修过道德与政治选择课程的学生中,随意选取 25 人在高年级时参加访谈,并在他们毕业 5 年后再次访谈。在选取这个样本的过程中,我观察到在中途退课的 20 名学生中,有 16 名是女生。这些女生也被联系参加高年级的访谈。

流产决定研究考虑的是体验与思考之间的关系以及冲突在发展中的作用。有 29 名怀孕三个月以内的、正在考虑流产的妇女参加访谈,她们的年龄从 15 岁到 33 岁不等,来自不同的种族和社会阶层,一些人是单身,一些人已经结婚,还有少数人是学龄前儿童的母亲。大城市里的怀孕咨询机构和流产诊所的研究把这些妇女包括在内;我们没有设法去对这些诊所或咨询机构掌握的人员进行有代表性的抽样。在涉及到的 29 名妇女中,我们得到 24 人的完整访谈数据,在这 24 名妇女中,有 21 人在作出选择后的年底再次被访谈。

这两项研究扩展了关于道德判断的通常研究设计,通过询问人们如何定义道德问题,以及他们在生活中把什么样的体验建构成道德冲突来研究道德判断,而没有集中在他们对于解决所提出问题的思考。由这些关于道德的不同思考方式,以及它们与不同自我观联系起来研究产生的假定,又通过权利和责任的研究得到进一步说明和修正。这项研究通过对年龄、智力水平、教育、职业、社会等级相当的男女在生命周期中选取九个阶段的抽样来进行:6-9岁、11岁、15岁、19岁、22岁、25-27岁、35岁、45岁和60岁。从全部的 144 份样本中(每个年龄段抽取 8 男 8 女),包括更集中访谈的二次抽样的 36 人(每个年龄段 2

男2女)中收集自我和道德概念的数据,道德冲突和选择的体验,以及对假定道德困境进行判断的数据。

在摘录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我报告了其目的在于为人类发展领域提供一种更为清晰的妇女发展描述的研究,它将能使心理学家和其他人沿着所描述的路线,理解发展中遇到的一些明显困惑,尤其是那些涉及到妇女认同的形成,以及她们在青春期和成年期道德发展方面的困惑。对于妇女来说,我希望这项研究将提供一份对于她们思考的描述,使她们能够更充分地认识自己思考的完整性与合理性,能够认识到自己思考中反映出来的体验,能够理解自己思考的发展路线。我的目的是通过利用理论建构中存在的空隙来扩展对人类发展的理解,使人们注意到在说明人类发展时丢失的东西。在承认这一点的基础上,妇女体验提供的不同数据将为一种新理论的诞生奠定基础,并且有希望产生一种对于两性生活都更具有包容性的看法。

目 录

译者前言.....	1
1993年版致读者.....	11
致 谢.....	33
序 言.....	36
<u>第一章 妇女在男人生命周期中的位置</u>	1
<u>第二章 关系的意象</u>	22
<u>第三章 自我概念与道德概念</u>	66

第四章 危机与转折	112
第五章 妇女的权利与判断	137
第六章 成熟观	162
译后记.....	189
参考书目.....	191

第一章 妇女在男人生命 周期中的位置

在《樱桃园》的第二幕中，年轻的商人罗伯辛描述了自己辛勤劳作和成功的生活。他没有说服朗涅芙斯卡娅夫人砍伐樱桃园，以便保护自己的庄园，在下一幕中，他自己将樱桃园买了下来。他是一个靠自我奋斗起家的人，在购买这座自己的父亲和祖父都曾当过奴隶的庄园时，试图抹去以往“难堪的、不幸福的生活”，他把樱桃园变成了避暑别墅，在这里后代“将看到一种新的生活”。在表达这种发展观时，他透露了使自己的行为得以成立的男人的意象：“有时，当我无法入睡时，我想：主啊，您赐予我们无边无迹的森林，广袤的大地和一望无迹的地平线，在这片土地上生息，我们实际上应当是巨人”，此时，朗涅芙斯卡娅夫人打断他说，“你们

感觉需要巨人,他们只是在寓言故事里是善良的,在别的地方只能对我们构成威胁。”

人类生命周期的概念试图把不断扩展的体验和知觉,把变化着的愿望和每一天的生活现实秩序化和内在逻辑化。但是,这些概念的实质部分地取决于观察者的立场。契诃夫戏剧的主要片段说明,当观察者是妇女时,视角或许是不同的。男人作为巨人意象的不同判断意味着不同的人类发展观,想象人们处境的不同方式,以及不同的生活价值观。

在追求社会平等和公正的过程中,人们在努力消除性别歧视的同时,社会科学也重新发现了性别差异。当从前在科学的客观性方面被认作性别中立的理论如今被认识到始终反映着一种观察和评价偏见的时候,这个发现就开始了。于是,人们想象的科学中立,如同想象的语言本身的中立一样,让步于这样一种认识:知识范畴是人类建构的。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如何习惯于通过男人的眼睛看待生活时,对已经宣告为 20 世纪神话观的热衷,以及相应地对判断相对性的承认也注入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

一个新近的发现涉及到显然是无辜的 W. 斯特伦克 (William Strank) 和 E. B. 怀特 (E. B. White) 的名著《文体概论》(The Elements of Styles)。最高法院对性别歧视议题的裁定使一位英语教师注意到,人们通过把拿破仑的出生、柯尔律治的作品以及下述陈述对应起来作为范例来教授英语用法的基本规则,诸如把“他是一个有趣的,健谈的人。一个周游过整个世界,在六个国家生活过的人”一类的陈述同“喂,苏姗,你陷入真正的麻烦,”或者不那么激烈地说,“他看到一位妇女,领着两个孩子,顺着这条路慢慢地走下去”的陈述对应起来。

心理学家像斯特伦克和怀特一样无辜地陷于同样的观察偏

见。在含蓄地采纳男性生活作为标准的过程中,他们一直试图以男人的布料来装扮妇女。当然,这全都可以追溯到亚当和夏娃——这个故事此外还表明,如果你以一个男人来创造妇女,就注定要陷入麻烦。在生命周期中,像在伊甸园中一样,妇女一直是偏离的。

发展理论家设计男人意象的偏好——这显然是令妇女恐慌的偏好,至少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1905),他围绕着男孩在恋母情结高峰期的体验建立起性别心理发展的理论。在本世纪20年代,他着力解决由于妇女生理解剖方面的差异,以及少女早期家庭关系的不同结构给自己理论带来的矛盾。他在尝试了把妇女框入自己的男性概念,看到妇女嫉妒她们所失去的东西之后,开始意识到妇女在前恋母情结时期对母亲依恋的强度和持久性,以及她们发展上的不同。妇女在发展上的这种不同导致在他看来的发展失败。

在把超我或者良心的形成同阉割焦虑联系起来后,弗洛伊德认为,妇女生来就被剥夺了果断地解除恋母情结的冲动。因此,妇女的超我——恋母情结的后继者——也作出让步:它绝不是“那么不屈不挠的,那么超出个人的,那么像我们在男性那里要求的那样摆脱了它的情感起源”。从对差异,即“对妇女来说伦理上正常的标准不同于男人”这一点的考察中,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说,妇女“表现得不如男人那么具有公正感;对承受生活中重大紧急事件的准备差些,她们的判断更为通常地受到喜恶感的影响”(1925:257-258)。

因此,理论上的问题变成了妇女发展上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体现在她们对关系的体验中。N. 乔多罗(Nancy Chodorow, 1974)在试图说明“每一代人中体现出男女人格以及角色特点的

某种一般的、几乎是普遍差异的再生产”过程中,没有把两性间的这些差异归于解剖学,而是归于“妇女普遍地要对照顾幼小孩子负有重大责任的事实”。由于这种早期社会环境的差异以及男女儿童体验的不同,在人格发展中,基本的性别差异会再度重现。因此,“在特定的社会里,同男性相比,妇女的人格更多地是在与他人的关系和联系中开始确定的”(43-44)。

在分析中,乔多罗主要依赖于 R. 斯托勒(Robert Stoller)的研究,后者表明,性别的认同,人格形成的不可改变的本质“除了罕见的例外,对男女儿童来说都是在三岁左右稳定的、不可改变地确立起来的”。假定在三岁之前男女儿童的主要照顾者是妇女,性别认同形成的人际关系动力对男女儿童来说便是不同的。女孩的认同形成于不断发展的关系背景之下,因为“母亲试图更像她们自己,以及延续自我那样地体验自己的女儿”。相应地,女孩在把自己认同为妇女的过程中也像母亲那样体验自我,由此便把这种依恋的体验与认同形成的过程融合在一起。相反,“母亲把儿子作为异性来体验”,而且男孩在把自己确定为男性的过程中,把自己同母亲分开,由此便削弱了“他们最初的爱以及移情联系的感觉”。结果,男性的发展包括了一种“更为突出的个性化,以及对所体验到的自我边界更具防御性的规定”。对于男孩来说,“区分问题已经同性别问题交织在一起了”(1978: 150、166-167),而女孩却并非如此。

在对心理分析理论中的男性偏见作出反驳时,乔多罗争辩说,在个性化以及关系的早期体验方面表现出来的性别差异“并不意味着女性比男性有一个‘更弱’的自我边界,或者更倾向于精神上的极度焦虑”。相反,它意味着“女孩从这个时期起奠定了‘移情’的基础,它使女孩以不同于男孩的方式作出最初的自

我定义。”因此,乔多罗以自己积极而直接的说明取代了弗洛伊德对妇女心理消极的和演绎性的描述:“女孩具有更坚定的基础,像体验自身一样地去体验他人的需要或情感(或者设想一个人是如此体验他人需要和情感的)。此外,女孩并没有以男孩那样的程度通过否定前恋母情结关系的方式来定义自我。因此,对这些方式的让步也没有让她们感到对自我构成根本性的威胁。因而,从很早的时候起,由于她们与相同性别的父母打交道……,女孩并不像男孩那样有区别地体验自我,她们更连续性地与外部对象世界保持关系,而且也从不同的方向发展自己的内在对象世界”(167)。

因此,男女对于关系,尤其是依赖性问题的体验是不同的。对于男孩和男人来说,分离和个性化与性别认同有着重要的联系,因为与母亲分离对于男性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女孩和妇女来说,女性表现或者女性认同并不取决于与母亲分离,或者个性化的过程。既然男性是通过分离,而女性是通过依恋来规定的,男性的性别认同便受到亲密关系的威胁,而女性的性别认同则受到分离的威胁。因此,男性倾向于在关系方面遇到困难,而女性倾向于在个性化方面出问题。然而,与男性相比,形成女性生活特征的,体现在社会相互作用以及人际关系方面的特性,不仅构成描述上的不同,而且在心理学文献把儿童和青少年发展的里程碑看作以不断分离为标志时,也成为发展上的不足。因此,依照定义,妇女在分离上的失败也意味着发展上的失败。

在对儿童游戏的研究中,乔多罗描述的童年早期人格形成上的性别差异也体现在童年中期。G. H. 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934)和皮亚杰(1932)都把儿童的游戏看成学校期间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在游戏中,孩子们学会去扮演他人的角色,

逐渐地通过他人的眼睛看待自己。在游戏中,他们也学会了尊重规则,并逐渐地理解了规则建立和变化的途径。

J.利弗(Janet Lever, 1976)认为,在小学期间同龄人是社会化的力量,游戏在这一阶段是社会化的重要活动,她着手去发现在孩子们玩的游戏中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在对181个年龄为10岁和11岁,就读五年级的白人中产阶级子女的研究中,她观察到儿童游戏时的组织结构。她对孩子在课间以及体育课上的游戏进行观察,此外还每天把孩子们讲的自己如何利用校外的时间记录下来。从这一研究中,利弗报告了性别差异:男孩比女孩更多地在户外活动;男孩更经常以不同年龄组成的大帮进行游戏;他们更经常玩竞争性的游戏,他们的游戏时间比女孩长。从一些方面来看,后者是最有意思的发现。男孩的游戏看起来持续的时间长些不仅是因为它们需要更高的技巧水平,因而不大可能令人厌烦,而且因为如果在游戏过程中出现分歧,男孩能够比女孩更有效地解决争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人们可以看到男孩子一直在争吵,但没有一次游戏是由于争吵而结束,它被打断也不超过七分钟。在最激烈的争辩中,最后一句话总是‘重玩’,随后一般便会有对‘欺骗者证明’的众口一词”(482)。事实上,男孩像享受他们游戏那样地享受合法的争辩,即使是不那么有块头和技巧的随帮唱影者同样也会参加这些经常发生的争吵。相反,女孩之间出现的分歧会导致游戏的结束。

因此,利弗扩展和证实了皮亚杰在研究游戏规则时的观察,皮亚杰发现,在整个儿童时期男孩变得越发地执迷于对规则进行合法的解释,以及裁决冲突时的程序公平,他指出,女孩并没有表现出这种执迷。皮亚杰观察到,女孩对待规则有更“实际”的态度,“只要游戏能够补偿这一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好的”

(83)。女孩对待规则的态度也更为宽容,更愿意破例,更容易接受创新。因此,被皮亚杰视为道德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法律意识“在女孩身上的体现远非不如男孩”(77)。

皮亚杰把男孩发展等同儿童发展的偏见也影响了利弗的著作,构成她讨论结论的设想是,男性模式是更好的模式,因为它满足了现代社会成功的需要。相反,女孩通过游戏发展起来的对他人情感的敏感和关切并没有什么市场价值,甚至能对事业成功构成障碍。利弗暗示说,在成年人的现实生活中,如果女孩日后不想依靠男人,她在童年就必须学会像男孩那样地游戏。

对于皮亚杰的论点——儿童通过玩由规则规定的游戏而学会尊重规则是道德发展的必要条件,L.柯尔伯格(1969)补充说,人们通过在解决争端过程中出现的承担角色的机会卓有成效地学习到这些课程。因此,女孩游戏中所包括的道德课程似乎少于男孩的游戏。传统的女孩游戏,像跳绳和跳房子是轮流着玩的,这种游戏的竞争是间接性的,因为一个人的成功未必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失败。因而,需要裁决的争端也不大可能出现。事实上,利弗访谈的大多数女孩都声称,当出现争吵时,她们就会结束游戏。女孩宁愿保持关系而结束游戏,也不愿意精心制定一个解决争端的规则制度。

利弗得出结论说,男孩在游戏中学会了独立和组织技巧,这是为协调大型的,以及各种人参与的活动所必备的。通过参与有控制的和社会认可的竞争,他们学会以一种相对直接的方式来对付竞争,即与自己的敌人一起玩耍,同自己的朋友竞争——这些全都吻合游戏的规则。相比之下,女孩喜欢与较少的、较亲密的人一起玩,通常是与最要好的朋友,而且是在幽僻的地方。这种游戏反映了人类最初的社会关系模式,因为它的组织更具有合作

精神。因此,用米德的话说,它不那么倾向于去学习承担“普遍化的他人”的角色,也不那么倾向于把人们关系抽象化。但是,它加强了对移情和敏感的培养,这也是为承担“特殊化的他人”角色所必需的,而且更倾向于把他人看作是与自我不同的。

因此,乔多罗从分析母亲与子女关系得出的儿童早期人格形成上的性别差异,通过利弗观察到的儿童中期游戏活动中的性别差异得以扩展。这些说明都提出了男女儿童是以不同的人际关系方向,不同范围的社会体验进入青春期的。然而,既然青春期被当做分离的关键时期,“第二个性化过程”的时期(Blos, 1967),那么它也是妇女发展出现巨大偏差,因而是最有疑问的时期。

弗洛伊德认为,“使男孩带来性欲大量增长的青春期,在女孩那里是以压抑的新波动为标志的,”这是为年轻姑娘的“男性性别”转化为她成年期特有的女性性别所必需的(1905:220-221)。弗洛伊德把这种转变设想为女孩对“自己阉割事实”的承认和接受(1931:229)。他解释说,青春期带给女孩一种新的意识——“对自恋的伤害”,导致她发展起“如同疤痕一样的劣势感,”(1925:253)。因此,在E.埃里克森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说明的扩展中,青春期是随着认同而发展的时期,女孩或者是通过心理危机,或者是以不同的议程抵达这个关口。

在埃里克森的研究中,显然出现了人类发展理论家提出的女性青春期问题。他勾画出社会心理发展的八个阶段(1950),青春期为第五阶段。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形成一种连贯的自我意识,并且证实一种能够跨过青春期的非连续性,使成年人的爱和工作能力成为可能的认同。在埃里克森对前四阶段特定危机的描述中,对如何准备成功解决青春期的认同危机问题也进行了描述。尽管新生儿期“信任感对不信任感”的最初危机把发展固

定在关系体验方面,但当时的任务显然是个体化。埃里克森的第二阶段集中在“自主性对羞愧和疑虑”的危机,这标志着学步的儿童有了分离和行为意识。接下来发展通过“主动性对内疚”的危机得以继续,危机的成功解决表明在自主性方面的进步。继而,随着恋母情结时期神秘愿望的不可避免的失望,儿童意识到为了与父母竞争,自己必须首先听从父母并且学习把他们做的事情做得同样好。因此,在儿童中期,发展转变为“勤奋对自卑”的危机,能力的证明对于儿童自尊心的培养变得至关重要。这是儿童努力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以便被自我和他人承认具有成人能力的时期。下一阶段便是青春期,通过认同的发展,自主的、主动的、勤奋的自我的庆典建立在一种思想意识之上,这种意识能够支持和证明成年人的赞美是正确的。然而,埃里克森谈论的是什么人呢?

它再一次证明是男孩。埃里克森认为(1968),对于女性来说结果有些不同。她暂时搁置自己的认同,因为她准备去吸引男人,依据这个男人的名字她将被认识,依据这个男人的地位她将被定义,这个男人通过填补她“内在的空间”,把她从空虚和孤独中拯救出来。对于男性来说,认同先于在人们分离和依恋的理想循环中的亲密关系和生殖力,而对于女性来说,这些任务似乎被融合在一起了。亲密关系伴随着认同而发展,因为女性开始意识到自己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被认识的。

然而,尽管埃里克森观察到了性别差异,他对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描述仍保持不变:认同还是先于亲密关系,因为男性的认同继续规定他生命周期的概念。但是,在男性的生命周期中,对成年初期的亲密关系并没有准备。最初的信任感对不信任感阶段只是强调互动关系的类型,这在埃里克森看来意味着亲密关系

和生殖力、而在弗洛伊德那里指的是性功能。余下的便是分离，便是发展本身开始等同于分离，依恋则似乎成为发展的障碍，就像在评价女性时不断出现的情况一样。

埃里克森关于男性在与世界的关系中形成认同，女性在与他人的亲密关系中唤醒认同的看法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曾出现在B.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 1976)解释认同的神话故事中。在《三种语言》中，男性青春期的动力以父子之间的冲突得到形象的说明。父亲给他看来愚蠢至极的儿子最后一次机会——送他去向一位教师学习一年。但是，当儿子返回时，所学到的一切就是“狗的狂叫”。又做了两次这样的尝试之后，父亲在厌倦中放弃了，命令仆人把这个孩子带到森林里杀掉。但是，一直充当这个被抛弃孩子保护神的仆人们同情他，决定只是把他留在森林里。这个孩子从那里游荡到一片被疯狗包围的土地，狗的狂吠让任何人都无法安生，它们也定期吃掉一个周围的居民。现在看来我们的主人公刚好学到能派上用场的东西：他能够与狗交谈并让它们安静下来，因此，这块土地又恢复了和平。既然他获得的其他知识同样也能很好地为他服务，那么他在青春期与父亲——生命周期概念中的一个巨人——的冲突中，便以胜利者的面目出现。

相比之下，女性青春期的动力是通过迥然不同的故事来描述的。在神话故事里，姑娘第一次月经后出现了紧张的消沉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在《白雪公主》和《睡美人》的沉睡中，贝特尔海姆看到自认为是冒险活动必然陪衬的神情贯注。因为，从沉睡中醒来的年轻女主人公没有去征服世界，而是与王子结了婚，她们的认同内在地是由人际关系来规定的。贝特尔海姆和埃里克森的解释都认为，女性的认同与亲密关

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童话故事世界所描写的性别差异,如同M. H. 金斯顿(Maxine Hong Kingston)近来的自传体小说(1977)中女斗士的想象一样,这本小说再现了古老的特洛伊洛斯与克瑞西达,以及坦克雷德与克洛里恩达的故事,它再一次说明刺激的冒险是男人的行为,如果一位妇女进行这种努力,她至少必须穿着像男人。

这些性别差异的说法支持了D. 麦克莱兰(David McClelland, 1975)得出的结论:“性别角色成为人类行为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心理学家在经验研究伊始便发现了性别差异。”但是,既然不提“好些”或者“差些”就难以说清“差异”,既然有了建构唯一衡量尺度的倾向,既然这个尺度通常是来自男性对研究数据(主要地或完全地从研究男性中得来)的解释,并以此为根据而形成标准,心理学家便“趋向于把男性行为视为‘标准的’行为,把女性行为看成是对这个标准的某种偏离”(81)。因此,当妇女不适合心理学期望的标准时,人们通常总是得出结论说,女性本身出现了什么问题。

M. 霍纳(Matina Horner, 1972)发现,妇女身上的问题是她们对竞争性成功表现出焦虑。应用主题统觉测验对人们行为动机进行研究,从一开始便受到性别差异征象的困扰,它们似乎使数据分析混乱和复杂化了。主题统觉测验给解释提供了一条含糊不清的线索——一幅关于将被写成的故事或者故事片断的图画。在心理学家看来,这些故事在反映投射想象的过程中,揭示了人们对自己所领悟到的东西的解释方式,也就是他们给自己的体验,因而大体上是他们建构生活的意义提供概念和说明。在霍纳的著作之前,女性对于竞争性成就显然与男性有着不同的感觉,她们以某种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些状况,或者说这些状况

在她们那里唤起了不同的反应。

在对男性研究的基础上,麦克莱兰把成就动机概念分为似乎是以两个逻辑部分构成的东西——取得成就的动机(“希望成功”)以及避免失败的动机(“恐惧失败”)。从自己对女性的研究中,霍纳确定了第三个范畴,即未必可能避免成功的动机(“恐惧成功”)。女性似乎在竞争性成就方面存在着问题,这个问题好像是来自一种感觉到的女性与成功之间的冲突,它是青春期女性在努力把自己的女性期望、儿童早期的身份证明与在学校获得的,较具男性化的能力结合过程中遇到的困境。这从她对女性成就故事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这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后,安妮发现自己在医学院的班里名列前茅,”通过观察女性在竞争性成就状况下的表现,霍纳报告说,“当很可能或有可能取得成就时,女性预想到伴随成就而来的消极结果,由于这些消极结果的威胁,青年妇女变得焦虑起来,她们积极进取的努力遇到了挫折”(171)。她得出结论说,这种恐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由竞争取得成就的行为中,大多数女性对成功的预测,尤其是对与男性对抗的预测,产生了对一些消极结果的设想,例如被社会拒绝以及失去女性气质的威胁”(1968:125)。

然而,这种成就的冲突也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看待。G. 萨森(Georgia Sassen, 1980)指出,女性表现出来的这种冲突反之表明对由“竞争取得成就的‘另一方面’更为深刻的认识,即通过竞争获得成功所花费的巨大情感代价经常得到补偿——这种理解尽管是混乱的,但还是表明某种基本的含义,即在成功被定义为胜别人一筹的状态下,某种东西是很糟的”(15)。萨森指出,只有当成功通过直接竞争获得时,即当一个人的成功要以另一个人的失败为代价时,霍纳发现的成功焦虑才出现在妇女身上。

在解释认同的危机时,埃里克森(1968)引用 G. B. 萧伯纳的生活说明一个年轻人在不能全身心赞同的事业上过早取得成就的感受。七十岁的萧伯纳在回顾自己的生涯时,描述了自己二十岁时不是由于缺乏成功或者得不到承认,而恰恰是由于这两者过多所带来的危机:“我取得了成就,尽管我感觉到内心的惊慌,事业不但没有把我当成一文不值的骗子来驱赶,反而把我死死地捆住,不容我脱身,因此,二十岁的我由于业务训练有素而被注视,我就像任何健全的人厌恶无法逃脱的什么东西一样从心底讨厌自己从事的职业,1876年3月我逃脱出来”(143)。此时,萧伯纳平静下来随心所欲地写作。由于萧伯纳的拒绝很难解释为关于成就和竞争精神焦虑的依据,因此这对埃里克森意味着“(逐渐)向前发展的一种超常人格的不平凡的业绩”(144)。

我们现在可以基于这些理由提出问题,为什么女性不涉入竞争性成就的冲突?为什么男性表现得如此容易接受和庆贺一种相对狭隘的成功观。让我们记住利弗确证的皮亚杰的观察,男孩在游戏中更关心规则,而女孩则更操心关系,并且经常以牺牲游戏本身为代价;依据乔多罗的结论,男性的社会目标是地位,而女性则是人际关系,我们至此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霍纳由竞争取得成功的故事里,以及由男性完成的故事里,当“安妮”变成“约翰”时,成功的恐惧便趋于消失。约翰被看成是通过规则来游戏的,并且取胜了。他有权利对自己的成功感觉良好。在与那些能力比自己差些的人们分离开来,并确立起认同感之后,他对自我的定位也确立起来,而对于安妮来说,事实上她在医学院班上名列前茅的地位可能并不是她所向往的。

V. 伍尔夫认为,“女性的价值观显然通常有别于男性一直

倡导的价值观”(1929:76)。然而,她又补充说,“社会流行的是男性价值观”。因此,女性愈发地对自己的情感标准提出疑问,并且在听从他人意见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判断。在19世纪的妇女小说中,伍尔夫看到“一种略微地偏离直线的观念,以及在服从外部权威中对这种明确观点的改变”。在20世纪妇女的判断中,人们也能看到对他人观点以及价值观一如既往的服从。妇女寻找或公开讲出自己体验的困难不断地以资格证明和自我怀疑的形式出现,而且也暗示着一个划分开来的判断——迥然不同的公共评价和私人评价。

然而,伍尔夫批评的妇女的服从和混乱出自她视为女性力量的价值观。妇女的服从不仅根源于她们在社会中的屈从地位,也根源于她们在道德上所关心的东西。对他人需要的敏感,承担关怀责任把妇女纳入并非自己的声音之中,导致她们以他人的观点作出判断。因此,以判断的分散和混乱显现出来的妇女的道德劣势无法与妇女的道德力量,即对关系和责任胜于一切的关注分开。不情愿作出判断或许本身就是对他人关怀和关切的表示,在妇女心理发展的过程中,充满了对他人的关怀和关切,这便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妇女心理发展方面成问题的东西。

因此,妇女不仅在人际关系背景下定义自己,而且也根据关怀能力判断自己。妇女在男人生命周期的位置一直是养育者、关怀者和帮助者,是这些她轮流依靠的关系网的编织者。但是,当妇女由此而承担起对男人关怀的使命时,男人们却在自己的心理发展理论中(就像他们在经济上的安排一样)倾向于怠慢和贬低这种关怀。当对个性化和个人成就的专注进入到成年阶段和成熟期,与人的自主性等同起来时,注重关系就成了妇女的弱点而不是人类的力量(Miller, 1976)。

在布劳维曼、沃格尔、布劳维曼、克拉克森和罗森克兰茨(1972)关于性别角色模式的研究报告中,妇女与成年之间的差别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这些研究不断得出的发现是,被认为成年人必不可少的特性——独立思考的能力——明确决定的能力——对行为负责的能力——是同男性结合在一起的,人们无法把它们想象为妇女自身的特点。这些模式也表明当女性在男性领地中处于工具能力的状况下,归为妇女的表达能力——爱与工作之间的分裂。然而,倘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这些模式反映了本身就失去平衡的成年概念——对个性化的自我分离的赞美胜于对与他人联系的赞美,更倾向于自主的工作生活而不是爱与关怀的相互依赖。

目前男人们庆贺的对中年生活中亲密关系、关系以及关怀重要性的发现是妇女从一开始便认识到的东西。然而,由于人们一直把妇女的知识看成“直觉的”或者“本能的”,把解剖学功能与她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心理学家也总是忽视描述这种知识的发展。我在研究中发现,妇女的道德发展集中于对这种知识的说明,并且由此描绘出两性生活中心理发展的关键线索。这一道德发展的主题不仅为人类发展文献中观察评价性别差异时反复出现的模式提供了最终解释,而且更突出地说明了为什么妇女发展的本质和意义如此之久地含糊不清,并被罩上神秘的面纱。

弗洛伊德对妇女公正感(把它看作在拒绝盲目公正方面作出让步)的批评,不仅再现于皮亚杰的著作中,而且再现于柯尔伯格的著作中。当皮亚杰对儿童的道德判断进行说明时(1932),女孩是局外人,出于好奇他把完全省去“男孩”指标中的四个重要条目应用到女孩,因为“孩子”被假定为男性的,正是从

这种研究中,柯尔伯格得出了妇女简直就是不存在的理论。柯尔伯格(1958,1981)描述的从儿童期到成年期道德判断发展的六阶段理论基于对84个男孩的经验研究,柯尔伯格对他们的发展追溯研究了二十余年。尽管柯尔伯格自称自己的发展次序理论具有普遍意义,但他所研究的这群人中并没有包括无法达到他更高阶段的最初的样本(Edwards,1975;Holstein,1976;Simpson,1974)。因此,当以柯尔伯格的标尺进行衡量时,在道德发展上似乎不足的人们当中首先就是妇女,她们的判断似乎停留在柯尔伯格六阶段序列的第三阶段上。在这个阶段上,人们根据人际关系的概念来看待道德,善被等同于帮助他人和令他人愉快。柯尔伯格和克雷默(1969)认为,这个善的概念在成年妇女的家庭生活中发挥作用。柯尔伯格和克雷默暗示说,只有在妇女进入到传统上男性活动的领域时,她们才会意识到这种道德视角和进步是不够的,要像男性一样通向更高阶段——关系服从于准则(第四阶段),准则服从于普遍的公正原则(第五、第六阶段)。

但是,这里有一个矛盾:传统上一直定义为女性的“美德”,她们的关怀以及敏感于他人需要的特性也是表明她们在道德发展上不足的特性。然而,按照这种道德发展观,成熟的概念是从对男性生活研究中推论出来的,反映出个体化在男性发展中的意义。皮亚杰(1970)在对一种人们普遍持有的,从婴儿期建立起来的金字塔式发展理论提出挑战时指出,相反的是,发展的概念是从成熟的制高点,即进步被追溯的最高点上悬挂下来的。因此,成熟概念的改变并不仅仅改变了对最高阶段的描述,而且重铸了对发展的理解,改变了全部的说明。

当人们开始研究妇女并从她们的生活中得出其发展结构

时,不同于弗洛伊德、皮亚杰或柯尔伯格所描述的道德概念才初露端倪,并且宣告了一种不同的发展描述的出现。按照这个概念,道德问题来自冲突着的责任而不是竞争着的权利,解决道德问题需要情境的、以及描述性的思考方式,而不是形式的和抽象的思考方式。这一关系到关怀行为的道德概念围绕着对责任和关系的理解确立起道德发展的核心,正像公平的道德概念把道德发展同权利和准则联系起来一样。

禁锢于柯尔伯格的体系中,妇女对道德问题的这种不同建构可能被看成她们发展失败的重要根据。在把所有责任建构都视为体现了对道德习俗水平理解的过程中,柯尔伯格把道德发展的最高阶段定义为出自对人们权利的反省性理解。权利道德与责任道德的差别在于它强调的是分离而不是联系,它运思的焦点是个人而不是关系,这可以从关于道德本质问题访谈的两种回答中得到说明。第一种回答是参加柯尔伯格研究的一位25岁的男性作出的:

(道德一词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它是对个人权利,其他人权利以及不干涉他人权利的认识。对待他人要像对待你自己那样公平。我认为最基本的东西是保证人的生存权利,这是最为关键的。其次是人们能够按照自己意愿行动的权利,这当然是在不干涉他人权利的情况下。”

(自上次访谈以来,你对道德的看法是如何变化的?)“我想自己现在更多地意识到了个人权利。以往我按照自己的看法,为了自己而严肃地看待它。现在我更多地意识到一个人有权去做什么。”

柯尔伯格(1973)引用这位男性的回答作为对原则性的、体

现了他第五、第六发展阶段人权概念的说明。柯尔伯格在评价这一回答时指出：“在向一种超越自己所处社会价值观念的发展中，他把道德与公正（公平、权利和金科玉律）等同起来，把道德与承认他人权利等同起来，因为这些权利被看做是自然的和内在固有的。人们在不干涉他人权利情况下按照自己意愿行为的权利是限定权利的公理，它先于社会的法律制度而存在”（29 - 30）。

第二种回答是参加权利与责任研究的一位妇女作出的。她的年龄也是 25 岁，当时为法律系三年级的学生：

（对于道德问题是否的确存在着某种正确的解决，或者说每个人的看法同样是正确的？）“不，我认为每个人的意见并非同样正确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有同样有效的意见，人们能够有意地采纳一种行为过程。但也有另一些情况，我认为在这些情况下就存在着正确或者错误的回答，这种回答是为事物本性所固有的，它也固有在所有需要相互依赖才能生存的个体本性之中。我们需要相互依赖，这不仅仅是物质需要，也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一个人的生活是由与他人的合作，努力与他人和谐共存而丰富起来的，就此而言就存在着正确与错误之分，有些东西促进这个目的的实现，有些则背离了它。在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有可能在一些情况下，从显然促进或者有害于这个目标的不同行为过程中作出抉择。”

（以往你对这些事情有过不同的想法吗？）“是的，我认为自己经历过一段把什么事都看做完全相对的时期，我当时认为自己无法告诉人们做什么，人们也无法告诉我做什么，因为你我都要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

（那是在什么时候？）“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猜想那刚好是我

开始明白自己的观点发生变化的时候,因为我自己的判断变化了,所以我感到自己不能证明另一个人的判断。但是,现在我甚至认为即便是在只有一个人将被影响时,我也会依据自己所认识的人性,从与自己所认识的人不相吻合的意义上认为他的判断是错误的。正是从我所认识的东西是世界运行的真理而言,我能够指出人们正在犯错误。”

(你认为是什么东西导致你发生了变化?)“仅仅是因为在生活中见得更多了,并且认识到人们中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你越发意识到一些促进更美好的生活、更完美的关系和更充分的自我实现的事情,而另一些事情通常则趋向于反面,对于促进这些美好东西的事情,人们就说它们在道德上是正确的。”

这种回答也表明了经过一段时期的疑问和怀疑之后,一个人对道德的重新建构,但是,这并非基于个人权利的优先性和普遍性,而是基于她所描述的一种“对这个世界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在这一结构中,道德困境由如何在不干涉他人权利情况下获得自己的权利转变为如何过上一种“道德的生活,它包括了对我本人、我的家庭和一般人的义务”。因而,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在不放弃道德关切前提下如何限定责任。当人们要求这位妇女描述自我时,她说,自己尊重“与我有关系的其他人,也尊重我要负责任的人们。我对这个世界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责任感,我不能仅仅追求自我享乐,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事实赋予我一种责任——尽我所能地把这个世界变成更美好的生活乐园,而无论自己的贡献多么有限”。因此,当柯尔伯格的受试者担心人们相互干涉权利时,这位妇女则担心“当你能够帮助他人时,你可能错过了机会和没有提供帮助”。

J.洛文格(Jane Loevinger)关于自我发展的第五阶段——

“自主性”阶段也强调了这位妇女提出的问题,在这里,置于关系背景下的自主性通过认识到其他人对自己命运也负有责任而定义为对过分责任感的一种调整。在洛文格的说明(1970)中,自主性阶段表明了对道德两分法的放弃,以及用“一种对于现实中的现实人所具有的复杂多样性的感觉”(6)来替代它们,而柯尔伯格原则水平(第五、第六阶段)的权利道德概念则适于达到一种客观上的公平,或者是所有理性者都能同意的对道德困境的解决,责任概念集中于对特有的解决进行限制,以及对仍旧存在的冲突进行描述。

因此,为什么权利和不干涉道德可能以包含着冷漠和不关心对女性构成威胁就变得清楚了。同时也变得明显的是,为什么从男性的视角来说,在坚持情境相对论过程中,责任道德呈现出不确定性和分散性。因此,妇女的道德判断解释了在描述两性发展差异时所观察到的模式,也提出了另一种成熟概念,人们能够通过它来重新评价这些不同并且追溯其含义。一直由于更倾向于关系和相互依赖而被描述为不同的女性心理暗示了一种更为情境化的判断方式,一种对道德的不同理解。由于女性的自我和道德概念不同,也带来对生命周期的不同解释,而且依据不同次序来排列人们的体验。

麦克莱兰(1975)引用关于得墨忒耳与珀耳塞福涅的神话来说明妇女对权力的态度,这一神话与古希腊庆贺了两千多年的“埃莱夫西斯神秘仪式”联系在一起。正如荷马史诗“得墨忒耳圣歌”所讲述的那样,珀耳塞福涅的故事表明在积累和分配资源时相互依赖的力量,这是麦克莱兰在研究体现成熟女性风范的权力动机时发现的。麦克莱兰认为,尽管“得出没有人知道这种神秘仪式是什么的结论是时髦的,但人们还是认识到它或许是

最重要的宗教仪式,甚至按照历史片断的记载,它是由妇女并且是为了妇女而举行的,尤其是在男人以狂欢节的祭礼开始接管她们之前。”因此,麦克莱兰把这一神话看做“女性心理特有的表现”(92)。它也是一个同样优秀的生命周期的故事。

得墨忒耳的女儿珀耳塞福涅在草地上与女伴们玩耍,看到一朵水仙花便忙跑去采摘。当她摘花时,大地裂开了,她被冥王劫持并带到地下的王国。大地女神得墨忒耳失去女儿后悲痛欲绝,便不允许任何生物生长。维持地球上生命的庄稼枯萎了,人和动物死去了,直至宙斯同情人们的痛苦,劝服自己的兄弟把珀耳塞福涅归还给她的母亲。但在离开前,珀耳塞福涅吃了一些石榴树种子,这确保她每年都得有一部分时间与冥王一起呆在地下。

妇女发展难以捉摸的神秘性在于它认识到依恋在人类生命周期中的持续意义。当发展祈祷和吟唱分离、自主性、个人以及自然权利的颂歌时,妇女在男人生命周期中的位置是保护这种认识。珀耳塞福涅神话通过提醒我们自恋导致死亡来直指这种自恋观的错位,提醒我们土壤的肥沃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同母女关系的继续保持着联系,生命周期本身的变化来自男女两性世界之间的交替。只有在生命周期的理论家把注意力分散开来,像他们一直与男人共同生存那样与妇女生活在一起时,他们的观点才会把两性的体验包括进来,他们的理论才相应地变得更为充实。

第二章 关系的意象

1914年，弗洛伊德以《论自恋》一文勉强吞咽了一想到“放弃观察无聊的理论争论”就会感觉到的反感，并且扩展了自己心理学的疆域。他把爱的能力等同于成熟和心理健康，在对这一能力发展的追溯中，他把这一能力的来源置于对母亲的爱与自爱之间的比较中。然而，在把爱的世界如此划分为自恋以及“对象”关系的过程中，他发现在男人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清楚时，妇女的发展却越发地模糊。这一问题出自母亲与自我之间的比较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的关系意象。在勾勒人类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依照的是男性的生活意象，弗洛伊德无法追溯妇女在关系、道德、或者是一种清楚的自我意识方面的发展。这一把自己的理论逻辑应用于妇女体

验方面的困难使他最终把妇女排除出去,把她们的关系说成像她们的性生活一样,“是心理学上的‘黑暗的大陆’”(1926:212)。

因此,对于笼罩在妇女发展方面的阴影的解释问题出自被观察到的关系体验上的差异。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尽管与妇女朝夕相处,在其他方面观察得细腻透彻,但却感觉到她们的关系似乎越发地神秘起来,难以察觉,也难以描述。这种神秘在表明理论如此无视于观察的同时,也表明妇女发展被一种特有的人类关系概念掩饰起来。既然关系的意象形成对人们发展的描述,妇女包括进来之后,由于意象上的变化也暗示着整个说明的变化。

给解释妇女发展带来问题的意象上的变化,可以由两个 11 岁孩子的道德判断来说明,这两个不同性别的孩子把同一个道德困境看作两种迥然不同的道德问题。现行的理论对男孩的思路和逻辑给予明确的说明,但对女孩的思路和逻辑却缺乏认识。女孩道德判断脱离现有发展评价范畴的选择意味着突出了解释问题,而并非体现了本身的性别差异。在补充了一种基于女孩意象的新的解释方法之后,便不仅有可能看到从前没有察觉到的发展,而且也有可能在不把它们从好到坏排列起来的情况下,认识关系理解上的不同。

这两个孩子都是在校的六年级学生,参加了权利与责任的研究,这是为了解释不同的道德和自我概念而设计的研究。这项研究的样本选取集中在性别与年龄的变量,它通过在高水平上把握住衡量——与道德发展相联系的智力、教育和社会阶层因素,最大化地释放发展的潜能,至少按照现有的标准衡量是这样。这两个孩子——艾米和杰克都是聪明而富有表达能力的,按照 11 岁孩子的抱负来讲,他们没有拘泥于一般的性别角色模

式,因为艾米希望成为一个科学家,而杰克对英语的喜爱胜过了数学。但是,他们的道德判断似乎一开始便肯定了人们熟悉的性别差异的看法,表明在男孩发展形式逻辑思维的同时,女孩在早期学校阶段的道德发展在青春期却作出让步。

这两个 11 岁的孩子被要求去解决一个困境,这是柯尔伯格为了衡量青春期道德发展而设计的系列困境之一,它通过指出道德规范之间的冲突以及说明解决冲突的逻辑来进行。这一特定的困境是,一个名叫海因茨的人在思考是否去偷一种买不起的药以挽救妻子的性命。按照柯尔伯格的访谈程序标准,对这个困境是这样描述的——海因茨处在妻子患病,而药剂师拒绝低价出售药品的二难境地,随之提出的问题是:“海因茨是否应当偷药?”然后通过一系列问题去说明赞成和反对偷药的理由,这些问题通过改变和扩展困境的设计参数,揭示出道德思考的基础结构。

11 岁的杰克一开始便态度明确:海因茨应当偷药。在像柯尔伯格那样把困境建构成财产与生命价值冲突的过程中,他察觉出生命价值的逻辑优先性,并运用这一逻辑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举个例子说,人的生命比金钱更贵重,如果药剂师只赚 1000 美元,他仍旧可以生活下去,但是如果海因茨不去偷药,他的妻子就会死去。(为什么生命比金钱更贵重?)因为药剂师日后能够从其他患癌症的富人那里赚得 1000 元,而海因茨却不能再得到妻子。(为什么不能?)因为人们全都是不相同的,而你又无法让海因茨的妻子复活。”

在被问到如果海因茨不爱自己的妻子,他是否还应当偷药时,杰克回答说,他还是应当偷,因为不仅“在仇恨与谋杀之间存

在着区别”，而且即使他被抓到，“法官或许也认为他这样做是正确的。”当被问到如果偷药，海因茨将违法的事实时，杰克认为，“法律也有错误，你无法为自己能够想象到的任何事情都立下一条法律。”

因此，当考虑到法律，承认它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时（杰克认为法官“应给海因茨最轻的判决”），杰克也看到法律是人为的，因此也会犯错误和发生变化。然而，他对海因茨应当偷药的判断，像他关于法律也有错误的观点一样，取决于一致的假定，以及社会关于道德价值的一致舆论，这种一致性让人认识并期望其他人承认“要去做的正当之事”是什么。

由于逻辑上的吸引力，这个 11 岁的男孩置真理于数学之中，他认为数学是“唯一完全合乎逻辑的东西”。在把道德困境设想为“类似于人类的数学问题”时，他着手建立等式和运算出答案。既然他的答案是由理性推论出来的，他也假定任何遵循理性的人也都可以得出相同的答案，因此法官也会认为偷药是海因茨要做的正当之事。但是，他也意识到逻辑的局限性。当人们问他对于道德问题是否有正确的答案时，杰克回答说，“只是在判断问题上存在着正确与错误之分，”因为行为的因素是可变的和复杂的。在解释一个最善良的动机如何造成最灾难性的结果时，他说道，“就像在电车上你为一位老妇人让座一样，如果这辆电车撞了车，座位被抛到车外，这可能就成为老妇人死亡的理由。”

发展心理学理论充分地解释了这个孩子的观点，他正处在儿童期到青春期的关口上，处于皮亚杰所描述的儿童期智力的顶峰，开始通过思考发现一个更广阔的可能性世界。前青春期是由运用规范思考和自我描述来把握的，这个自我仍旧维系在

他现实的儿童世界里——他的年龄、生活的城市、父亲的职业、他喜爱和不喜爱的事物以及他的信念。但是,由于他的自我描述反映出一个人的自信——按照埃里克森的术语,他已经达到勤奋胜于自卑的一种可喜的平衡——有能力、自我肯定、完全理解了游戏的规则,所以他表现出规范思考的能力,反思的能力以及逻辑推理的能力,这使他从对权威的依赖中解放出来,自己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种自然出现的自主性遵循了柯尔伯格道德发展六阶段的轨道,体现了一个三水平的发展过程——从对公正基于个人需要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理解(第一,第二阶段)到一种社会共同赞成的公正概念(第三,第四阶段),最后达到对公正的一种原则化的理解,它依赖于独立的平等和互惠逻辑(第五,第六阶段)。当这个 11 岁的男孩按照柯尔伯格的标尺被判定处于第三、第四阶段交叉的习俗水平时,他那把推理逻辑用于解决道德困境的能力,把道德同法律分开的能力,看出法律如何能被发现有错误的的能力都表明了柯尔伯格等同于道德成熟的、原则化的公正概念。

相反,艾米对困境的反应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一种由于没有逻辑而阻碍发展的印象,一种独立思考方面的无能为力。当被问到海因茨是否应当偷药时,她似乎有点含糊其辞和犹豫不定地回答说:

“这个嘛,我认为不应当偷。我想可能有除了偷药之外的其他办法,比如说他能借到钱,贷款或其他什么的,但是他的确不应去偷,他的妻子也不应当死。”

当人们问她为什么海因茨不应当偷药时,她既没有考虑财产,也没有考虑法律,而是想到做贼对海因茨与妻子之间关系产生的影响:

“如果他偷了药,他或许因此挽救了妻子,但是,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可能必须进监狱,因而他的妻子可能再次病得更重,而他又无法再次得到药品,这或许就不是件好事。所以,他们应当真正地好好坐下来商量一下这件事,寻找某种其他途径弄到钱。”

艾米没有把这个困境看做人类的数学问题,而是按时间顺序来描述关系,她考虑到妻子还需要丈夫以及丈夫还要关怀妻子,并且试图以维护而不是切断联系的方式对药剂师的需要作出反应。正因为她把妻子的生存与保持关系联系在一起,因此她在关系背景下考虑妻子生命的价值,认为让她去死是不正当的,因为“如果她死去,会伤害许多人,也包括她自己”。因此,艾米的道德判断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如果某人有什么能让别人存活下去的东西,那么不把它交给需要的人就是不正当的”,她认为这个困境中的问题并非出自对药剂师权利的断言,而是来自他反应上的失败。

当访谈者遵循柯尔伯格在困境建构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访谈时,艾米的回答实际上保持不变,在各种试探中,她既没有解释也没有修正自己最初的反应。无论海因茨是否爱自己的妻子,他都不该去偷药或者让她死去;如果换上一个奄奄一息的陌生人,艾米认为,“如果这个陌生人身边没有什么人或者没有她认识的人”,那么海因茨也应当试图挽救她的性命,但是他不应当去偷药。然而,当访谈者通过问题的重复表明人们听不到她给出的答案或者是答得不正确时,艾米的信心开始下降,回答也变得越发地拘谨和不确定。当再次被问到海因茨为什么不应当偷药时,她只是重复说,“因为这是不正当的。”当再次被要求解释为什么时,她重申说做贼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而且无力

地补充说，“如果他偷了药，他可能不知道让妻子怎样服用，所以他的妻子仍旧可能会死。”由于没有按照道德逻辑把这个困境看成一个独立的问题，她也不能分辨出解决问题的内在结构，因为她自己对问题进行了不同的建构，柯尔伯格的概念也对她退避三舍。

不同的是，在把世界看成由关系而不是由独立的个人构成，把世界看成通过人们之间的关联而不是通过准则体系内在联系起来的过程中，她发现这一困境本身在于药剂师没有对这位妻子作出反应。强调“当人们的生命能够被挽救时，对他们来说去死就是不正当的”，她假定说，如果这位药剂师看到了他拒绝低价出售药品的结果，他将意识到“自己恰好应当把药品给予这位妻子，然后让她的丈夫日后再把钱还给自己”。因此，她想出的解决困境的办法是让药剂师更为清楚这位妻子的病情，或者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便向其他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求救。

正像杰克自信法官将同意偷药是海因茨应做的正当之事一样，艾米也自信地表示说，“如果海因茨与药剂师进行足够长时间的协商，他们能够找到除了偷药之外的办法。”当杰克考虑法律“有错误”时，艾米也把这个情景看成一个错误，相信“世界应当更公平地分配财产，因此人们将不再会去偷盗”。所以，两个孩子都承认达成一致的需要，但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协调——杰克通过逻辑体系和法律制度来进行摆脱个人的协调，艾米通过关系中的交流进行个人的协调。正像杰克依据逻辑惯例推断出这一困境的解决，假定人们将遵循这些惯例一样，艾米也依赖一个交流的过程假定了联系，相信自己的声音将被听到。但是，当杰克关于一致性的假定由于他的回答与所提问题的逻辑一致而得到肯定时，艾米的假定则被交流上的失败掩盖起来，访谈者

也无法理解她的回答。

尽管在对问题的重复中,在最终迂回的解释上艾米的访谈明显遇到挫折,但对问题解释的焦点仍旧在于如何评价她的回答。当使用柯尔伯格的阶段定义和道德发展次序来考虑时,艾米的道德判断同男孩相比似乎处在较低的阶段。她的回答被当作第二、第三阶段的过渡给分,似乎呈现出对世界无能为力的情感,没有能力系统地思考道德或者法律概念,不情愿对权威提出挑战,或者对已接受的道德真理逻辑进行思考,甚至无法设想直接采取行动去挽救生命,或者设想如果采取这样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因为她对于关系的依赖似乎表现出一种连续的依赖性和脆弱性,所以她通过交流的方式解决道德困境的信念好像也是天真的和认识上不成熟的。

然而,艾米的自我描述给人以截然不同的印象。这个具有前青春期标志的孩子再一次以自己的感觉描述出一个孩子的把握,对自己信念的自信,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完成某种有意义事情能力的肯定。在把11岁的自己描述为“发展的和变化的”时候,她说道,自己“现在对一些事物的看法不同了,正因为我现在真的很好地认识了自己,我也就更充分地认识了这个世界”。但是,她所认识的世界是一个不同于柯尔伯格对于海因茨困境设计所反映出来的世界。她的世界是一个关系和心理学真理的世界,在这里,人们彼此联系的意识带来对相互责任的承认,以及对需要作出反应的知觉。从这一角度上看,她把道德理解为对关系的承认,相信交流是解决冲突的方式,这种对于令人信服地呈现困境之后便会得到解决办法的信念,似乎远非是天真的和认识上不成熟的。正像杰克的判断反映出公正探讨的逻辑一样,艾米的判断包括了构成关怀伦理学核心的洞察力。她对“真

理方法”的最初意识,对非暴力解决冲突原则的坚持,对补偿性关怀行为的相信,导致她并没有把困境中的行为者排列为权利竞争中的对手,而是当作关系网络中的成员,所有人都要依赖这个网络的延续。因此,她对困境的解决在于通过交流激活这个网络,通过加强而不是切断联系确保把这位妻子包括进来。

但是,艾米回答的不同逻辑引起人们对访谈解释本身的关注。访谈被设想为一种讯问,似乎并非作为一种对话——对话本身也表现出道德尺度,关系到访谈者权力的使用以及尊重的表示。随着访谈概念上的变化而立即变得明确的是,访谈者在理解艾米回答中产生的问题来自这样一个事实:艾米正在答非所问。她正在思考的不是海因茨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当行为的问题(“海因茨**应当**偷药吗?”),而是海因茨在意识到妻子的需要后,应当**如何**以行为作出反应的问题(“海因茨**应当**偷药吗?”)。访谈者对行为方式不以为然,假定它是一个事实问题;艾米假定行为的必要性以及考虑应当采取什么方式。访谈者想象一种并非按照柯尔伯格构想来回答方面的失败意味着没能听出艾米的问题,看出她回答中的逻辑,没能分辨出从一个方面来说,看似对困境的逃避在另一种意义上则表明对问题的承认,以及对更稳妥的解决办法的寻求。

因此,在海因茨的困境中,两个孩子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道德问题——杰克看到能够通过逻辑推理解决生命与财产之间的冲突,艾米看到必须以自己的针线来修补人们关系的断裂。在问到由道德领域的不同概念带来的不同道德问题时,孩子们作出完全不同的回答,这些回答在越发通向道德成熟的阶梯上连续性地排列,这一由男孩的回答逻辑来标定的阶梯忽视了女孩判断所揭示的不同真理。对于“他看到了什么她没有见到的东

西”问题,柯尔伯格理论提供了现成的答案,体现于杰克的判断在充分发展阶段上的得分要高于艾米判断在道德成熟阶段的得分;对于“她看到了什么他没有见到的东西”问题,柯尔伯格理论没有作答。既然艾米的大部分回答经过柯尔伯格计分系统的筛选纷纷落第,那么在柯尔伯格看来,她的回答似乎超出了道德领域。

然而,正像杰克揭示了对证明逻辑的一种深奥的理解,艾米对选择本质的理解也同样是深奥的。当她意识到“如果有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可走,如果你选择了一条,你将绝不会知道倘若你选择了另一条会发生什么事情”时,她解释说,“这就是你必须把握的机会,像我说的那样,它的确是一种猜测。”为了“以简单的方式”说明自己的观点,她描述了自己在帐篷里过夏的选择:

“我绝不知道如果我选择呆在这里将会发生什么,如果在帐篷里出了什么问题,我将绝不会知道是否我呆在这里情况会更好。在选择问题上你的确没有办法,因为你无法马上同时实践两条路,所以你必须作出决定,但你绝不知道另一种决定的结果又当如何。”

这样,这两个非常聪明,对生活很有感受力的11岁孩子尽管采取的方式不同,但都表现出对道德不同途径的理解,对冲突和选择不同方式的思考。在解决海因茨困境的过程中,杰克以做贼来避免对抗,求助法律去协调争执。在把权利等级制转换为价值等级制时,他通过把冲突建构成非个人的维护权利的冲突,使潜在的爆炸性冲突失去力量。这样,他把道德问题从人与人之间关系中抽象出来,按照公平逻辑寻找一条客观途径确定由谁来赢得这一争执。但是,这种等级秩序,连同它对输赢的意象,以及它所包含的暴力可能逊色于艾米把困境建构成一个联

系的网络,一张通过交流过程来编织的关系网的做法。伴随这一变化,道德问题由不公正的垄断,财产胜过生命的问题变为没有必要的排除问题,即药剂师没有对这位妻子作出反应。

这种道德形式上的变化,以及相应的关系意象方面的变化也体现在两个8岁孩子的回答中,这两个孩子是杰弗里和卡伦,他们被要求描述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下,自己不确定做什么是正确的:

杰弗里:“当我真的想去朋友那里,而我母亲在清理地下室时,我想着我的朋友,然后又想到自己的母亲,接下来想自己要做的正确的事情。**(但是,你如何知道它是要做的正确的事情呢?)**因为一些事情排列在另一些事情之前。”

卡伦:“我有许多朋友,我不能总和他们所有的人一起玩,所以必须与每个人轮流着玩,因为他们全都是我的朋友。但是,如果出现有人总是孤单的情况,我将与他们一起玩。**(当你试图作出决定时,你所想到的事情是什么?)**噢,有人总是孤单寂寞的。”

当杰弗里建立一个等级秩序解决欲望与责任之间的冲突时,卡伦描述了一个把自己所有朋友都包括进来的关系网络。两个孩子都解决了排除和以选择建立优先性的问题,但是,当杰弗里思考把什么排在前面时,卡伦却想到谁被忽略了。

对孩子们思考道德冲突和选择的等级与网络意象之间的比较说明了两种道德观点,它们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有次序的和对立的。但是,这种不同的建构有悖于按照等级制排列差异的发展理论的偏见。发展理论次序与男孩思维结构的吻合同现行理论与女孩思考中所显示的结构不同形成对比。但在比较中,并不能看出一个孩子的判断作为另一个孩子判断的前提出现。因此,这就产生了这些视角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不同的意义何

在？这两种思考方式如何发生联系的？这些问题可以由考虑11岁孩子的道德理解力与他们对自我描述之间的关系得以说明：

(你如何对自己描述自己?)

杰克：“完美无缺。这是我自负的一面。您想让我选择什么途径来描述自己呢？”

艾米：“您指的是我的性格？(你是怎么想的呢?)好吧，我不知道。我把自己描述为，噢，您指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必须描述一个自己清楚在某种程度上他就是你的人，你会说些什么呢?)

杰克：“我将从11岁开始。杰克(名字)。我必须加上自己住在哪里(城市)，因为它是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还要说我父亲是一位医生，因为我认为这多少对自己有点影响，我不相信犯罪，除非你的名字是海因茨；我认为学校是令人厌倦的，因为我认为这对一个人的性格有点影响。我不是那种知道如何描述自己的人，因为我不知道如何看出自己的人格。**(如果你必须说出你实际上将要描述自己的方式，你会说些什么呢?)**我喜欢乡巴佬式的玩笑。我的确不喜欢认真对待工作，但是我能完成学校的所有功课。在学校里遇到的每一个问题我都能够解决，除非是那些利用知识的问题，在我读了书后，我还是能解决它们，但是，有时我并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容易的家庭作业上。我对体育也很着迷。我与许多人不同，我认为这个世界仍有希望……我喜欢自己认识的许多人，我过着幸福的生活，比我曾经见过的任何生活都美好，依我的年龄来看我是个高个儿。”

艾米：“这个嘛，我会说自己是那种喜欢学校和学习的人，这是我一生都想做的事。我想成为某个领域的科学家或者类似的

什么人,我想去做事,去帮助人们。我认为自己就是这样一种人,或者这是我试图成为的人。我想去做某种帮助他人的事情。(为什么这样做?)哦,因为我认为这个世界有许多问题,我想每个人都应该试图以某种途径帮助他人,我正在选择通过科学来达到目的。”

11岁的男孩说出了人们熟悉的自我定义,这在年轻的S.代达罗斯(Stephen Daedalus)地理书的标题那里得到共鸣:《他自己,他的名字和他在哪里》,而且也在《我们的城市》的描写中出现,它展示出—个定义人们存在的、跨时空坐标的等级秩序。在通过确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特殊位置来描述自己的特点时,杰克依据他的能力、他的信念、他的身高把自己同这个世界分开。尽管艾米也列举了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期望以及信念,但她是通过与世界的关系来确定自我的,通过与他人发生联系的行为来描述自己,通过自己提供帮助的能力来说明联系。杰克有一个衡量自身价值的完美理想,艾米也有一个与之不同的关怀理想,她也依据这个理想来衡量自己行为的价值。当她把自己置身于世界的关系中,选择通过科学来帮助他人时,杰克则把世界置于与自我的关系中,因为这个世界定义了他的性格,他的位置以及他生活的质量。

通过分离定义的自我与通过联系来描述的自我之间的对比,依据抽象的完美理想衡量的自我与通过具体的关怀行为评价的自我之间的对比变得越来越清楚了,这种比较的意义通过考虑这些孩子对他人与对自我责任之间冲突的不同解决方式得以扩展。责任问题带来一个困境,它是由妇女的工作义务与家庭关系义务之间的冲突产生的。当这一冲突的细节丰富了艾米回答的主题时,杰克则把义务问题从它得以产生的背景中抽象

出来,以自己迅速扩大的联系意象来取代亲密关系的主题:

(当对自己的责任与对他人的责任发生冲突时,应当如何进行选择呢?)

杰克:“你应当对他人尽四分之一的职责,对自己尽四分之三的职责。”

艾米:“嗯,它的确要依情况而定。如果你对其他人有责任,那么你就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承担这一责任,但是,当这种程度事实上构成对你的伤害,或者阻止你去做自己的确想做的事情时,那么我想或许你应当把自己摆在首位。然而,如果你对某个特别亲近的人负责,你就必须决定谁是更重要的,你自己还是那个人,就像我说的那样,它的确取决于你是哪种人,以及你如何感觉其他人或者涉及到的人。”

(为什么?)

杰克:“因为在你的决定中,最重要的因素应当是你自己,不要让你自己完全受他人的支配,但是你必须考虑到其他人。所以,如果你想用一颗原子弹炸毁自己,你或许应当选择用一颗手榴弹这样做,因为你要考虑到也将会死去的邻居。”

艾米:“嗯,就像一些人把自己和为了自己的事情摆在他人以及他人事情之前一样,一些人实际上关怀着他人。例如,我不认为你的工作如同你挚爱着的人们,比方说你的丈夫、你的父母或者挚友一样重要。对于你真正关怀的人——或者如果关怀恰好是你的职责,或者对于某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人,你或许要把自己摆在首位——但是如果对于你真正爱着的,如同爱自己一样爱着的,或者甚至是你爱他胜过自己的人,你必须决定什么是你更爱的东西,哪个人,哪件事物或者是你自己。**(那么你如何作出决定呢?)**嗯,你必须进行思考,你必须考虑到两个方面,你必

须思考对于每个人,或者对于你本人来说何者更好,何者更为重要,何者将使每个人更幸福。例如,如果其他人能够让别人做一件事,无论这事是什么,或者实际上并不特别需要你,那么或许你去完成自己想做之事更好,因为其他人将与另一个人情投意合,所以他们仍旧是幸福的,而且你也会是高兴的,因为你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责任意味着什么?)

杰克:“它意味着我在做某事时要更充分考虑到他人,就像我想扔一块石头,不能把它扔在窗子上,因为我考虑到必须支付窗子玻璃钱的人,你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为,因为你必须与他人生活在一起,在社会中一起生活,如果你做了伤害所有人的事,许多人会在痛苦中死去,做这种事就是不正当的。”

艾米:“它意味着其他人正在指望你去做某件事,而你恰好不能作出决定,‘好吧,我宁愿做这件事而不做那件事。’(还有其他类型的责任吗?)是的,对你自己的责任。如果某件事看起来实在有趣,但做这件事可能会伤害你自己,因为你并不知道如何去做。你的朋友告诉你说,‘喂,来吧,你能够做它,不必担心。’倘若你真的害怕去做这件事,如果你想到可能会伤害自己,你就不应该做这件事,因为你必须对自己负责,那是你对自己的责任。”

杰克又一次把困境建构成数学等式,推论出一个指导困境解决的公式:四分之一对他人负责,四分之三对自己负责。从对自己的责任出发(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责任),他进而考虑到自己对他人的责任范围。从一个分离的,但是承认“你必须与他人生活在一起”的前提出发,他在寻求限制干涉,因此也减少伤害的准则。在他的建构中,关于限制行为的责任,关于约束攻击

性的责任是由一种认识来指导的,即自己的行为能够对他人产生影响,正像他人的行为能够对自己造成干涉一样。因此,限制干涉的准则给社会生活带来安全,通过互惠保护了自主性,把同样的考虑扩展到他人和自我。

对于冲突着的责任问题,艾米又一次联系情境而不是概念作出回答,强调“依情况而定”,指出选择如何受当事人以及情况变化的影响。从联系的前提出发,即从“如果你对其他人有责任,你就应当承担这个责任”出发,她进而考虑到对自己负责的范围。在解释分离的因素时,她想象了通过做你自己想做之事,你将避免伤害自己的情形,或者当你这样做时,你将不会因此而减少其他人幸福的情形。对她来说,责任代表着反应,代表着对行为的扩展而不是限制。因此,它意味着一种关怀行为而不是对攻击性的约束。在再次寻求把每个人的需要都最大限度地包括进来的一种解决时,她试图以一种“将使每个人更幸福”的方式来解决困境。因此,杰克关心限制干涉,而艾米集中于对需要作出反应,对杰克来说限制的条件是,“不要让你自己完全受他人的支配,”但对艾米来说,当出现“其他人正在指望你”,而“你恰好不能作出决定”的情况时,“好吧,我宁愿做这件事而不做那件事。”这些回答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明显的,因为假定了联系的艾米始于对分离因素的解释,而假定了分离的杰克始于对联系因素的解释。但是,分离或者联系的优先权导致了对自我以及关系的不同意象。

在这些不同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男孩回答中的暴力意象,描述了一个危险对抗的,以及爆炸性联系的世界,而艾米在这里却看到一个关怀和保护的世界,一种与“你如同爱自己一样爱着的人,或者甚至是你爱他胜过自己的人”的共同生活。既然道德概

念反映出对社会关系的理解,这种关系意象上的不同就产生道德命令本身的变化。对杰克来说,责任意味着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因为他考虑到了他人;对艾米来说,它意味着去做他人指望自己去做的事情,无论自己是否想做。两个孩子都涉及到避免伤害,但却以不同的方式考虑这个问题——杰克把伤害看成攻击性的表示,艾米却把它看做反应上的失败。

如果以任何一个孩子作出的回答来描述发展的轨迹,也会相应地追溯到一条不同的发展途径。对于杰克来说,发展意味着越发地把其他人看做是与自己平等的,发现平等是一条带来联系安全的途径。对艾米来说,发展跟随着把自己包括在一个不断扩展的联系网中,并且发现分离能够是保护性的,不必体现为孤立。这些不同的发展途径,尤其是体验分离和联系的不同方式都与自我的声音紧密相联,如果以男孩发展来代表两性青春期发展的唯一路线,在说明女孩发展时就会遇到层出不穷的问题。

既然发展一直以分离作为前提,而且被说成是对失败了的关系的一种叙述——一种对前恋母情结的依恋,对恋母情结的幻想,对前青春期密友以及青春期爱恋的叙述——那么分离背景下的关系只是连续性地暴露出来,并让步于一种越发突出的个体化,由于在生活中关系的延续,女孩的发展似乎是成问题的。弗洛伊德把女孩青春期的这种内化归结为对当初自恋的一种强化,标志着爱或者“对象”关系的一种失败。但是,如果把这种内化建构在不断联系的背景下,它便代表了对自我的一种新的回应,一种关怀的扩展而不是关系的失败。这样,一直被看作不适于由男性体验得出的关系范畴的女孩,使人们注意到对关系的假定,这种关系一直以危险的分离意象取代爆炸性联系的

意象报告着对人类发展的说明。

这种转变的意义可以通过对暴力意象的研究来揭示,这种意象可以从大学生根据贴在炸药上的图片所编写的故事中看到,这项研究报告了在人们可以看到暴力的地方,以及在暴力意象作品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性别差异。分离和联系的主题构成这一研究的核心,这项研究是由我和 S. 波拉克设计的,它基于对研究之前大学生所写的故事的分析,这些故事是同学们在讨论动机的心理学课堂(Pollak and Gilligan, 1982)上作为课堂练习完成的。这项研究始于波拉克对男同学故事中看起来稀奇古怪的暴力意象的观察,作为他们分析场景的图片似乎是一片和平景象:一对伴侣坐在河边的长椅上,旁边的河上有一座矮桥。在对这张图片作出反应时,班上的 88 名男生中有 21% 以上写出了包括暴力情节的故事,其中包括屠杀、自杀、刺伤、绑架或者强暴。相反,班上的 50 名女生中,没有人把这一场景同暴力联系起来。

这种在男性亲情故事中对暴力的观察,呈现给我们对霍纳(1968)报告可能性的推论,她报告了妇女在竞争成功故事里的暴力意象。霍纳在描述妇女对伴随成功而来的消极结果的预料中,使她的“稀奇古怪或暴力意象”范畴具体化,并引证了快乐的安妮的故事,安妮在医学院的班里名列前茅,被嫉妒她的同学们痛打成终身残废。这种对于男性亲密关系幻想中暴力意象的推论和观察可以由一个故事得到说明,这是由一个男生在课堂上根据河边长椅的场景来完成的:

“尼克看到自己的生命从眼前逝去。他能感觉到更加刺骨的寒冷。他已经落到冰窟窿里多长时间,是 30 秒还是 1 分钟?他无法长时间地支撑自己从二月中旬冰冷的查尔斯河的小支叉

中爬上来。他接受同寝室的萨姆的挑战横渡这条冰河有多么愚蠢。他一直知道萨姆恨自己。仇恨他的富有,尤其仇恨他同与自己青梅竹马的玛丽订婚。但是,直到现在尼克才意识到玛丽也恨自己,并且真正地爱着萨姆。他们两个人仍旧若无其事地坐在河边的长椅上看着尼克下沉。他们或许很快就要结婚,他们或许可以从人身保险政策中获益,玛丽会是受益者。”

引起观察者注意的是从哪里看出危险,波拉克和我怀疑是否男女能在不同的情况下察觉危险,并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危险。顺着男性亲密关系中对暴力的最初观察,我们着手发现是否在各种成就以及亲密关系状况下,在暴力幻想的分布上存在着性别差异,是否暴力以亲密关系和竞争成功的形式同男女两性发生不同的联系。造成暴力意象研究的结果确认了先前在攻击性研究中对性别差异的报告(Terman and Tyler, 1953; Whiting and Pope, 1973; Maccoby and Jacklin, 1974),这个报告揭示了男人故事中暴力发生的比率高。在动机课上的88名男生中,51%的人至少写了一个包括暴力意象的故事,与班上50名女生中的20%形成对比,没有女生写出一个以上的暴力故事。但是,这项研究也揭示出暴力幻想分布和内容方面的性别差异,表明男女在关系意象途径方面的差异。

在用来测试的六幅图片中,有四幅用于这一分析目的,因为它们对成就以及亲密关系提供了明确的说明。两幅表现了处于亲密关系中的男女——一对伴侣坐在河边长椅上的情景,以及两个杂技演员彼此搂着腰,男的用膝盖勾住秋千,女的则被腾在半空中。两幅图片表现了非个人场合工作着的人们——一个男人独自坐在高楼中一间办公室的书桌旁;以及两个身着白罩衣的妇女正在实验室里工作,前面一位妇女手举实验试管,后面一

位妇女正在观看。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比较根据这两套图片写成的故事。

以组为单位分析班上的男生,他们就个人亲密关系场合提出的暴力要多于非个人成就场合。就男生而言,25%的人只对亲密关系的图片写出了暴力故事,19%的人对亲密关系和成就场合写出了暴力故事,7%的人只对成就场合写出了暴力故事。相比之下,妇女在非个人成就场合看到的暴力要多于亲密关系场合;16%的妇女对于成就图片写出了暴力故事,6%的人对亲密关系场合写出了暴力故事。

一个男生完成的尼克故事表明了危险与亲密关系之间的联系,一个女生写的赫格斯特德小姐的故事也是如此,这体现于把暴力加入成就的场合,把危险与竞争成功联系起来:

“实验室里又一个令人厌烦的日子,这意味着脾气暴躁的赫格斯特德小姐总是在学生背后点点戳戳。她已经在尼哈姆乡村高中工作了40年,每次化学课都是千篇一律。她正在观看班上的好学生简的实验。她总是走到简的身边当众评价说,简的实验总是正确的,她是班上唯一真正刻苦的学生等等。赫格斯特德小姐一点也不知道简正在提炼一种放在午后自己咖啡中的砒霜。”

如果攻击性被想象为对知觉到的危险作出的反应,那么暴力意象研究结果强调妇女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下产生对危险的知觉,并以不同方式来解释危险——比起成就而言,男人更为通常地在亲密关系中看到危险,认为危险来自亲密关系,妇女则在非个人成就场合看到危险,认为危险来自自由竞争取得成功。男人在亲密关系故事中描述的危险是陷阱或背叛,被困于令人窒息的关系中或者由于拒绝和欺骗而蒙受耻辱。相反,妇女描述的

成就故事中的危险是孤立,担心出人头地或者一旦成功,自己将被孤立起来。在赫格斯特德小姐的故事里,唯一明显的暴力原因是简被作为最优秀的学生突出出来,因此使她与自己的同学分开。她以提炼放在教师午后咖啡中的砒霜作为回报,然而,赫格斯特德小姐所做的一切只是赞扬简出色的功课。

随着图片中人际关系的愈发亲密,男同学故事里的暴力意象也在增加。班上的女生在解释坐在桌旁的男人(这是唯一一张独自一人的图片)时的暴力意象频率最高,而班上的男生更为经常地从秋千上杂技演员的场景中看出暴力(这是唯一一张人们接触的图片)。因此,男女似乎可能以不同的方式体验依恋和分离,每一性别都觉察到异性所没有看到的危险——男人是在联系中,妇女是在分离中。

但是,妇女对危险的察觉有悖于通常期望的方式,按照通常的方式,杂技演员同书桌前的男人相比,似乎处在更危险的境地,妇女的知觉对通常的解释方式提出质疑。在攻击性方面的性别差异通常采取以男性回答为标准的方式来解释,因此,在妇女那里攻击性的缺乏被看做应当得到解释的问题。然而,在男女写作的故事中对暴力的不同定位产生了为什么妇女把杂技演员看做是安全的问题。

答案来自对秋千故事的分析。尽管杂技演员的图片表现了他们是在没有保护网的情况下进行高空表演,在研究中,有22%的女生在自已写的故事里加上了保护网,比较起来,只有7%的男生想象出网的存在,而40%的男生或是详细地解释了没有网的情况,或是以一个或两个杂技演员坠地而死来暗示没有保卫网。因此,妇女把秋千上的情景看成是安全的,因为通过提供一张网给他们带来安全,使他们在坠落的情况下能够保全

性命。然而,由于在秋千的场合没有想到网,男性在解释女性的回答时,容易把妇女故事中的缺乏暴力归结为看不到危险或者是对攻击性的压抑(May, 1981),而没有归结于妇女使杂技演员安全的关怀行为。由于妇女想象到通过行动来编织关系和保持联系,亲密关系的世界——对于男人来说那么神秘和危险的世界——便越发地代之以一致性和安全性出现。

如果像妇女所知觉的那样,把攻击性与人们的关系破裂联系起来,那么妇女想象的关怀行为强调了通过避免孤立和防止攻击性,而不是通过寻求准则去限制攻击性的范围才是令社会安全的行为。这样,攻击性就不再作为必须被约束的、难以控制的冲动出现,而是作为联系破裂的标志,以及关系失败的信号出现。从这一观点来看,在男性意象中暴力的普遍性表明了一个危险处处可见的世界,标志着建立联系,导致关系紧张以及把分离引向危险的问题。如果把通常的解释方式,即把妇女缺乏攻击性同分离问题联系起来的方式颠倒过来,就有可能看清男人故事中暴力的普遍性,以及它在亲密关系背景下的奇异定位,暴力与标志着联系中问题的背叛与欺骗相联系,这个问题使关系变得危险起来,因而安全只能出现在分离中。对妇女来说,受准则约束的,由竞争获得成就的情形对关系网构成威胁,而对男人来说,这却提供了一种建立清晰边界和约束攻击性的联系方式,因此也以相对安全的面目出现。

一位妇女写的秋千上杂技演员的故事说明了这些主题,她通过把关系的继续描写为成功的障碍使人们注意到成就与亲密关系的对立:

“这是两个吉普赛飞人,他们正在为林林兄弟杂技团的一份好工作试演。他们是竞争这份工作的最后一组,他们的表演非

常出色。他们表演得优雅而富有格调,但他们使用了其他组的人没有使用的安全网。雇主说,如果他们丢弃这张网,自己将会雇佣他们,但两个吉普赛人作出决定,自己宁愿活得更久一些和放弃这份工作,也不愿意冒这种风险。他们知道如果两个人中有一个人受伤,或者没有意识到在冒险,这个节目就会夭折。”

在这个故事里,对于两个吉普赛人来说,杂技团的这份好工作并非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两个当事人的幸福。在预料到以生命冒险取得成功所带来的负面结果后,他们放弃了这份工作而不是这面网,这不仅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而且保住了“如果两个人中有一个人受伤,就会夭折”的节目。

因此,当女性试图改变准则以便保护关系时,奉行这些准则的男性则把关系描述为易于取代的。在为这个场景设计的许多暴力中,他们写下了关于不忠和背叛的故事,这些故事以男杂技演员把女演员推下来作为结束,假设性地替代这种关系,继续这个节目:

“这个女杂技演员同男演员最要好的朋友结了婚,就在演出之前,这个男演员恰好发现,她一直不忠于自己的朋友(她的丈夫)。他去与她对质,并要求她告诉自己的丈夫,但她拒绝了,这个杂技演员在离地面 100 英尺的地方制造了一起事故,让这位在半空中飞行的女演员失去自己的保护。她死于这场事故,但他却没有犯罪感,相信自己已经调整了事态。”

男性意象中暴力的普遍性就像 11 岁的男孩在道德判断中爆炸性幻想,以及以做贼作为解决争端的途径一样,吻合于人们关系中普遍持有的攻击性观点。但是,这些男性的幻想和意象也揭示一个联系破裂以及交流失败的世界,在这里,背叛威胁着这个世界,因为似乎没有办法认识真理。当被问到他是否考虑

过事情的真实性时,11岁的杰克回答说,自己对人们是否讲真话抱有很大的怀疑,怀疑“人们所说的东西,正如我的一个朋友所言,‘噢,是的,他是那样说的’,而且有时我认为,‘是否他真的在说真话?’”在联想到数学中的真理与逻辑确定性时,他能够看到在英语课上或者在个人关系中建立真理“没有指导意义”。

因此,尽管攻击性一直被解释为本能的,分离一直被看成为限制这种本能所必需的东西,男性幻想中的暴力似乎更出自交流中的问题以及对人们的关系缺乏认识。但是,正像11岁的艾米着手在柯尔伯格假定失败的地方建立联系一样,妇女的幻想在男人描述为毁灭性的地方建立了安全网,妇女在对两性面临的攻击性问题作出评价时,把问题看成出自自我的孤立和对人们关系的等级制建构。

弗洛伊德在《文明与缺憾》(1930)一书中回到年轻时关注的文化和道德主题,以强调评价标准来开始研究“什么是生活的真正价值”(64)。R.罗兰在给弗洛伊德的信中写道,最终与人合为一体的是一种“‘永恒的’感觉”,一种“海洋般浩淼”的情感,弗洛伊德在回信中表示对朋友尊重的同时,把这种情感拒绝为一种幻觉,因为他不能“在自己身上发现这种海洋般浩淼的感觉”。在把这种感觉描述为“一种不能分离的牢固结合,与外部世界合为一体的感觉”时,他解释说,“从我自己的体验来看,我不能让自己信服最初就有这样一种感觉的本性。但是这并不表明我有权利否认,它实际上在他人身上也不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是否能够对它作出正确的解释。”尽管提出了一个解释问题,弗洛伊德马上又收回自己提出的问题,以“它如此地与我们的心理结构不相符合”为由拒绝这种联系感的意义。在这一基础上,他让这一感觉服从于一种“心理分析——即一种发生学的解

释，”从更重要的分离感中推衍出联系感(65)。

弗洛伊德论证的核心在于“我们的自我感觉，”这对“我们来说作为某种自主的和独一无二的东西出现，把我们同其他一切截然分开。”但他转而又立即指出，“这种外表是欺骗性的，”他并没有把这种欺骗看成是没有认识到自我与他人的联系，而是看成没有看到自我与无意识的本我的联系，“因为自我只是为本我服务的门面。”在转向发生学解释时，他把融为一体的感觉追溯为婴儿期没能把自我与作为感觉来源的外部世界分开。这种区分产生于婴儿得不到外部感觉来源时的挫折体验，“对于大多数婴儿来说，母亲的乳房只是作为自己大哭求助的结果再现(65-67)。”在这种大哭求助中，弗洛伊德看到自我的诞生，自我与带来自我内部感觉对象之间的分离，而他人成为获得满足的对象。

然而，自我与外部世界的脱离不仅开始了区别的过程，而且开始了对自主性的寻求，希望得到对快乐来源以及对象的控制权，以便获得保持幸福的可能性，抵御失望以及失去幸福的危险。因此，关系——弗洛伊德把它同“婴儿的无能为力”，“没有限度的自恋”，以及幻觉和否定危险相联系的关系对分离作出让步，因而与攻击性联系起来的决断便构成关系的基础。这样，来自失望以及被愤怒点燃的最初的分离建立起一个自我，他与其他人或者“对象”的关系由此必须得到准则和道德的保护，这些准则和道德容纳了这种爆炸性的潜能，并对“人们在家庭、国家以及社会中的相互关系”进行调解”(86)。

然而，那种与弗洛伊德本人不同的感觉的存在，那种与他作为心理学前提不同的精神状态的存在，使人们获得一种提示，即对于“人们之间最初的相互敌视”，对于“形成人们之间每一种情感和爱情关系基础”的，呈现在妇女体验之中，体现在“母子关

系”中的“唯一的例外”(113)。通过证明不包含愤怒的爱,一种既非来自分离又非来自与作为整体的外部世界一体化的感觉,而是来自一种联系的感觉,一种自我与他人最初联系的存在,妇女再一次作为关系准则的例外出现。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母爱不能与儿子分享,因此,他“使自己以一种最危险的方式依赖于一部分外部世界,即他所选择的爱的对象,如果由于不忠诚或者死亡,他将被这一对象拒绝或者失去这个对象,他本人会遭受极大的痛苦”(101)。

尽管弗洛伊德声称,“当我们爱着时,我们从未如此地对痛苦失去防御能力”(82),但他仍旧在寻求一条防御路线,因为它通过愤怒和良心带来文明和犯罪感,更为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母亲宁愿冒这个危险。既然对她来说爱也具有失望和失去的可能,答案似乎就在于不同的联系体验以及不同的反应方式。贯穿于弗洛伊德整个著作的是把妇女排斥在自己的关系描述之外,她们宣告了一个体验爱的永恒主题,然而,无论把这一体验描述为自恋还是敌视文明,似乎都并非建立在分离和攻击性基础上。依据这一不同的观点来看,自我既没有流落在大哭着的求助中,也没有丧失在与外部世界融为一体中,而是固定在这种不能分离的关系方式中,人们能够观察到这种关系的不同,但却难以进行描述。

在分离和失去中证明一种持续联系的感觉时,妇女说明了一种自我体验,但却与弗洛伊德的解释不同,弗洛伊德说明了自己最终面临的攻击性问题,即“如何摆脱文明的最大障碍”问题,攻击性以及“导致与攻击性本身一样不幸福”(142-143)的防御问题。在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中,弗洛伊德开始以一种更为原始的联系意识,并不是一种海洋般浩淼的感觉,而是一种体现在

与他人“结合的渴望”，受“利他主义驱使”的关系方式来设想它的解决。在把这种与他人结合的驱动力描述为个体化发展的对手时，弗洛伊德暗示了一条为自己先前的解释所忽视的发展路线(141)，一条并不是通过攻击性导致分离，而是通过差异导致相互依赖的路线。在呼唤这种“利他主义的”驱动力时，弗洛伊德提到一种不同的道德概念，它并非出自对攻击性的限制，而是出自对联系的维持。

因此，按照弗洛伊德在幸福和文化之间创作的一个戏目，道德扮演了主角，爱的危险转变为对文明的不满——这是对“爱在良心和不可避免的，致命的犯罪感起源中”所扮演角色进行消极解释的一出戏(132)——另一种剧情开始出现。根据这一变化了的观点，联系似乎并不以一种幻觉或者呈现出爆炸性的超越倾向，而是作为个体心理和文明生活的最初特征出现。既然“人类的个体在参与人类发展过程的同时也是对自己个人生活道路的追求”(141)，那么分离似乎也像先前的联系那样以幻觉出现。但是，正如弗洛伊德所见，把这种联系感觉同他的心理学结构结合起来不仅改变了本能的特色，而且改变了自我的表现以及对关系的说明。

在性别差异研究中，R. 梅(Robert May, 1980)把“骄傲”作为幻想的“男性方式”，它在投射想象(Projective Imagination)中从增强到消失，并且延续了弗洛伊德已经讲述的最初联系的破裂——通过分离体验到不可弥补的丧失，以及一种伴随灾难性的衰落而来的光荣成就故事。但是，梅把“关怀”设想为妇女的幻想方式，它追溯出一条仍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解释的途径；一种愈发增强的对丧失的描述，在这个过程中，尽管联系通过分离得到，但它最终还是被保留下来或者得以恢复。在把生

活解释为一张网而不是关系的接替时,妇女把自主性而不是依恋描述为幻觉和危险的探求。这样,妇女的发展指向人类依恋的不同历史,强调连续性和结构的变化,而不是替代和分离,解释了对失败的一种不同的反应,改变了发展的比喻。

J. B. 米勒(1976)在说明以主从模式来建构亲密关系带来的问题时,强调“女性发展的参数与男性并不相同,因此同样的术语并不适用”(86)。她发现在心理学中并没有描述女性自我意识结构的语言,“能够组织用来建立进而维系亲情和关系”(83)的语言。但是,她在这种心理结构中看出“更先进、更亲密的生活方式——不那么拘泥于目前危险方式”的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因为自我意识并非与相信攻击性的功效联系在一起,而是关系到对联系需求的承认(86)。所以,在对一种更具创造性、合作性的生活方式作出展望时,米勒不仅呼唤社会平等,而且也呼唤心理学上的一种新语言,这种语言将把关怀和联系的描述与不平等和压迫的词汇分开,她认为这种新语言来自妇女对关系的体验。

在缺乏这种语言的情况下,妨碍心理学家理解妇女体验的解释问题也在妇女没能表达出自己的体验,以及表达扭曲问题中得到反映。当网络的相互联系由于关系的等级秩序而消除时,当网络被描述为危险的陷阱,阻止战斗而不是对危险的保护时,妇女越发地对自己已经看到的東西是否存在,从自身体验中认识到的东西是否真实的问题产生疑问。这些问题并不是作为关于实在和真理本性的抽象的哲学推论提出来的,而是以作为妇女自我意识中的自我怀疑提出的,这危及到她们依据自己知觉行为的能力,并由此也危及到她们为自己所做之事承担责任的意愿。这个问题在女性青春期发展中成为关键问题,在这一

阶段思考变成了反省,解释问题也因此进入发展过程本身。

当人们要求两个 11 岁的孩子描述自己道德冲突以及选择的体验时,他们在一种意义上以迥然不同的视角重新说明同一个故事,这揭示了男女青春期发展的主题。两个孩子描述了学校里的情景,他们面对一个是否说出来的抉择。对杰克来说,他的困境出现在当他决定反对不公正,寻求以准则来保护一个正在遭受“不公平”毒打和伤害的朋友的情况下。在与朋友跑去把这件事告诉校长之后,他接下来犹豫是否把已经告诉了校长这件事告诉另一个朋友,因为这个朋友打人只是为了回击挑衅。不告诉他将会使他受到并不公正的惩罚。

在描述自己的困境时,杰克集中考虑在这种情况下,违背自己试图“实践我的誓言”的准则是否正确,只要自己不说出来,就没有人知道已经告到了校长。令他左右为难的是,是否他能把自己说出来的行为解释为公平的,是否自己对所涉及到的两个朋友的关怀行为能够符合自己道德信念。如果他的行为能与公正标准相吻合,那么他将不会感到“羞耻”,将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乐于承担责任”;否则的话,他认为就必须要对自己和朋友承认犯了一个错误。

艾米的困境是这样一种情况,她看到一个朋友拿了别人的一本书。在把这个问题解释为诚实的冲突,以及对关系作出反应时,她犹豫是否冒着伤害一个朋友的危险对另一个朋友受到的伤害作出反应。她面临的是,在自己已经看到和知道的情况下如何行为的问题,因此在她的建构中,讲与不讲都构成了一种反应。正像杰克考虑到违背了自己的标准,违反了自己的诺言,因而出于对朋友的忠诚而对自己的原则作出让步一样,艾米也考虑脱离友谊来确定一个自己相信的标准,一个共同的和关怀

的,保护人们不受到伤害的标准。但是,假定有了这个标准,她还是考虑每个朋友受伤害的程度,集中考虑这一局面的各种因素,以便评价自己的行为最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正像杰克犹豫出于友谊的行为是否会违背个人正直标准一样,艾米也担心是否肯定了自己的信念,她将伤害一个朋友。

在描述自己对如何行为的思考时,艾米重构了自己参与其中的与内在声音的对话——一种包括他人,也包括自己声音的对话:

“没有人会知道我看到了这件事,没有人会以此来反对我,但当你开始坐在那里想这件事时,会想到将有人知道这件事——你一直确信自己没有说出来,这的确使我感觉到不舒服,因为我的朋友就坐在那里。“有人看到我的书了吗?哪去了,帮帮忙!下节课我要用这本书。帮忙找找!不在这里,哪去了呢?”我认为如果你知道了这件事,更重要的是说出来,你知道自己的确不是在扯闲话什么的,因为你知道最好是说出来。”正因为她意识到他人的求救使隐瞒成为关怀上的失败一样,处在这种关系背景之下,讲出来并不是在扯闲话。但是,这种依赖背景的分析方式容易造成解释上的变化,因为在关系背景下的变化将使她的关怀行为变成一种背叛的行为。

这样,在意识到其他人可能不会知道自己的见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非常容易被误解时,艾米也犹豫是否最好是什么也不说,或者至少不说明是自己讲出来的。因此,男性青春期的秘密围绕着不能为公平逻辑所表现的持续性依恋的港湾运行,女性青春期的秘密则关系到自己声音的沉默——一种由不伤害他人的愿望来实现的沉默,也由于担心讲出来不被人听到的沉默。

这种沉默再现了普西芬尼神话的意象,勾勒了女性自我在

青春期的神秘消失,这是通过描绘一个保持秘密的地下世界来完成的,因为其他人把这个自我谴责为自私的和错误的。当自我的体验和道德的理解随着青春期反思的发展而变化时,认同和道德的问题便集中在解释上。正像11岁女孩的是否倾听自我的问题贯穿于整个青春期一样,心理学家经历的倾听妇女声音的困难也与妇女本人倾听自己声音的困难交织在一起。这一困难也明显表现在青年妇女对自我认同以及道德信念危机的说明中——这是她努力使自己的声音摆脱他人,寻找一种语言表现自己对关系的体验以及自我感觉的危机。

参与大学生研究的克莱尔第一次是作为高年级学生被访谈的,这之后在27岁时再次接受访谈。当作为高年级学生被问及如何进行自我描述时,她回答说“令人迷惑的”,认为自己“应当可以说‘哦,我是如此这般的’,但不同的是她发现“比起一直想象的自我来说,我目前对自己更不确定。”在意识到“人们以一种确定的方式看待我之后”,她愈发地看到这些意象是矛盾的、受限制的,“发现自己是被人推动的,被夹在中间:我应当是一个好母亲和好女儿;作为一个女大学生,我应当具有攻击性,有很大的能量和事业心。”然而,在她高年级时,她这种被夹在中间的感觉已经转变为约束行为的意识,“被促使开始作出自我决定”的感觉,她“愈发意识到所有这些不同的角色恰恰不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她得出结论说:

“我不必是我应当是,或者一直被人们想象的那种女朋友,我不必是一直被人们想象的那种女儿。你长大了会在其他人看待你的方式中发现自己,猛然间开始与这种方式分离,开始意识到没有其他人真正能够作出这些决定是非常困难的。”

面对一个高年级学生必须作出明年做什么的选择,她试图

把自己的知觉与他人的知觉区分开来,直接地认识自己而不是通过他人的眼睛来认识:

“长期以来,我一直像其他人希望看我那样地看待自己。我是说,对我男朋友真正有吸引力的是有一个当英语教授的妻子,我把自己不想这样做的想法抛在脑后;我真的以为或许这才是自己想从事的事业。我开始寻找它所有的积极方面,因为我是通过男朋友的眼睛来看待它,然而,突然间我有点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做了。你知道我不能,我必须停下来像我希望看待自己那样地看待自己,因此我意识到,不行,这是非常乏味的,学术世界对我未必是适合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成为一个理想的妻子。所以从那以后我自然地面对适于自己的事情,这是很难的,因为同时我要面临一种我不能长大的感觉。”

因此,当她看待自己的方式变得更为直接时,道德问题也相应地从什么是“适合的”转变为什么“对我来说是适合的”。然而,在面对这种挑战时,她立即退缩下来,因为她产生了“我不能长大”的感觉。

在她对“把自己概念化或者归类”进行抵制时,困于访谈者对她提出的自我描述的要求,她发现“在不明确的情况下难以定义我是什么”,自我以往“试图把我的情感压到地下”,以便不去产生任何“影响”。在描述自己“爱着”时,她在两种背景下使用这个词:一个是地下世界,这个词把她“与他人分开,与他们对我的定义分开”,还有一个是联系世界,它把她同自己分开。在试图把自己的感觉解释成立即分离或者联系过程中,在尝试着表达对自我和关系的一种新理解时,她遇到了“术语”问题:

“我试图告诉你两件事。我尝试着让自我独立起来,与他人分开,与他人对我的定义分开,然而同时我却做着相反的事情,

试图与他人联系或者发生关系——无论这个术语是什么——我想它们都并非是相互排斥的。”

这样她把一种新的分离感觉同一种新的联系体验结合起来,这种与他人的联系也使她与自己联系起来。

在具有了表达这种尚未标明出来的联系感觉,但又无法自我表达的意象之后,她理解了一个朋友——D. H. 劳伦斯《恋爱中的妇女》中的主人公古德朗的意象。古德朗唤起了克莱尔本人“孩子似的”和“无拘无束的”感觉,对自然以及自己的感觉作出反应。这种与“感觉快乐”世界的联系表达了她本人“艺术家式的和放荡不羁的”一面,这与她对自己“贵妇人风范和教养良好”的看法形成对比。然而,古德朗的意象尽管刺激了不同的联系方式,最终对她来说在道德上还是成问题的,因为它暗示了“对其他人的不关怀”。

克莱尔又一次被纠缠住了,但却是以不同的方式,不是在他人矛盾着的期望之间,而是在对他人作出反应和对自我作出反应之间。在感觉到这些反应方式“并非是相互排斥的”时候,她审视了以往令它们分开的道德判断。以前,她把“观察的道德方式”看成集中在“对其他人负责”的方式;现在她愈发地对以往似乎是不证自明的真理提出疑问,“在对其他人做正当之事的过程中,你也正在对自己做正当之事”。她认为自己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认识——我认为自己无法为什么人做什么善事,除非我知道自己是谁”。

在寻求“发现我是什么”的过程中,她已经开始“摆脱所有的标签以及我在自己身上看不到的东西”,把自己的知觉同从前的解释方式区分开来,更直接地看待他人和自己。因此,她逐渐觉察出自己母亲的“错误”,她只是无休止的给予,“因为她并不关

心自己在这样做时是否伤害了自身。她并没有意识到(克莱尔看到了)在伤害自己时,她也伤害了与自己最亲近的人。”在用关怀的标准进行衡量之后,克莱尔的自我牺牲理想对下面的观点作出让步:“家庭中的每个人都应被鼓励成为一个个体,同时每个人都要帮助他人并接受他人的帮助。”

在以这种观点看待海因茨困境时,克莱尔觉察出与11岁的艾米一样的道德问题,不是集中在权利的冲突,而是集中于反应的失败。克莱尔相信海因茨应当偷药(“他妻子的性命比任何东西都重要。他应当为挽救她的生命做任何事情”),但是,她也以自己的解释反对权利的建构。尽管药剂师“有权利,我是说他有法律上的权利,我也认为他有道德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同情心。我认为他没有权利拒绝”。在把海因茨行为的必要性与这一事实——“妻子需要他在这个时候这样做;她本人无法这样做,要指望他去做自己需要去做的事情”的事实相联系时,克莱尔解释了由艾米提出的相同的责任概念。她们两人都把责任同对需要作出反应联系起来,这种反应出自认识到其他人正指望着你,你能够提供帮助。

无论海因茨是否爱自己妻子都与克莱尔的决定无关,这并不是因为生命具有胜于情感的优先权,而是因为他的妻子“是另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因此,行为的道德命令并非出自海因茨对妻子的情感,而是来自他对她需要的意识,一种并非通过证明而是通过交流过程来协调的意识。正像克莱尔考虑到药剂师要对自己的拒绝负有道德责任一样,她也把道德同对联系意识结合起来,把有德之士定义为在行为中“认真考虑到对所涉及的每个人的结果”的人。因此,她批评自己的母亲“忽视了对自身的责任”,同时她也批评自己忽视了对他人的责任。

尽管克莱尔对海因茨的判断大部分不适于柯尔伯格的范畴,但她对法律的理解,对法律功能系统说明的能力使她赢得了第四阶段道德成熟的分数。五年之后,在她 27 岁的访谈中,这个分数出现了问题,因为她把法律置于对药剂师,对海因茨以及他妻子的责任考虑之下。现在,在根据法律到底保护谁来判断法律时,她把自己的责任伦理学引申至更宽阔的社会联系视野。但是,这种观点与公正概念之间的差异使她根据柯尔伯格尺度来判定的分数降了下来。

在克莱尔的道德判断似乎退步期间,她的道德危机却消除了。在参加柯尔伯格的课程之后,她怀疑自己对发展的体验按照柯尔伯格术语来说并不是进步。因此,当她接到询问她是否愿意再次被访谈的来信时,她想到:

“我的天呢,我的退步又将怎样呢?我似乎处在自己生活的一个阶段上,我一直能够更确定地对这些困境作出回答,‘是的,这是绝对正确的,那是绝对错误的’。现在我却越来越深地陷入不确定的泥潭。我不肯定就这一点来说是好还是坏,但是我认为在另一种意义上说总有一个方向问题。”

在把绝对的判断标准与她自己道德选择的复杂体验相比较时,她引入了一个方向问题,以及对自己发展的解释问题。

这个解释问题在 27 岁的访谈中再度出现,当时她已经结婚并开始医学院学习,她对自己的危机体验进行反省,描述了自己生活在和思想上发生的变化。在谈到自己的现状时,她说,“事情都挤到了一块儿”,但她马上更正自己的用词,因为“听起来像是别人把它们集中在一起,而事实却不然”。但是,解释问题集中于对联系方式的描述。在克莱尔的自我描述中,联系本身是明显的,她在描述时说,当她把自己的特点概括为“地地

道道的母性的”时，“听起来有点令人奇怪”。在对自己“作为一名医生，一位母亲”进行展望时，她说，“在不考虑身边接受自己关怀的其他人的情况下，我很难想到自己。”像艾米一样，克莱尔把自我体验同关怀行为，以及联系结合起来。在把母亲意象与自我意象相结合的过程中，她把自己看成一个具有母性的医生，像艾米准备成为一个关怀世界的科学家一样。

在描述持续数年的危机解决过程时，她回顾了自己走过的道路，为的是解释自己对“危机基本方向”的发现。这个危机始于她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整个周末我都不起床，因为没有理由这样做。我就是不能让自己爬起来。如果我起床我不知道自己将要做些什么，而且我在二年级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如此。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什么理由做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东西看起来能联系到一起。”

在试图把自己的失望同失去联系的感觉相联系时，她思索着一个词或者想象着表达这种体验：

“这不是转折点，因为当我起床时，一切又都恢复正常。这种事没有再发生。这并非是一次不寻常的顿悟或者类似的什么东西。它恰好从我脑海里冒了出来。即使这时似乎并不像是一种强烈的体验。它看来也不像是对我自己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对，它似乎像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体验。这的确如此。”

在把自己的体验同对现实危机和变化的比喻进行比较时，她开始得出结论，什么事情也未发生，或者所发生的事情并不强烈，或者也不真实。她也没有被击垮，没有体验到一种顿悟或者“极度的失望”：

“我并没有躺在床上思考自己的生活如此这般地没有价值，情况并不是这样。它并不像是深切的不幸。它就是这样什么都

不是。或许这就是极度的失望,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我猜想一种东西冒出来是因为人们对它太缺乏感觉。另一件事是我感觉到对(一位亲属的)极度苦恼和仇恨,他抛弃了家庭。我是说这刚好是相反的东西;这件事那么令人情绪激动。”

在缺乏感觉和感到仇恨的情况下,人们无法找到同他人联系起来的途径,所以她把自己的失望体验看成来自失去联系的感觉,这种感觉一部分是由于家庭关系的失败而产生的。

与他人失去联系的感觉使克莱尔努力把自己看成是“有价值的”,看成值得自己去关怀的,因此证明依照自己利益行事是正确的。在描述自己愈发冒险去做想做之事的过程时,她说明了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道德概念是如何变化的。过去她把有德之士定义为“为其他人带来最大幸福之事的人”,现在她把道德与对关系的理解联系起来,因为她认为“理解他人正在体验之事”的能力是作出道德反应的前提。

现在,她表现出对海因茨困境的不耐烦,她严格地把它建构成妻子生命与药剂师贪婪的对比,把药剂师对利润的追逐看成他理解上以及反应上的失败。生命比金钱更可贵是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生存下去”。但是,她接下来又转变视角,认为“我并不肯定自己应当这样表述”。在重新作出表述时,她以关系网络来取代权利等级制,通过这种替代,她对构成权利概念基础的分离的前提提出挑战,并提出了一个“指导联系的原则”。在把关系看成原始的而不是来自分离时,在对人们生活中的相互依赖进行思考时,她把“事物本来的方式”以及“事物应当的方式”想象为相互联系的网络,“每个人都属于这个网络,你的一切都来自这个网络”。由于有悖于这一社会现实观念,药剂师的权利主张陷于根本性的冲突中。在把生活看成依赖于联系,看成通

过关怀行为来维系,看成基于依恋关系而不是共同契约来结合时,她相信海因茨应当偷药,不管他是否爱自己的妻子,“这是由于他们两人结合到一起”的事实。尽管一个人可能不喜欢别人,“但你必须爱别人,因为你与他们不能分开。爱的方式就如同爱你的右手一样,它是你的一部分。其他人是巨大的个体集合中的一部分。”因此,她提出一种责任伦理学,这种伦理学出自对相互联系的意识:“陌生人仍旧是属于这个集团的另一个人,你也由于是另一个人才与他人联系在一起。”

克莱尔把道德描述为“作为更大整体中的一部分与一种独立的自我实体之间持续性的紧张关系”,她把伴随这种紧张关系生活的能力看成道德品格和力量的源泉。这种紧张是她所面临的关于责任冲突的道德困境的核心,这一困境涉及到真理问题,并转而关系到对关系的认识。她从学院毕业后在一家流产诊所当顾问,人们告诉她说,如果有的妇女想看看从自己子宫里取出的东西,你就应当告诉她说,“你现在什么也看不到,在这个阶段刚好像果冻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真理问题突出出来。因为这一描述与道德上的骚动相抵触,在门诊工作期间,克莱尔感觉到,她决定自己“必须面对正在发生的一切”。因此,她决定去看一看晚期流产取出的胎儿,在这样做时,她越发地认识到:

“我再也不能欺骗自己说子宫里什么都没有,只是一块小斑点了。这不是真的,我知道它不是真的,但我还必须去看看它。然而,同时我也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也相信它是正确的;情况应当是这样。但是,我无法说,‘好吧,这是对的,这是错的’,我总是被撕裂开来。”

当她以自己的眼光权衡世界,依据自己的知觉判定正在发生什么和什么是正确的时候,道德判断的绝对性消失了。结果

她“总是被撕裂开来”，在流产问题上陷入不确定的泥潭，但她还是能够依据一种更具有反应性的方式来行为：

“我全力与之奋斗。最后我不得不调整我自己——我真的相信这一点，但是你若能在不带感情，或许是悔恨的情况下说出它来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的确，生命是神圣的，但生命的质量也是重要的，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它不得不成为决定因素。母亲生命的质量，未出生孩子生命的质量——我在垃圾箱里看到许多孩子的形象，这种事情使人容易去说，‘好吧，或者这样，或者那样，’而事实并不如此。我必须能够说，‘是的，这是谋杀，对这种事没有办法，但是我宁愿接受这种事情，我宁愿让它继续下去，这是很难的。’我认为自己无法解释它。我认为自己的确不能得出这样的证明。”

克莱尔在说明自己道德观方面的无能为力一部分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她的判断是根据情境作出的，限定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总是关系到“这位母亲”和这位“未出世的孩子”，因此与一个绝对命令形式相抵触。对她来说，对可能性的想象胜过了概括能力。但是，这种不能得出证明或者解释自己参与流产咨询理由的感觉，不能充分反省自己道德判断方面的无能为力也可以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当她试图表达时，她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对这个观点的证实，这种观点就是既非出自对生命的赞成，也非出自对选择的赞成，而是基于认识到母亲生命与孩子生命之间的持续联系。

因此，克莱尔并没有把这一困境建构成权利的冲突，而是作为关系问题，集中在最终人们必须面对的责任问题。如果依恋关系无法维持，流产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道德都在于承认联系，对流产决定负责或者承担关怀孩子的

责任。尽管有时“像这样的谋杀是必要的,它也不应当来得这般地容易”,就像是“如果胎儿与你分开多好。如果胎儿是与你分开的果冻多好,东南亚与你再远点多好一样”。因此,对道德和生命的保护取决于保持联系,通过保持完整的关系网络来看待行为结果,“不允许别人在不负责任的情况下为了你去谋杀”。判断的绝对性再一次服从了关系的复杂性。通过联系来维系生命的事实使她肯定生命的“神圣联系”,而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生命神圣性”,而且在保留对权利认识的同时提出一种责任伦理学。

当一位朋友为了一份工作请她写一封推荐信时,克莱尔又遇到真理问题,面临一个类似于艾米描述的困境。令艾米犹豫的是,“保持友谊还是主持公道”,尽管这个问题最终变为对他人作出反应,因此保持与自己的和平,但是诚实问题从一开始便是克莱尔关注的核心:“我如何能够做到既是诚实的同时对她来说又是公正的呢?”然而,公正问题是一个责任问题,它来自这样一种认识,即在形成友谊的过程中,自己的行为已经建立起希望的链条,使得她的朋友相信自己能够依赖克莱尔的帮助。克莱尔意识到,自己“确实不喜欢”这个朋友,她们的价值观“完全不同”,她也意识到关系的事实以及诚实和公平不可能两全。做什么的问题取决于如果这个朋友争取到了这份工作,克莱尔的行为对这个朋友,以及生活将要受到影响的人们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相应伤害的判断。在确定了在这种情况下,写这封信将是最好的选择之后,克莱尔认识到“从那一天起自己通过更多的诚实”能够避免这种困境。

关于诚实问题,克莱尔最终归结为一出戏:“赖特先生”(Mr. Right)和“朗先生”(Mr. Wrong),这是通过把道德真理人

格化,而不是把人际关系问题对象化来结合各种关系、责任以及解释主题的一出戏。像霍纳故事里的安妮一样,赖特先生在医学院的班级里名列前茅,并且在希望保持领先的情况下,“怨恨没有把所有的周日都用来学习”,所以在周六的晚上他回到自己的床上睡觉,这使克莱尔不仅感到孤独和被抛弃了,而且感觉到是“自私的”和“错误的”:

“我想得到更多有什么错呢?显然是有什么问题。我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我从未真正地面对事实——显然关系中有什么不对劲儿。”

出于这种体验,她开始怀疑赖特先生并不“合适于我”。但是由于不愿结束这种关系,她反过来转向朗先生:

“在高年级以前,这件事打击了我,但是我却在说,‘我正在坚持自己的权利,我将不再忍受这种状况,’我背着他发生了那种见不得人的事,然后向他去说明。不仅向他说明,而且跑到他面前哭泣和坦白,这令我感到快乐,但是所有这一切在潜意识里都是打算伤害他。”

克莱尔最初把这种冲突或者困境描述为判断与行为之间的鸿沟,假定自己“以一种有趣的方式严格地恪守一夫一妻式的情感”,但是她随后补充说,真正的冲突是自己的两种意象之间的冲突,“一种处女般纯洁的东西以及我那种开始发育的自我的另一侧面。”这个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她“不能在我想做什么的时候作出一个决定”。困于自己的这两种意象之间,她陷入到两种关系世界里:

“我不情愿放弃第一种关系,因为它代表了许多东西。除我之外的所有人却对赖特先生更为了解。与他相反的另一个家伙显然是朗先生,他当时对我来说代表着某种同动物一样的东西,

我也无法放弃它。”

当她开始面临自己知觉内部的分歧时,她也开始“看出由别人强加的道德标准对我未必合适”。因此,正像赖特先生已被证明不适于我一样,朗先生也并非错误到哪儿去。

在注意到表露出自己内心并未解决的冲突的行为时,她认为“两个卷入到冲突中的人是我自己和我自己。”正像她解释内在的区分一样,她也说明了关系的世界,把自己不情愿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看成已经使伤害不断地循环下去:

“这是整个关系问题的一部分,我没有负起属于我的那部分责任。我想这也是那种计划好的,像他伤害我那么深地伤害他,尽管我从未对阻止他去伤害我负起责任。我从来没有说过,‘你这个星期六呆在这里,不然的话我们就结束关系。’只是在两三年后我才认识到当时正在发生着什么。”

在回顾赖特先生和朗先生的困境时,克莱尔不仅把问题集中在她在维护自己权利上的失败,也归结为“没有理解我应当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这种维护权利的行为与其说是一种攻击性行为,不如说是一种交流行为。通过告诉赖特先生自己的真实情况,她不仅避免了攻击性而且为反应提供机会。正像11岁时清楚讲出的“我”在青春期变得“令人困惑”一样,这个困境的解决也出现在这种发现之中,即对自我的反应和对其他人的反应是相互联系而不是相互敌对的。

在描述自己欣赏的人们——“像她一样给予”的母亲,“遵循自己信念生活”的丈夫时,克莱尔为自己设想了以关怀行为为核心的正直生活。这一观点通过一位女医生的行为得以说明,这位医生发现医院里的一位老妇人的孤独状况后,“出去为她买了一份饮料放在她的身边,像有人在那里陪伴着她。”因此,关怀的

理想是一种关系行为,发现并且对需要作出反应的行为,通过编织联系网来关照这个世界,以便没有人被忽略。

在心理学理论的真理已经使心理学家对妇女体验的真理视而不见的同时,这种体验也解释了心理学家发现难以追溯的一个世界,一片几乎没有暴力,关系呈现出一片和平的领地。妇女体验一直如此地难以描述,或者甚至难以察觉的原因在于关系意象变化带来的解释问题。从男女幻想与思考的主题得出的等级制和网络意象表达出建构关系的不同方式,并与不同的道德观和自我观联系起来。但是,这些意象带来理解上的问题,因为每一种意象都曲解了另一种意象所代表的东西。正像等级制的顶端成为网络的边界一样,联系网的中心也成为等级制进程的中间地带,一种意象标明为危险的地方是另一种意象定义为安全的地带。因此,等级制和网络意象表现出维护权利和反应的不同方式:独自占领制高点的希望和随之而来的其他人将靠得太近的恐惧;处于联系中心的希望和随之而来的离边界太远的恐惧。这些被交织和缠绕在一起的不同的恐惧产生了成就以及亲密关系的不同肖像,导致了不同的行为方式,以及评价选择结果的不同方法。

因此,根据妇女自己的关系意象来重新解释她们的体验不仅澄清了这种体验,也为人类的联系提供了非等级制的视角,因为当关系以等级制意象来建构时,看起来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在道德上成问题的,当它们转变为网络意象之后,便把不平等的秩序变成相互联系的结构。但是,等级制和网络意象的力量,它们的情感刺激,以及在思考中的再现标明这两种意象都体现在人们的生命周期中。不平等和相互联系的体验固有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因而产生了公正伦理学和关怀伦理学,建立了人们

关系的理想——尽管存在着力量差异,但仍有着自我和他人将被同等对待的憧憬,一切都将是公平的憧憬;每个人都应当被反应和包括进来,没有一个人将被孤立出去或者受到伤害。这些不同的憧憬以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反映出人类关系体验上的一个似非而是的真理——我们仅仅是在与他人的联系中把自己认作是分离的,我们只是在他人与自我的区分中来体验关系。

第三章 自我概念与道德概念

一个大学生对于“如果你必须说出道德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将如何归纳呢”这一问题的回答是:

“当我思考道德这个词时,我想到了义务。我通常把它看成个人欲望与社会事物以及社会考虑之间的冲突,或者是自己的欲望与另一个人、人们或无论什么人欲望的冲突。道德就是你如何确定这些冲突的范围。一个有道德的人通常作出自己承担更多而不是平分义务的决定。一个真正的有德之士总是推己及人……,在相互影响的社会中,个人站出来操纵许多人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每个人的处境都变好在道德就是正当的。”

然而,当人们问她是否能想起自己认为真

正有道德的什么人时,她回答说,“哦,我马上想到 A. 施韦泽,因为他显然为了帮助他人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义务和牺牲胜过平等的理想构成她思考中的基本矛盾。

另一位大学生在回答“说某种事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或者不正当的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时,也首先谈到责任和义务:

“它关系到责任、义务和价值,而且主要是价值……,我在生活中把道德与人们之间的关系相联系——你必须尊重他人和自己。(为什么要尊重他人?)因为他人具有能被伤害的感觉或者情感,能够意识到被伤害。”

另外两个女学生在回答“为什么是道德的”问题时,也把不伤害他人作为主题:

“千千万万的人们必须一起和平地生活。我并不想伤害其他人。这是一个真正的原则,我奉行的重要原则。它为我的公正感奠定基础。给他人造成痛苦不是件好事。我同情所有痛苦的人。就我个人的道德来说,重要的是不伤害他人。数年前我可能为了不伤害男朋友从窗口跳出去,这是病态的。然而,即便是在今天,我也希望赞许和爱,并不想树敌。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要有道德的原因,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赢得赞许、爱和友谊。”

“我奉行的主要原则是不伤害他人,只要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只要对自己保持真实……,存在着许多道德问题,诸如流产、征兵、谋杀、偷盗和一夫一妻制。如果什么事像这些问题一样有争论,我总是认为它取决于个人。个人必须作出决定并且遵循自己的良心行事。并不存在着绝对的道德标准。法律是实用的工具,但它们不是绝对的。一个活生生的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排除例外……,但我本人还是担心某一天与男朋友之间出现

大的裂痕,有人会受到伤害,他将受到比我还大的伤害。我感到有义务不去伤害他,但也有义务不说谎。我不知道是否有可能既不说谎,也不造成伤害。”

贯穿这些陈述的线索是希望不伤害他人,并且希望道德给出一条解决冲突的途径以便没有人受到伤害。这是四位妇女在回答最普遍的问题时,每个人都分别专门强调的主题。有道德的人是帮助他人的人;美德就是服务,在有可能不牺牲自己的情况下履行对他人的义务和责任。当四位妇女中的第一人以否定自己最初谈到的冲突而告终时,最后一位妇女也预料到真实地对待自己与遵守不伤害他人原则之间的冲突。对这个判断的局限性作出检验的困境,也将是在帮助他人被视为以伤害自我为代价的情况下所遇到的困境。

对“争论问题”采取保留的态度,希望“任何时候都有例外”,其他女大学生也不断地重复这一看法:

“我从未感到自己能够谴责别人。我采取一种极为相对的立场。我遵循的基本观点是人们生活的神圣性。我避免把自己的信念强加于人。”

“我从不争辩自己的道德信念是他人应当接受的。我不相信绝对真理。如果在道德决定方面存在着什么绝对真理的话,它就是人们的生活。”

或者正像一位31岁的研究生在解释为什么她发现偷药难以挽救自己的生命时所讲的那样,尽管她相信为了另一个人去偷是正当的:“我的意思是说人们很难为自己违背准则作出辩护,我们依靠协调一致来生活,如果一个人采取了仅仅是为了自己,仅仅是自己赞成的行为,这里面就没有一致可言。在今天这样的社会里,相对来说便是不可原谅的。”

这些声音呈现出妨碍这些妇女采取一种立场的脆弱感。G.艾略特(George Eliot)把这看作是女孩对他人相反判断的“感受性”，这出自女孩缺乏力量以及由此而来的“在这个世界上成就某事”方面的无能为力(365)。柯尔伯格和克雷默(1969)，柯尔伯格和吉利根(1971)把不情愿作出道德判断同青春期认同和信念危机结合起来，这种不情愿在男性那里以对道德概念本身进行探讨的形式出现，但在这些妇女身上则表现为她们在独立作出正确道德陈述上的不确定，或者可能表现在她们似乎要为这种判断付出的代价。

当妇女感觉到被排斥在直接参与社会之外时，她们便服从保护和维持自己生活的男人们作出的和强加的意见或判断，并借助他们的名望被人知晓。一位离婚的，住在幽深的学院区里的中年妇女，一个有着几个青春期女儿的母亲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作为一个女人，我感到自己从未理解到我是一个人，我能够作出决定，我能够作出正确的决定。我总是感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父亲或者丈夫，抑或永远是由男牧师把持的教会的事。他们是我生活中的三个男人：父亲、丈夫和牧师。他们喋喋不休地告诉我应当或不应当做什么。他们的确是我接受的权威人物。只是近来我已经感到，自己甚至从未反抗过，我女儿们也过于依赖权威，不是以好战的方式，而恰好是以承认的方式……，我仍旧让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不愿发生在她们身上，不愿作出选择，尽管我明白关于选择的一切。我懂得它的过程，步骤以及一切。**(你有什么根据证明这种选择可能是正确的呢?)**这个嘛，我想是从不那么负责任的意义来说的，如果你作出一个愚蠢的决定，你一定会受到责备。如果这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你

就能够对它进行报怨。我想如果你没有培养起自己曾作出什么决定的感觉,你也不会感到负有感情责任,而伴随选择意识而来的就是这种责任感。”

道德决定的本质就是选择的实现以及乐于接受这种选择的责任。就妇女把自己看作没有选择权利而言,她们也相应地让自己摆脱了这个决定所包含的责任。在她们孩子般的依赖以及由此而来的怕被抛弃的脆弱中,她们声称只想取悦于人,但也希望自己的美德有所回报,即期望被爱和被关怀。因此,这是一种始终处在危险之中的“利他主义”,因为它以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为前提,这个受害者由于意识到已经作出的交易而处于不停地作出让步的危险境地。当被要求去描述自己时,一个高年级学生说道:

“我听说过洋葱皮的理论。我把自己看成一头层层包裹着的洋葱。外层面对我并不太认识的人们,和蔼可亲和有社交能力。当你深入内层时,在那些我知道自己要进行表现的人们面前有更多的层面。我不敢断定最里面是否有一个核,或者随着自己的成长是否我已经获得了一切,接受了这些不同的影响。我对自己持一种中立态度,可我还是认为可以用好坏来表示。好的方面是,我试图体谅和想到他人,我试图在一些情况下保持公平和容忍。我使用了这些词语,但我尝试把它们付诸于现实。坏的方面是,我并不敢肯定它们是否是坏的,是否是利他的,或者从本质上说自己是为了得到他人的赞扬才去做这些事。(这些事指的是什么呢?)我试图去实现的价值。它们大多关系到人际关系……,如果我为了得到赞扬而去做一些事,这将是一件很费力的事。如果我得不到恰当的回报,我的价值观也可能付之东流。”

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描写的正是由于道德困境所导致的这样一个世界的爆炸,这一困境对于美德这一关键性概念提出疑问。娜拉——“松鼠妻子”像与父亲一样地与丈夫生活,把这个美德的概念化为牺牲的行动,以最美好的意愿把握着这个准则。在危机发生之后,令她最痛苦的是,这种美德的接受者和受益者却拒绝了它,这也使她拒绝自己起初作为最后表现的自杀,而选择去寻求对于认同以及道德信念问题的新的、更坚定的答案。

选择的可行性,随选择而来的责任负担,现在已经侵入妇女生活的大部分私人领地,并以一种类似的爆炸相威胁。几个世纪以来,妇女的性别把她们束缚在被动的、接受的而不是能动的位置上。避孕和生孩子这类事情只有通过抑制她们自身的性欲望才能得到控制,这或是一种否定,或是一种牺牲。当弗洛伊德(1908)把“众多妇女在智力上无可置疑的劣势”与为“性别压迫所必需的思想压抑”(199)联系起来时,他看到这种牺牲也包含着妇女在智力方面的代价。妇女在性关系中的压抑和否定策略,也同样体现于她们在道德领域对于判断的逃避或压抑上,甚至在人生价值问题上,大学生在坚持一种信念时也表现出犹豫不决,就像她们不情愿说出自己的性别一样,这表明她们不敢肯定自身的力量,不情愿去对付选择和逃避矛盾。

因此,妇女传统上一直服从男人的判断,尽管通常也会产生判断分歧的感觉。《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一书中的麦琪在自己与非利普的长期秘密关系被发现之后,通过接受哥哥的道德判断对谴责作出反应,但同时也在坚持一系列不同的标准,借此来证明自己的优势:

“我不想为自己辩护……,我知道自己一直是错误的,而且

不停地错下去。但是,有时当我做完错事时,我还是认为这一直是因为我感觉到,如果一个人做了这些事,他将是更好的人。如果你犯了错误,如果你做了什么大错而特错的事情,我将为这件事带给你的痛苦表示歉意,我不会希望惩罚落在你的头上。”

麦琪的主张是把理性与情感,公正与怜悯分开的古老而雄辩的证词,它为许多关于性别差异的老生常谈和模式奠定基础。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她的主张表现出一种取代上述那种逃避态度的抗争。这种抗争揭示出两种判断方式,对道德领域的两种不同的建构,一种在传统上与男性以及社会权力的公共世界相联系,另一种与女性以及家庭交换的私人世界相联系。在这两种发展观的排列上,人们一直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充分,因此当个人趋于成熟时,就被当做是对女性的取代。然而,人们并不清楚这两种方式是可以协调一致的。

H.哈恩(Norma Haan, 1975)对大学生的研究,以及C.霍尔斯坦(Constance Holstein, 1976)对青少年连同他们父母进行的三年研究都表明,妇女的道德判断与男人不同,她们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与移情和同情相联系,并且关系到对与假设困境相反的现实困境的解决。然而,只要根据从男性研究中得出的范畴来评价发展,与男性标准的背离就足以被视为发展上的失败。因此,妇女的思考通常被等同于儿童的思考。然而,缺乏另一种可以更充分地包括妇女的发展标准,不仅说明由男性建构的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不成比例的男性和青少年研究抽样有效率方面的局限性,而且也表明由于缺乏权力以及两性关系的政治策略强加给妇女的各种限制,在妇女中间普遍存在着的差异以及她们在公开讲出自己声音方面的不情愿。

为了避开这个问题:男人在多大程度上像妇女一样思考,他

们如何能够以抽象的和假想的方式建构现实?”我们就有必要识别和定义把妇女思考范畴包括进来的发展标准。哈恩指出了从对于“更为经常出现的,人们之间体现了移情与伙伴式感觉的现实生活道德困境”的解决中得出这一标准的必要性”(34),这一直是妇女道德关注的核心。然而,倘若从妇女的道德话语中得出发展标准,首先就有必要审查一下妇女在道德领域的建构是否借助了一种与男人不同的语言,以及在定义发展时它是否为一种同样有价值的东西。接下来就需要寻求妇女有权利进行选择,并因此愿意通过自己的声音来讲话的空间。

当节育和流产为妇女提供有效的生育控制手段时,选择的困境也构成妇女生活的核心。因此,传统上定义妇女认同,形成她们道德判断的那种关系不必再从她们的生育能力中获得,而成为一个由她们自己作出决定的问题。从性别依附关系的被动与沉默中解放出来的妇女能够同弗洛伊德一道发出自己所想的问题是什么的疑问,并能通过自己作出明确的回答。但是,当社会可以公开地确定妇女有自己的选择权利时,这种选择权的实现也导致她本人与女性习俗的冲突,这尤为体现在把道德美德等同于自我牺牲上。尽管在判断和行为中,独立见解被视为成年的标志,妇女在关怀和关心方面作出的判断以及由他人作出的判断更应当成为成年的标志。

因此,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冲突成为妇女道德问题的核心,这也导致一种困境,它的解决需要妇女与成年之间的协调。在缺乏这种协调的情况下,道德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好的妇女”通过逃避来掩饰决断,以仅仅强调满足他人需要来否定责任,而“坏的妇女”在自我欺骗和背叛中放弃或抛弃束缚自己的承诺。准确地说来是这样一种困境——同情与自主的冲突,德性与权

利的冲突——女性的声音在以自己的努力解决这一冲突的过程中重申了自我的权利,并以一种没有人受到伤害的方式来解决道德问题。

当一个妇女考虑是否继续怀孕或者流产时,她就是在思索一个影响自己和他人的决定,直接面对一个至关重要的伤害他人的道德问题。既然这个决定最终是由她作出的,因此她就要对这一决定负责,这就明确地提出以往对妇女来说最成问题的判断问题。现在人们对妇女提出的问题是,她是否愿意中断这一生命趋向——这是一个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把自己埋没在依赖的被动中,同时又把关怀责任强加于她的问题。因此,流产决定深入到女性理解力的核心,深入到J.迪戴恩(Joan Didion)所称的“女性不可协调的差异——一个人潜在的最深层的生命感觉。笼罩着血腥与生死的黑暗世界”(14),这个决定也关系到成年人的责任选择问题。

妇女如何去处理这些选择是流产研究的主题,这一研究设计用来澄清妇女建构和解决流产问题的途径。有29个年龄在15—33岁之间的,有着不同种族和社会阶级背景的妇女参加了流产和怀孕的咨询服务研究。参加这项研究的妇女有着不同的目的——一些人为了进一步澄清自己在决定中面临的矛盾;另一些人是对顾问关心的反复流产问题作出反应;其他人打算对这项研究作点贡献。尽管这些妇女是在不同的生活状况下怀孕的,但仍旧可以发现一些共同性。青少年通常没有采取节育措施,因为她们否认或者不相信自己有生育能力。另一些妇女是在不希望发生性关系,没有采取避孕手段的情况下怀孕的。还有人的怀孕恰好与自己终止关系的努力巧合,这可以看成是态度暧昧的表现,或者对这种关系最终承诺的一种检验方式。对

于这些妇女来说,怀孕似乎成了检验真理的途径,让孩子成为寻求男性支持和保护的同盟军,一旦这种尝试宣告失败,这个孩子也一并成为男性拒绝的受害者。还有一些妇女的怀孕是由于节育失败或者是经过反复思考后最终由男女双方作出的决定。在29名妇女中,有4人决定要孩子,2人流产了,21人选择人工流产,对决定持怀疑态度的另外2人无法再取得联系进行下一步的访谈研究。

这些妇女接受了两次访谈,第一次是在被确诊怀孕的头三个月里,她们正在决定是否流产的时候,第二次是在第二年的年底。全过程要求有一段妇女与顾问或诊所取得联系和流产完成的间隔时间。在假定有这种因素和事实,即在一些顾问看来参与这项研究是中止危机的有效手段情况下,人们有理由相信被访谈的妇女作出这个决定时有着比平常更大的冲突。既然这一研究集中在判断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关注流产问题本身,也就没有选取一个代表着妇女思考,探求或者流产的样本。因此,这一研究结果关系到妇女在生活中思考困境的不同方式,而不是关系到妇女在进行流产选择时的一般思考方式。

在最初的访谈中,要求妇女讨论自己面临的决定;她们如何去解决问题以及她们正在考虑的选择;她们赞成或者反对一种选择的理由;所涉及的人、所包括的冲突,以及她们以什么方式作出这个影响到自身地位、与他人关系的决定。访谈的第二部分要求妇女解决三个假设的道德困境,包括从柯尔伯格研究而来的海因茨困境。

在把皮亚杰对于儿童道德判断的描述引申到青少年以及成年人道德判断的过程中,柯尔伯格(1976)区分了道德冲突与选择的三种视角。在把青少年的道德发展同这一阶段的反省思考

的发展联系起来时,柯尔伯格把这三种道德命名为前习俗、习俗、以及后习俗道德,它们反映了道德理解力从个人到社会,再到一种普遍性观点的发展。按照这一结构,作为起点的一直是习俗道德或者是把正当或美德等同于维护现有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道德。由于前习俗道德判断标志着没有能力形成一种共同的或者社会的观点,后习俗判断超越了这个判断。前习俗判断以自我为中心并以个人需要进行道德建构;习俗判断建立在维系关系、集团、团体以及社会的共同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后习俗判断对社会价值观念采取了一种反省性的视角,建构起普遍应用的道德原则。

在视角上越发地趋向差异性、综合性、反省性思考形式的变化,也体现在妇女对于真实的和假设的困境的回答中。但是,正像形成妇女道德判断的习俗不同男性一样,女性关于道德领域的定义也背离了从男性研究中得出的定义。女性把道德问题建构成关系中的关怀和责任问题,而不是建构成把她们在道德思考方面的发展同责任和关系理解上的变化联系起来的权利和准则问题,如同公正的道德概念把发展与平等以及互惠的逻辑联系起来一样。因此,关怀伦理学的逻辑基础是一种心理上的关系逻辑,它与那种表明公正探讨的公平的形式逻辑形成对比。

妇女对流产困境的建构特别揭示出存在着一种不同的道德语言,这一语言的进化描绘了一个发展次序。这就是自私的和责任的语言,它把道德问题定义为实现关怀和避免伤害的义务问题。在漠不关心的反应中,伤害的痛苦被看成是自私的和不道德的,而关怀的表示被看作是履行了道德的责任。倘若这种语言反映出基本的道德方向,妇女在思考道德冲突和选择时对“自私”和“责任”这类语言的反复使用便使妇女同柯尔伯格研究

中的男人分离开来,表明了对道德发展的不同理解。

流产决定研究揭示的这三种道德视角意味着关怀伦理学的发展次序。这些关怀与转折之间的不同观点可以通过妇女对于像**应当,应该,更好,正当,善与恶**一类道德语言的使用方式来分析,通过这些语言在她们思考中的变化,以及她们反省和判断自己思考的方式来分析。在这个次序中,最初集中在为了确保生存而关怀自我,随后出现一个转折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把前面的判断批评为自私的。这种批评标志着由责任概念产生了对自我与他人联系的新理解。对这种责任概念的解释以及它与母性道德,即试图对依赖者和不平等者进行保护的道德相结合构成了第二种视角的特点。按照这一视角,善等同于关怀他人。然而,当他人被唯一合法化为妇女关怀的接受者时,妇女本人的排除带来了关系中的问题,产生引起第二次转折的失衡。按照习俗定义与关怀的等同,自我与他人之间不平等的不合逻辑导致女性对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并且努力去消除自我牺牲与女性美德习俗中固有的关怀之间的紧张关系。第三种视角集中在关系动力上,通过对他人与自我关系的重新理解,消除了自私与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关怀成为自我选择的判断原则,并且仍旧在心理上保留对关系和反应的关注,但是它在谴责被利用和被伤害方面成为普遍化的东西。因此,对于人们关系心理的愈发充分的理解,自我与他人的日益分化,对于社会相互影响的动力不断深化的把握宣告一种关怀伦理学的诞生。这种反映出不断积累的人类关系知识的伦理学围绕着一个核心发展,这就是自我与他人是相互依赖的。对于这种联系的不同思考方式,或者说理解这种联系的不同方式标志着三种视角以及它们的转折阶段。按照这一次序,相互联系的事实表明这样一种关键性的,反复出

现的认识,即正像暴力事件最终要摧毁所有人一样,关怀行为最终也增强了自我与他人的力量。

最初建构的流产决定关注的是自我。这是一种现实的,涉及到生存的关心。妇女仅仅关怀自己是因为她感觉到孤立无助。从这个视角来看,应当与**意欲**无法区分开来,其他人只有以自身力量影响到事态结果才能对决定产生影响。当19岁的苏珊被问到发现自己怀孕后想到什么时,她回答说,“我除了不想要孩子之外真的没有想过任何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不想要孩子,我不准备要,我还有年就毕业了,我想继续上学。”当人们问她在流产问题上是否存在着正当的决定或方式时,她回答说,“没有正当的决定。**(为什么?)**我不想要。”对她来说,只有在自己的需要发生冲突时,正当的问题才会出现;因此,她必须作出决定应该优先满足哪一种需要。这也是另一个19岁的姑娘琼遇到的困境,她把有孩子不仅看成是通过提供一个“绝妙的结婚和脱离家庭的机会”来使自己获得更多的自由,而且把自己的自由限定为“要做许多事情”。

按照这种理解方式,作为关怀唯一对象的自我受到缺乏权力的限制,这来自分离的、事实上是孤立无助的感觉。“要做许多事情”的愿望一直与实际生活中受到的各种限制不相吻合。关系通常说来是令人失望的:“你将抛开一个家伙的唯一途径是受到伤害。”因此,处于这般境地的妇女慎重地选择了孤立以保证自己不被伤害。19岁的马撒觉得自己要对弟弟的意外死亡负责,这是她感到最亲的人,当人们要求她描述自我时,她这样说道:

“我真的不知道。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基本上把握了性格的轮廓。我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我的确不想

向什么人要求什么事情,我在生活中是一个孤独者。我宁愿自己做也不愿意围着别人转。我情愿同有数的几个人保持朋友关系,确切地讲我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东西。我是一个孤独的人,我愿意这样。日复一日。”

16岁的贝蒂坦率地承认关心生存是最重要的,她对海因茨是否偷药救妻的困境作出判断时说:

“我认为生存是人们在生活中为之奋斗的第一需要。我想它是最重要的东西,比偷盗更重要。偷盗或许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你不得不以偷盗来保存自己,或者甚至去杀人,这都是你应该做的……,我认为保存自己是头等重要的。它在生活中要摆在其他事情之前。”

伴随这一观点的转折,第一次出现了自私和 Responsibility 的概念。在对一直作为判断基础的自我利益的重新定义中,最初关系到的是自我。转折问题是一个依恋他人或与他人联系的问题。怀孕把这个问题突出出来,这不仅是通过提出一个直接的、实在的联系,而且是最具体、最实际的方式肯定了承担成年女性角色的能力。尽管有孩子最初看起来缓解了青少年的孤独,解决了依赖与独立的冲突,但事实上青少年怀孕通常继续了这些问题,增加了社会孤独,并妨碍了进一步的独立。

在社会和身体意义上成为母亲需要承担父母关怀和保护孩子的责任。然而,为了能够关怀另一个人,一个人必须首先负起关怀自己的责任。17岁的乔赛在描述自己对怀孕的反应时,表达出被想象为从自私走向负责的从童年到成年的发展,她说:

“我开始时感觉怀孕真的不错,并没有感觉到很不好,因为我并没有现实地看待这一情况。我只是以自私的需要来看待它,因为我是孤独的。事情对我来说并非很顺利,所以我这样看

待这件事,我能够有一个可以照顾,或者是属于我的一部分东西,这使我感觉良好。但我并没有从现实出发看到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我逐渐地作出要去流产的决定,因为我意识到了有孩子将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就像你必须钉在那里一样,你总是不能走出家门,而走出家门正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决定必须承担起对自己的责任,我必须出去做许多事情。”

乔赛现在把自己先前的判断方式,即希望通过有个孩子来克服孤独和建立联系的方式批评为既是“自私的”又是“不现实的”。希望有孩子同希望获得“总是走出家门”的自由之间的冲突,即联系与独立的冲突,依据一种新的优先权得以解决。当判断标准发生变化时,这个困境设想了一个道德范围,愿望与必要性之间的冲突被铸成**意欲**和与**应当**之间的差异。在这个结构中,有意的“自私”决定与道德选择的“责任”是相互矛盾的:

“我想做的事是有一个孩子,但是我感到我应该做的,也是我必须做的是马上去流产,因为有时一个人想做的事并不见得是正确的。有时必做之事要摆在想做之事的前面,因为后者并不总是正确的事情。”

怀孕本身确定了女性的认同,正如乔赛所说:“我开始时感觉怀孕真的不错。怀了孕,我开始感到真的像个女人。”但流产的决定构成她对成年人责任选择的实习:

(你如何对你自己描述自己?)“我现在看待自己的方式同从前不同了,从前我一直有一个的确沉重的决定压在身上。在我的生活中,我从未真正作出过许多严肃的决定,现在我已经作出了。这样做需要承担某种责任。我在这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作出一个严肃的决定,而且一直感觉不错,因为就我本人来说,在这之前我并没有现实地对待它,我跟随自己的意愿走,即

使它是不正确的。由此在作出决定方面,在照顾自己和为自己做事方面我认为自己变得更成熟了。我认为在其他方面这也对我有帮助,如果我有其他决定压在身上,也要承担某种责任。我知道自己能够承担它们。”

在对这种认识重构的突然顿悟中,旧的观念转变为新的观念。“为我自己做某些事”的意愿保留着,但是实现它的术语发生了变化。对乔赛来说,流产决定在与关怀和责任的结合中既肯定了女性的认同又确定了成年的地位。另一个青少年认为,道德是“一个人看待自己的方式。一个人迟早必须打定主意开始照顾自己。如果你认为有这样做的正当理由,流产就是在帮助你开始照顾自己和去做不同的事情”。

既然这种转变标志着自我价值的提高,它也需要一个自我概念,需要一个包括了做“正当事情”的可能性,能够看出自身美德的潜能,因此具有社会价值意义的自我概念。当人们认真怀疑这种自信时,可能就会提出转折的问题,而且发展受到了阻碍。安妮为这种转折的失败提供例证,尽管她理解了涉及到的问题,她在接近21岁时努力去解决自私与责任之间的冲突,但却没能摆脱自己是否进行第三次流产的困境:

“我认为你必须想到所涉及的人们,这里面也包括你自己。你对自己有责任。无论作出一个什么样的正确决定,都取决于你已经掌握的知识对于责任的意识,你是否能与孩子生存下去,孩子将给你与这位父亲的关系带来什么,孩子将如何影响他的感情。”

她拒绝卖掉孩子的想法,拒绝通过“在黑市上干这种事来赚许多钱……因为我通常遵循原则行事,一想到我将卖掉自己孩子就会让我恼怒”,安妮与责任概念斗争,这个概念又令她重新

回到自我生存的问题上来。转折似乎受到一直矛盾着的自我意象的阻碍：

(你如何面对自己描述自己?)“我把自己看成是爱冲动的，现实的——这是一个矛盾——道德与非道德的矛盾。事实上唯一贯彻始终的和没有矛盾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很懒，每个人都不停地指出我这一点，这实际上是某些其他东西的表现，而我却从不能确切地说出这种东西是什么。我曾花费很长时间去喜欢自己。事实上有时我也不喜欢自己，我认为把这个说出来是有益的，有时我认为自己过于孤芳自赏了，我或许自我逃避得太多，这使我逃避了对自己的责任以及对其他喜欢我的人负责。我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我曾有一段时期甚至难以接受自己是一个人，因为世上充斥着如此之多的腐败，而人们又是那样的卑贱和麻木不仁。”

当她把自己看成要逃避责任时，她无法找到摆脱怀孕困境的基础。她在作出明确决定方面的无能为力只是进一步加深了她那总体上的失败感。在谴责父母强迫青春期的她去做自己并不想做的流产是对她的背叛时，她现在也背叛了自己并且也对此进行谴责。从这方面来说，她考虑卖掉自己的孩子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她感到自己实际上已经被父母为了顾全面子而卖掉了。

从第一种视角到第二种视角的转折，从自私到责任的转变是通向社会参与的途径。从第一种视角来看，道德是由社会强加的约束，在这种社会中，一个人更多的是臣民而不是公民。从第二种视角来看，道德判断取决于共同的准则和期望。这时妇女通过接受社会的价值观证实了自己成为社会成员的合法认同。现在善的普遍判断，被看成取决于其他人的接受，成为了像

生存一样的胜于一切的关注。

这里,传统的女性声音极为清晰地出现了,根据关怀和保护他人的能力来定义自己和声明自己的价值。妇女现在建构起一个对女性美德充满设想的世界,这反映在布劳维曼和其他人的研究模式中(1972),在这里,所有在人们看来期望妇女具有的特点都假定了另一方面,即一个“驯服的、温柔的、易于表达情感的”接受者,这使得妇女在对于满足她那“很强的保护性需要”(63)回报以关怀时,可以敏感地作出反应。这种地位的力量在于它的关怀能力;这种地位的局限在于它强加在直接表达方面的限制。这两种特点都在19岁的朱迪那里得到说明,她把自己不情愿作出批评同男朋友的直截了当进行比较:

“我从来不想伤害任何人,我以非常善意的方式告诉他们,我尊重他们的意见,他们能够按照自己意愿行事,而他通常立即表达对人们的打击,他公开地做许多我在私下里做的事情。这样更好,但我恰恰做不到这一点。”

即使她作出明确判断也不表达出来,至少不以公开的方式表达出来。在感觉到其他人强迫自己服从他们的意志时,她仍然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批评,以考虑为借口把脆弱和表里不一掩饰起来。

在这一发展阶段上,冲突尤其以伤害的问题出现。在没有一种选择能够满足每个人最大利益的情况下,在责任冲突和决定包括了要牺牲某人的需要时,妇女便承担起一个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选择受害者。19岁的卡西担心第二次流产对自己的影响,但也面临家人和恋人反对继续怀孕的意见,她描述了这一困境:

“我不知道什么选择对我来说是可行的:或者要孩子,或者

去流产；这些都是我可以作出的选择。我认为令自己困惑的是：它是一种或者伤害到我本人，或者伤害到我周围什么人的选择。那么什么是更重要的呢？如果能有一种幸福的手段就好了，但它并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伤害某个人就是伤害我自己。”

尽管把善等同于自我牺牲的女性对这种困境的“正确”解决发出明确命令，但对她们自身来说，可能具有更大的利害关系，在任何情况下牺牲胎儿都要对由关怀他人产生的一种流产的利他主义作出让步。既然女性本身在流产的冲突中打算作出爱和关怀的表示，这种解决就容易消除它自身的矛盾。

“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必须在自己热爱的两样东西中作出选择，”21岁的丹尼斯说。她做了一次自己并不想做的流产，因为她感到这不仅是对自己恋人而且是对他妻子儿女的一种责任：

“我很想要这个孩子，我真的不相信流产。谁能说清生命是从何时开始的？我认为生命始于胚胎。我感到体内发生了各种变化，我感到有很强的保护能力。但是我也感到一种责任，如果（他妻子）碰巧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应当负起责任。他让我感到自己必须作出选择，而且只能作出一个选择，那就是流产，在其他时候我总会有个孩子，他令我感到我不能要这个孩子，它会导致我们分开。”

就怀孕而论，流产决定对她来说是一个不用选择的决定：“那是我的选择：我不得不这样做。”不同的是，她选择让怀孕服从于关系的继续，她视这种关系为自己的生活：“自从我遇到了他，他就一直是我的生活。我为他做一切事情；我的生活围绕着他转。”既然她想要孩子目的也是为了继续这种关系，两种选择中的一种都可以解释为自私的，而且既然这两种选择都带来对

他人的伤害,任何一种选择也都不能被看成是道德的。面对一个用她的话说是站不住脚的决定,她寻求逃避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把这个决定说成是为了恋人和他妻子的需要而对自己需要作出的牺牲。然而,这一以责任为名的公开牺牲导致了一种私下的怨恨,它以愤怒爆发出来,同时也危及到被打算维持下去的不寻常的关系:

“这之后我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因为我仇恨提起这件事,我自己是错误的,但我还是谴责他。我对他作了让步。当事情发生时,我作出那种决定。可我能够说,‘我准备要这个孩子,无论你怎样打算,’可我恰好做不到的就是这一点。”

这个男人又使她再次怀孕,她在反省中意识到,选择事实上是她作出来的,因为她再次获得现在看起来似乎是一个被错过的成长机会。这一次她试图作出决定而不是放弃决定,她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力量”问题,她努力把自己从无权无势的依赖地位中解脱出来:

“现在我把自已看成一个能够成为强者的人。由于这种状况,我就随波逐流。我以前从未真正地自己做什么事情……,我希望愈发地强大起来,并作出重大的决定,不管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因为自我牺牲的道德证明先前流产的正确性,如果她现在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及承担选择的责任,就必然要对这个判断表示怀疑。因此她对构成自己先前观点的假设提出疑问,即她要对他人的行为负责,而他人也要对她作出的选择负责。责任概念在控制的设想中反弹回来,把断言掩饰为反应。由于这种双向的责任,产生了一系列直接问题,这些问题最终让每个人感到被操纵和背叛。这种观点的逻辑是含混的,因为相互关怀的

道德被置于依赖的心理上。就它的伤害力而言,断言潜在地成为不道德的了。人们可以在柯尔伯格关于道德发展第三阶段的定义中发现这种混淆,在这里赞同的需要与关怀帮助他人的愿意结合起来。因此,当困于依赖的被动性和关怀的主动性之间时,妇女在行为和思考两方面的积极性处于瘫痪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她们变得疑惑不定,因此丹尼斯说自己要“随波逐流”。

伴随这个判断出现的转折是由关注善到关注真的转变来标志的。这个转变始于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重新思考,因为妇女开始在关怀道德的运用当中审视自我牺牲的逻辑。在流产的访谈中,这一转折以**自私**一词的再次出现表达出来。在恢复判断的主动性之后,妇女开始提出问题:把本人需要包括在自己关怀和关切的范围内是自私的还是负责的,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这个问题促使她重新考虑责任概念,并把对其他人所想事物的关切与一种新的、内在的判断并列起来。

在区分自我与他人声音的过程中,妇女提出是否有可能对自己,同时也对他人的声音作出反应的问题,并由此去协调伤害与关怀之间的差异。履行这一责任需要一种新的判断,这个判断首先要求的是诚实。对一个人负责,首先必须认识到他正在做什么。当人们不是根据他人的印象而是根据行为的动机和结果来评价道德行为时,这个判断的标准也因此从善转变为真。

24岁的珍妮特是一个已婚天主教徒,她在第一个孩子出生两个月后再次怀孕,她把自己的困境视为选择的困境:“你现在必须作出决定。因为只有在眼下流产才是可行的,你必须作出决定。如果无法再做流产了,也就失去了选择的余地;你只好去做不得不做的事情。”在流产不合法的条件下,必须具有自我牺牲的道德,以便保证对依赖母亲的孩子进行保护和关怀。然而,

当这种牺牲变得有选择的时候,问题就大不相同了。

珍妮特首先根据自己对他人的责任作出流产的决定,因为在这个时候有第二个孩子违背了医生的劝告,而且造成家庭情感和财政状况的紧张。但是,她也承认流产的另一个理由:“一种情感上的原因。我并不知道这是否是自私的,但孩子确实会把我拴住,现在我并不准备让两个孩子拴住。”

这种自私与责任结合起来的流产理由与她在流产问题上的宗教信念相抵触:

“流产是夺去一条性命。即使它还没有形成,它是潜在的生命,对我来说仍旧是要了一条命。但我必须想到自己,我儿子以及丈夫的生活。首先我想是出于自私的理由,然而又不是。我相信有某种自私的成分。我并不马上想要另一个孩子;我没有准备要。”

这个困境提出了对夺取一条性命的证明问题。“我不想把它掩盖起来,因为我相信这一点,如果我试图去掩盖它,我知道自己将陷入混乱。这将对对我目前实际上在做的事情的否定。”在她扪心自问时:“我正在做的是正确的事情吗?它是道德的吗?”珍妮特把自己的流产信念与继续怀孕的结局进行对比,进而得出结论说,她不能“在道德上严格到以一个决定来伤害另外三个人,而理由仅仅是由于自己的道德信念,”她发现善的问题对解决自己的困境仍具有重要意义:

“道德因素摆在那里。对我来说是要了一条性命,我将自己作出这个决定,我已经感觉到了问题,并同牧师商量。但他说问题摆在那里,而且从现在起这种事情会因人而异,看他们是否有这个想法并仍旧相信自己是善良的。”

然而,善的标准是向内发展的,因为做了流产仍旧相信自己

是善良的取决于自私问题。在人们问她是否道德的行为是依据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来行为,或者它是否为一个自我牺牲的问题时,她回答说:

“我并不知道是否真正地理解了这个问题。在我的处境下,我想流产,如果我不这样做就是自我牺牲,我的确处在这样两条道路中间。但我认为自己的道德是有力的,如果这些原因——经济上、身体上的现实,也包括全家的状况——并非如此,我就没有必要去流产,因而流产是一种自我牺牲。”

在她试图肯定自己的感觉以便确定在决定中止怀孕时,是否自己把这些感觉“考虑在内”,她显然要澄清自己参与这个决定的意义。在这种从自私到责任的第一次转折中,妇女列出了清单以便自己的思考需要不同于自身的需要。但从善到真的第二次转折中,自我的需要必须得到谨慎地揭示。面临自己期望流产的现实,珍妮特解决了自私与资格问题,这似乎是强加到她决定中来的“善”。但是对自私的关注最终也产生了对诚实以及真的关注:

“我认为自己有一点点儿自私,而且非常感情用事,我认为自己是个很现实和通情达理的人,我能够很好地处理生活中的各种情况,在许多情况下我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我感到对自己以及对与我发生关系的什么人来说是正确的和最有利的东西。我认为这个决定对我来说是非常公正的,我确实认为自己一直是正确的,没有隐瞒任何东西,说出了所有感觉。我感到这是一个明智的、诚实的和现实的决定。”

因此,她努力把自己和他人的需要包括进来,对其他人负责并因而是有“善”的,对自己负责并因而是“诚实的”和“现实的”。

尽管从一种观点看来,注意到自己的需要是自私的,但从另

一种视角看来,这不仅是诚实的也是公正的。这是向一个新的善概念转折的核心,此时,善转向内部,承认了自我并且接受了选择的责任。关于“善的理由”的外部证明对珍妮特来说也仍然具有意义:“我仍旧认为流产是不正当的,它是错误的除非现实表明你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然而,对于证明的寻求在她的思考中发生了变化,“不是激烈的,而是渐进的。”她意识到,在继续怀孕情况下,她惩罚的不仅是自己而且是她的丈夫,她已经开始感到对丈夫的“躲避和恼火”,这使她考虑到自我牺牲对自己和他人可能产生的后果。珍妮特最后说,“上帝能够惩罚,但也能够宽恕。”对她来说仍旧存在的问题是,是否要由于一个不仅满足他人需要,而且“对自己是正确的和最有利的”决定而作出让步。

对自私的关注以及它与不道德的等同再现于对桑德拉的访谈中,她是一个29岁的信奉天主教的护士,她以这样的陈述来强调自己的流产决定,“我一直认为流产是谋杀的装饰语。”最初她把这种谋杀解释为程度较轻的谋杀,因为“我做流产是由于我不得不做。我不做这件事至少是因为我不想做。”因此,她把这件事判断为“并非完全是邪恶的。人们完全能够作出相反的推论。”既然“许多保住孩子的理由都是不实际的和冠冕堂皇的”,她考虑了或是流产或是让人收养这个孩子的选择。在这之前她曾有一个孩子被人收养,她发现“在心理上已经没有余地原谅自己让另一个孩子被人收养。我用了四年半的时间才抬起头来。我绝不可能再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因此,她把把这个决定归结为在谋杀胎儿和伤害自己之间的一种选择。这个选择又由于这样的事实而进一步复杂化了,即继续怀孕不仅会伤害自己而且会伤害同她一起生活的父母。面对这些多重的道德冲突,为咨询

所要求的心理上的诚实最终使她作出一个决定：

“对我来说，我去流产不是仅仅为了我自己；我这样做是为了我父母。我这样做是因为医生告诉我这样做，但在我的心目中从未消除过我为了自己才这样做的想法。事实上我必须坐下来承认，‘不，我现在真的不想立即走上做母亲的道路。坦率地说，我并没有感觉到我想成为母亲。’这样说毕竟不是坏事。但我在与(顾问)谈话之前，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去感觉的确是件可怕的事，因此我将不去感觉它，我刚好卡在那里。”

只要她仍旧进行“道德的”考虑，流产就只能作为一种自私的行为证明是正确的，在缺乏选择而避免责任的情况下服从一种必要性。这样她能够避免自我谴责，因为“当你涉及到道德内容时，你也就开始建立自尊，如果我做了自己感到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事，那我也就失去了作为人的某种自尊。”她之所以要逃避责任，主要是为了保持在她看来为自尊所必需的清白，这同她参与作出流产决定的现实是矛盾的。在自己是受害者的借口中表现出来的不诚实导致一种冲突，带来对更充分理解的需要。她现在必须解决自己在思考中对**正确**与**错误**两个词使用时出现的矛盾。“我的意思是流产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是正确的，我将要做这件事。但事实上它们最终将不得不联系在一起，我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要把它们联系起来。”当人们问她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时，她回答说：

“我将把道德上的错误变为道德上的正确。(如何变呢?)我说不清。我认为你不能做自己感到道德上错误的事情，因为具体情况使这件事变为正确的，并把这两者联在一起。正确和错误是无法联系起来的，它们是对立的。它们不能走在一起。如果某事是错误的，但它完全是出人意料的，因为你做了这件事，

它就是正确的。”

这种不一致令人回想起她面对安乐死问题时出现的一个相似的矛盾,她在道德上也把安乐死看做是错误的,这一直到她负责照看“一些脑死亡的患者,看到给他们给自己家庭带来麻烦”的时候,这种经历令她意识到:

“直到你真正接近这些人,面对着安乐死时,你才会真正懂得自己的看法是否正确。如果你静下来设想一下自己遇到安乐死时的感情,并进而想一想自己遇到流产问题的感情,我认为这两者都是谋杀。或黑或白,没有中间路线可走,但也有一种灰色。”

在发现这种灰色以及对自己以前认为是绝对的道德判断提出疑问时,她面对第二次转折的道德危机。现在以往指导她进行道德判断的习俗变为对新批判的服从,因为她不仅对在道德名义下伤害他人的证明提出质疑,而且对伤害自己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然而,如果在把善等同于自我牺牲的习俗下坚持这种批判,桑德拉必须证实自己独立判断的能力以及自己观点的合法性。

转折再一次取决于自我概念。当对自身价值的不确定对妇女的平等要求构成妨碍时,坚持自我权利就成为陈腐的自私批判的牺牲品。因此,在关怀责任名义下宽恕自我伤害的道德并没有以不适当为由被抛弃,只是当它威胁到生存时才被彻底抛弃。没有把自身包括进来的道德义务未被彻底地抛弃,直至得不到回报使妇女不再情愿去保护其他人,因为这在现在看起来是以妇女的自我牺牲为代价的。在缺乏道德的情况下,生存无论是“自私的”还是“不道德的”都会再次成为人们首先要关心的东西。

年近 30 岁的音乐家埃伦为这一转折的困境提供说明。在经历过一段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的独立生活之后,她把自己看成一个“相当具有意志力和控制力,相当具有理性和坚持客观性”的人,这直到她陷入热恋,在自己爱的能力中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个“全新的世界”时。她在回忆过程中承认自己是“极为天真的和理想主义的”,并且已经产生了“模糊的想法——某一天,我将喜欢要一个体现我们关系的孩子,而且总是把有孩子同我生活的所有创造性联系起来。”同恋人在一起时她拒绝采取避孕手段,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这种关系是一种理想的结合,我们喜欢不使用异物或者人工的东西,”她把自己看得已经失去了控制,而变得“只有迷离混沌,让事情牵着我的鼻子走。”当她开始面对“整个事情的现实时——怀孕的可能性以及恋人已婚的事实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困于”期望终止“似乎越来越失败的”关系与期望有一个孩子——它将是“永久性的联系”——之间,她被自己在解决由于模棱两可造成的困境方面的无能为力弄得麻木不仁了。

怀孕产生了她自己在“一旦某一生命开始,就不应人为地终止”的“道德”信念与她“吃惊的”发现要了孩子,她将需要比自己预想的更多的支持之间的冲突。尽管具有自己“应该”要孩子的道德信念,她还是怀疑自己在心理上能够解决“独自养孩子并对他负责”的问题。因此,在她自以为有保护生命的道德义务与如果怀孕,自己没有能力这样做之间爆发了冲突。在把冲突看成“我的决定以及我要对作出是否要孩子的决定负责时,”她努力去寻找一个有效的理由去解决这个困境。

人们对流产的赞成或者反对都能借助“一种哲学逻辑”来进行争论,埃伦认为,一方面,在人口过剩的世界,每个人都应该在

理想的关怀条件下要孩子,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在不可能维持生命的条件下才应该终止一个生命。在被问及她想做的事情以及她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之间是否存在差别时,她描述了自己再度面临的僵局:

“是的,它们总是有差别的。在我的许多选择中,我一直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我一直试图搞清是什么东西使得我相信这些事情是自己应该做的,而这些事情又与我感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相反。(在这种状况下吗?)这并不是很清楚的。我既想要一个孩子又感到我应该有一个孩子,我也认为自己应当流产和想去流产,但我能说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后者。我对自己的工作还没足够的自信,这的确是全部问题所在。流产将解决这个问题,我知道自己无法应付怀孕。”

在把流产描述为一种具有“情感和现实”特点的解决,把它归结为自己在工作中缺乏自信时,她把这一解决同自己恋人“更清楚的思考,更具有逻辑和正确性”的决定进行对比,他认为在自己不在身边以及无法提供经济支持的情况下,她也应该保留和抚养这个孩子。面对着把自我想象为最终是给予的和善良的,想象为以自己的创造力可以自立的,因此能够在不对其人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满足孩子的需要,埃伦不仅对这个想象本身提出质疑,而且对自己是否适于它也产生疑问。在得出自己还不能做出这样的结论之后,埃伦把自我贬低为自私的,而且为了“我自己的生存”作出了极大的让步。但她还是说道:

“在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来说我都将受苦。在流产情况下,我将遭受精神上的和情感上的痛苦,或者将遇到我想是某种更糟的处境。所以我认为这是两种程度较轻的邪恶。我想这是一个我知道自己能够经受得住的选择。事实就是如此。我认为这

是自私的,因为它的确同自私相关。我刚好认识到这一点。我猜想它关系到自己是否能够生存的问题。(为什么这是自私的?)这个嘛,你知道它是自私的。因为我把自己的生存摆在首位,而这是与关系的保持或者孩子的生存相对立的。我猜测自己确立了优先权,我想我是把自己的生存需要摆在了首位。我想自己是从许多消极的方面来看待它。但是我也想到其他积极的方面,即或许我将仍旧有某种生活。我说不准。”

面对这种关怀失败,以及在寻求联系时被抛弃的失望,埃伦把生存维系在自己的工作上,工作是“我获得自身意义之所在。这是确定的事情。”尽管自己工作上的不确定导致生存方面的不稳定,流产的选择也是不稳定的,因为它具有“极大的反省性。流产之后将向后退一步”,而“走向去爱别的什么人,有了孩子将向前迈出一大步。”在埃伦对流产代价的估计中,这种通过切断联系来图省事的想法是明显的:

“或许我将做的事是斩断自己的情丝,我不知道它们何时再现或者这之后将发生什么事情。因此,我根本感觉不到任何东西,我或许是非常平静的,并且极为坦然地经历这一切。你为自己做得越多,就越难以再恋爱,再次去相信,或者再次获得感觉。每一次我从这种事情中解脱出来时,摆脱都变得更为容易,没有更多的困难,但是这也更难以使自己投身于一种关系中去。我的确担心斩断了自己所有的感觉。”

由于困在自私与责任之间,在这种选择情况下无法找到一条同时并不带来伤害的关怀途径,埃伦面临着一种道德与生存冲突的困境。在试图把成年与女性结合起来的努力失败之后,选择了去工作的决定,不仅要放弃这种特殊的关系和孩子,而且也抹去了由爱和关怀产生的脆弱。

然而,按照这种理解出现的问题带来对第三种视角的思考,因为变化集中在对于什么东西构成关怀的思考。同样面临失望的25岁的萨拉通过对关系的重新理解找到一条协调最初的自私与责任概念不一致的途径。在对奠定女性自我克制与自我牺牲习俗基础的设想进行审视时,她以不道德为由拒绝了这些习俗,原因在于它们的伤害力。通过把非暴力,禁止伤害的命令提升为一种指导所有道德判断和行为的原则,她能够坚持一种自我与他人之间的道德平等,并把自我和他人纳入关怀的范围内。因此,关怀成为一种普遍的命令,一种自我选择的伦理学,它摆脱了传统的解释,导致以一种允许由选择而来的责任设想来对困境进行重构。

在萨拉的生活里,近来的怀孕再现了先前的怀孕,以及关系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两次怀孕中都出现了这类问题。在恋人离开自己之后,萨拉已经发现第一次怀孕,她以流产的方式终止了怀孕,她把流产体验为遭到拒绝之后发泄愤怒的表示。她把上一次流产记忆为一种解脱,但仍把生活中的那段时间描述为自己“陷入最低谷”的时期。怀着“把握自己生活的希望”,她反过来在那个男人再次出现时又与他恢复了关系。两年之后,她再一次“把避孕工具放在抽屉里”,她又一次怀孕了。尽管刚得知这个消息时萨拉感到“欣喜若狂”,但当她的情人对她说,如果她想保留这个孩子他将离她而去时,她的兴奋便烟消云散了。在这种情况下,她考虑到第二次流产,但却一次次地不能守约,因为她不情愿去承担这种选择的责任。尽管第一次流产是一个“诚实的错误”,第二次流产使她感到“像是走进了屠宰场”。既然养育孩子需要经济上的支持,她最初的策略是把这个问题提交给“管福利的人们”,希望他们拒绝提出必要的资助以便摆脱

自己的困境：

“这样，你知道，责任就从我肩上卸掉了，我能够说，‘这不是我的错。国家拒绝给我养孩子的必要花费。’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我能够得到这种支持，因此，你知道我不得不回过头来。我预约去做流产，我不断地打电话，又不断地取消预约，再预约、再取消，我确实拿不定主意。”

面对在这两种邪恶之间作出选择——伤害自己或者结束孩子刚刚开始的生命，萨拉通过排列决定的优先权来重构这一困境。在这样做时，她逐渐地把这个冲突看成来自对现实的错误建构。她扼要地重述了自己在第一次考虑过程中的发展次序，但接下来又以不充分为由拒绝了它，把这看成出于自己情感上的孤独或者想给他人留下好印象的愿望。最后她把这些考虑归结为对自己以及对那位父亲和孩子的责任：

“这么说吧，赞成要孩子的理由全都是为了得到赞赏——作为一个单身妇女，一个孤独者，一个受害者和奋斗者，以及有一个可爱的、漂亮的婴儿所得到的赞美。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过着我从未有过的更为丰富的家庭生活，这主要在于营造一个美丽的、幻想的乐园。这并不是很现实的。反对要孩子的理由是：它将导致我与身边这个男人的关系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束。我不得不去申请福利补助。我父母从今往后也会怨恨我。我将失去现有的一份确实不错的工作。我将失去许多独立，而且孤独。我将不得不把自己置于不时地向各种人求援的地步。反对流产的理由是必须面临着犯罪。赞成流产的理由是，我将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对付与那位父亲正在恶化的关系，并对他和我自己负起更大的责任。我不必经历这样的现实——在我今后 25 年的生活中，一直为了愚蠢之极的再次怀孕，而且仅仅是由于怀孕而

迫使自己养育孩子而进行自我谴责。必须正视第二次流产的犯罪似乎不那么准确——对啦,准确地说是两次程度较轻的邪恶,但长远地看来,这也是对我个人的报偿,因为通过观察我为什么第二次怀孕,以及随后为什么决定去第二次流产,我必须正视一些自己的事情。”

尽管萨拉对第二次流产并没有“感觉良好”,她还是得出结论说:

“我并不是在为自己、为孩子、为这个世界做任何有助于要这个孩子的事情。我不必由于这个孩子去偿还自己想象的对这个世界欠下的债务,我认为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并用它来达到这个目的是不正当的。”

在被要求描述自我时,她说明了自己在道德理解上的变化如何与一个变化着的自我概念紧密相联:

“近来,我一直在想许多问题,它们以不同于我通常潜意识中的自我知觉形式出现。我经常想的是偿还某种债务,去服务于一些实际上并不值得我注意的人们,因为我在生活中的某一时候已经产生了这样的印象——我个人的需要实际上从属于他人的需要,如果我感到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我将由此产生犯罪感,并在满足他人需要中淹没自己的需要,随后这又从背后向我开火,我感到自己对正在服务的其他人产生很大的怨恨,这又导致磨擦以及关系的恶化。然后我又重新从头开始。我如何对自己描述自己?彻底地受挫,而且有着比自己能够承受的更多的愤怒,有着比自己能够接受的更激烈的攻击性。”

在对构成女性自身的传统定义——以她母亲的声音说出的善的定义进行反思时,她说,“我开始认为所有这些美德实际上

并没有把我带到任何地方。这已经引起我的注意。”她把这种认识与承认自身力量和价值联系起来,这两者在她从前的意象中都被排斥出去:

“我突然间认识到我喜欢做的事情,我感兴趣的事情,我相信的事情,我还不是那种糟糕得总让人摆在架子上任其落满灰尘的人。同自己以往的行为给人产生的印象来比,我还有更大的价值。”

萨拉的“好人”概念从前限于以勤劳、忍让、自我牺牲的母亲为榜样,现在转变为把自己赋予的直率和诚实的价值包括进来。尽管她相信这个新的自主权利会使自己“对自我的感觉更好”,但她也意识到这也将会使自己成为批评的靶子:

“其他人可能说,‘好家伙,她是攻击型的,我不喜欢这种人。’但至少他们将认识到自己不喜欢这样。他们不会这样说,‘我喜欢她为了围着我转而摆布自己。’我想成为的正是一个能够更有力地作出自我决断的人,也想成为一个更为独立的人。”

按照她原有的思考方式,流产似乎是一种“逃避”的办法,她把自己从一个责任者——一个“弥补自己的错误,弥补再弥补,总是随叫随到,甚至说自己到不了时也要出现在那里”的责任者处境中解脱出来。按照新的思考方式,她关于自我的概念以及“对我自己是正当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她能够把这个自然出现的自我看成“一个善良的人”,因为她关于善的概念已经扩大到把“自我价值”的感觉包括进来,并把“你将不会空头地卖掉自己,你也不会去做实际上自己知道是愚蠢的事情以及你并不想去做的事情”的感觉包括进来。这种方向的改变集中于对责任的一种新的认识:

“我对自己有这个责任,你知道,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开始认

识到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代之以去做我想为自己做的事情,而不再为自己如何自私而感觉到有罪的是,我意识到这是人们的一种极为普通的生活方式——做你想做的事情是因为你感到自己的愿望和需要是重要的,如果不是为了其他什么人,只是为了你自己,那也足以构成去做自己想做之事的理由。”

一旦义务扩大到包括了他人和自我,自私与责任之间的鸿沟消失了。尽管在自我与他人之间仍旧存在着冲突,但由于认识到困境出现本身便排除了非暴力的解决,道德问题便得以重新建构。流产决定越发地被看成一个影响自我和他人的“严肃”选择:“这是一条以我蓄意的决定去终止的生命,这真的是非常沉痛、非常沉痛的事情。”在把流产的必要性解释为一种极富妥协性解决的同时,萨拉又把注意力转向怀孕本身,对她来说怀孕标志着不负责任,以及在关怀和保护自己与他人方面的失败。

在第一次转折时,尽管现在使用了不同的术语,但由怀孕产生的冲突造成心理发展上的一些关键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在与他人关系中自我的价值,对选择权利的要求,以及对选择责任的承担。由于唤起人们去面对选择,流产的危机能够变为一个“非常幸运的时刻。人们能够把怀孕作为一种学习,一种开始,这使得怀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益的”。其他妇女也表达了同样的感觉——这种危机为发展提供可能,她们通过面对这种选择对关系产生新的理解,谈出自己对“一种新开始”的感觉,以及“去把握自己生活”的一次机会。

对于面临第二次流产的萨拉来说,这种把握的第一步是结束她一直把自己视为“卑微得失去存在”的关系,但必须采取一种负责的方式。在意识到拒绝不可避免地带来伤害之后,她努力通过“尽我所能在无损于自己”需要的前提下处理恋人要求的

方式来减轻伤害。这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因为我在生活中总在这一点上作出让步,我不情愿再做这种事了”。她代之以寻求一种“体面的,仁慈的方式,一种或许会留下轻微的震撼,但并不完全摧毁一个人的方式来行为”。因此,“失去存在”正视了以往妨碍她断言的破坏力,考虑到一种新的完整地保留自我与他人行为的可能性。

当萨拉根据“谁将受到更大的伤害,是损失了金钱的药剂师还是失去了自己生命的人”的问题来思考海因茨困境时,在道德上关注的仍旧是伤害。她并非以抽象的方式,根据逻辑的优先性来权衡财产以及生命的权利,而是以具体的方式,根据违背这些权利将对所涉及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实际结果来权衡。萨拉的思考仍是根据具体的情境,并且夹杂了关怀的情感,但却开始通过对关系心理动力的更为复杂的理解发出避免伤害的道德命令。

因此,从不平等的威胁中解脱出来最终让妇女表达出以前一直被压抑的判断,而且妇女明确表达出的不是一种新的而是一种摆脱了压抑的道德,以往的这种压抑混淆了人们对它的知觉,妨碍了人们对它进行表达。这种表达和承担判断责任的意愿出自认识到间接的行为对自己、对他人,因而也对关系付出的心理代价。因而,关怀的责任包括了自我和他人,从传统压抑中解放出来的不伤害的命令在关注选择现实的同时也维系了关怀的理想。

伤害的现实性体现在鲁思的判断中,她是一位 29 岁的已婚妇女,一个学龄前儿童的母亲,她在与第二次怀孕造成的困境斗争,这次怀孕在时间上与拿到一个高等教育学位发生冲突。她认为自己“不能蓄意地做不道德的或者对另一个人有害的事情,

因为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我就无法生活”，然而，她面临着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伤害的处境，在寻求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最佳解决办法时，她通过承认一种把对自我和他人的相互关系与作为道德判断以及选择仲裁者的自我意识联系起来的方式定义道德：

“道德就是做适当的事情，做在你的处境下是公正的事情，但理想的是它将不影响到——我要说的是——‘理想的是它将不对另一个人产生负面的影响，’但这是不真实的，因为决定总要对另一个人产生影响，但我还想补充的一点是，这个人正是作出正当与否决定的核心。”

这个在特殊的流产决定中处于关键地位的人，开始是否认自己的需要与各种责任之间的冲突，但接下来她又承认了这种冲突。她把怀孕看成自己内在愿望冲突的表现——她一方面希望“成为学院的院长”，另一方面也“愿意摆弄盆景和种些花草，并和孩子呆在家里”，鲁思努力去解决女性认同与成年之间的矛盾。她把流产看成“较好的”选择，因为“最终意味着明年的这个时候，或者是两个星期之后的这个时候，我将不再怀孕，这会减轻一个人对于我们每个人以及家庭的压力”。她得出结论说：

“这个决定首先必须是妇女能够遵循的决定，一个妇女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遵循的决定，或者至少是试图遵循的决定，它必须根据她的处境，以及在她生活中有意义的其他人的处境来作出。”

在访谈开始时，鲁思以习俗水平的女性建构提出流产的困境，把它建构成自己想要孩子与他人期望自己完成教育之间的冲突。基于这个建构，她认定继续怀孕是“自私的”，因为它是某种“我想做的事情”。然而，当她开始去审视自己的思考时，她放弃了把这个问题概念化的企图，因为这是错误的，并且承认自己

内在冲突的真实性,解释了她所感觉到的在自己工作生活中女性与成年之间的紧张关系。她把自己描述成“朝着两个方向走”,而且珍惜自己的那部分“难以置信的热情和敏感”,以及察觉和满足他人需要的能力。在把自己的“同情心”看成“我自己不想丢掉的东西”时,她认为自己¹对事业成就的追求危及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她最初描述中的自我欺骗,以及保持自己清白的神话都来自于她对说出在这个时候不想要另一个孩子这句话的恐惧:

“应当承认我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我想拥有权利和对他人负责,我想过一种从早9点到晚5点,直至夜里和周末都在忙碌的日子,因为那就是权利和责任的含义。这意味着我的家庭必须摆在第二位。这将会导致这种关于何者是第一位的难以置信的冲突,我不想这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当被要求去解释“一个有事业心的人”的含义时,她说:

“有事业心意味着权利欲和感觉迟钝。(为什么要感觉迟钝?)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要被践踏。一个在这条路上走的人要践踏别人,无论是家庭,其他同事还是追随者。(这是不可避免的吗?)并不总是如此,但是在我工作的有限几年里,我总能发现这种情况经常出现,这令我恐惧。它之所以令我恐惧是因为我不想变得像这个样子。”

由于鲁思把成年人权力的发现看成包括了女性敏感和同情心的丧失,她便把女性和成年之间的冲突解释为一个道德问题。因而流产的困境引起她对于妇女和成年在这个社会上意味着什么的关注,对权力与关怀之间不一致的承认导致寻求一种能在关系和工作中把女性与成年都包括进来的解决办法。

道德发展概念对于女性视角真理性的承认也意味着认识到

在整个生活中自我与他人的联系、同情与关怀的普遍需要对男女两性的意义。不对现实压抑作出让步的分离的自我概念以及道德原则概念是青少年的理想，S. 代达罗斯精心泡制的哲学让我们惊异地懂得处在危险之中。埃克里森(1964)在把青少年道德观念与成年人关怀伦理之间进行的对比中，试图去把握这个融合问题。但是，当他勾画发展的途径时，把成年人亲密的爱情关系，成年人工作和关系生殖力的唯一先驱者看作是儿童时期建立起来的信任，并把所有干涉的体验都标明为通向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步骤，进而分离本身成为发展的模式和尺度。尽管埃克里森观察到，对于妇女来说，认同像关系到分离一样也关系到亲密关系，但他并没有把这个观察包括在自己的发展图式中。

妇女所描述的责任道德像她们的自我概念一样偏离了被标明的成熟轨道。道德成熟的过程被描述为通过青春期对传统习俗的质疑而导致的对个人权利的发现。这个发现普遍化为一个原则化了的公正概念，在对大学生的研究中，通过高年级学生内德为道德下的定义可以证明这一点：

“道德是一种规定，一种遵循的东西，具有道德观念就是试图思考人们能够做什么，以便人们彼此能够一道生活，营造一种平衡，一种均衡，一种每个人都感到有一个空间以及平等分享事物的和谐。做到这些有助于超出个人的事态，在缺少道德的情况下，个人就没有任何自我实现的机会。我认为为了创造一个人们之间相互影响的环境，公平和道德似乎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个人目的得到大部分实现的前提。如果你想让他人不干涉自己的无论是什么样的追求，那么你就必须按照规则行事。”

相反，近30岁的妇女黛安在解释什么使一个问题成为道德问题时，并不是根据权利而是根据责任来定义道德：

“某种试图揭示正确生活道路的感觉以及我总在思考的是，这个世界充满了现实的、随处可见的麻烦，世界正在走向某种毁灭，在目前人满为患的情况下，我们还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是正当的吗？当我有了一双鞋而其他人没有鞋时，我还花钱去买鞋是正当的吗？这一方面是自我批评的观点，还有一方面在说，‘我如何花费自己的时间以及我工作的意义是什么？’我认为自己有一种真正的驱动力，一种真正关怀他人的、母性的驱动力——关怀我自己的母亲、关怀孩子、关怀他人和我自己的孩子、关怀这个世界。当我处理道德问题时，我不断地对自己说，‘你照顾到所有自己认为是重要的事情了吗？在哪些方面你没有发挥好自己，没有对解决哪些问题尽力？’”

尽管黛安的视角似乎明显地具有后习俗水平的性质，她对道德困境的判断并没有满足按照公正方向进行原则性思考的标准。然而，这个判断反映了一个不同的道德概念，按照这个概念，道德判断指向责任和关怀问题。在后习俗水平上按照责任方向指导道德决定的方式可以由30岁的妇女沙伦来说明，当人们问她什么是作出道德决定的正确方式时，她回答道：

“我知道的唯一途径就是尽可能地去认识，去了解自己感觉的范围，试图考虑到所有包括进来的因素，尽你所能地去想象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尽你所能地去认识你正在往哪里走。（你有什么指导原则吗？）这个原则同责任有关，同对你自己以及他人的责任和关怀有关。但是，这并不是你一方面选择去负责，另一方面选择去不负责。在这两个方面你都能够负起责任。这就是为什么不存在一个一经你坚持便可以解决问题的原则的理由。把这个原则应用到实际中时你还是面临着冲突。”

在对妇女的访谈中，反复出现的道德命令就是关怀命令，以

及对分辨和缓解这个世界“现实的、随处可见的麻烦”的责任。对男人来说,道德命令似乎更以尊重他人权利出现,因此也是保证生活和自我实现的权利不受干涉的命令。妇女对关怀的坚持最初是自我批评式的而不是自我保护式的,而男人则根据不受干涉的原则一开始便从否定的方面设想对他人的义务。因此,两性的发展似乎包含着一种权利与责任结合,这种结合通过对这些不同观点互补性的发现来完成。对妇女来说,权利与责任的结合通过理解关系的心理逻辑出现。这种理解以肯定所有人都需要关怀来缓和在自我批评道德中潜藏的自我毁灭性。对男人来说,通过在关怀过程中对更为积极的责任需要的体验而产生的认识,纠正了不干涉中潜在的道德冷淡,把注意力从逻辑转到了选择结果(Gilligan and Murphy, 1979; Gilligan, 1981)。在后习俗水平道德理解力的发展中,妇女逐渐看到不平等中包含的暴力,而男人则越发认清公正概念忽视了人类生活差异的局限性。

以抽象方式呈现出来的假设的道德困境,把道德行为者从他们个人生活背景和心理中抽取出来,把道德问题同它可能发生的社会背景分离开来。在这样做时,这些困境对于分化和精炼客观的公正原则,对于权衡平等以及互惠的形式逻辑是有益的。然而,按照情境的特殊性重新建构道德困境提供了对原因和结果的理解,它确保人们一再注意到的体现妇女道德判断特点的同情和容忍。只有在为想象中的人们赋予有血有肉的生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考虑到他们的道德问题所反映出来的社会不平等,想象出他们的处境所标志的个人苦难或者是解决办法。

妇女根据现实重构假设困境的倾向,要求提供被忽略的关于人性或人们生存环境信息的倾向,使她们的道德判断摆脱了

原则的等级次序以及决策的形式过程。这种对特殊性的坚持一般说来表明了困境以及道德问题上的一种方向,它不同于任何现有的对于发展阶段的描述。因此,尽管在流产研究中,几位妇女明确提出后习俗水平的元伦理学观点,但在对柯尔伯格的假设困境作出规范性道德判断时,她们中没有一人被看成是有原则性的。不同的是,妇女的判断表明识别出了困境本身固有的暴力,这被看成是对任何可能的公正解决作出了妥协。这种困境的建构致使妇女从对善的考虑转到在恶之间作出选择来重构道德判断。

讲出自己希望成为大学校长或者成为另一个孩子母亲之间冲突的鲁思把海因茨困境看成自私与牺牲之间的抉择。针对海因茨偷药问题,她从海因茨的生活状况推论说,他没有能力付2000美元,因此他“必须做某种不能使他获得最大利益的事情,因为他将被驱逐,这是最大的牺牲,一种我认为一个真正爱着的人可能宁愿作出的牺牲”。然而,不去偷药“对他来说是自私的。他必定会对没有为妻子提供活下去的机会而感到有罪”。海因茨偷药的决定并没有根据生命对于财产的逻辑优先性来思考,并借此来证明它的正当性,而是根据偷药对于手段有限、社会地位卑微的人所产生的实际后果来思考。

根据事情可能出现的结果来考虑——他妻子的死,或者海因茨的入狱,由于这种体验的暴力性,以及他的生活由于一次重罪记录而蒙受伤害变得残酷起来,但困境本身是变化的。它的解决与依照抽象概念进行的生命与财产关系的权衡没有多大关系,而更多地关系到从前是联系着的,但现在是对立着的两条生命之间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一条生命的延续只能以牺牲另一条生命为代价。这个建构使得为什么判断围绕着牺牲,为什么

任何一种解决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犯罪变得明朗起来。

人们在妇女道德判断中注意到一种保留,从鲁思对她为什么不情愿根据自己的信念作出判断的解释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我认为每个人的存在都是那样的不同,使得我对自己说,‘那可能是我不做的某种事情’,但我不能说这事对别人正当与否。当我面对具体问题时,我只能解决对自己来说什么是恰当的问题。”

在被问及她本人反对伤害的命令是否也适用于他人时,她回答说:

“我不能说这是不正当的。我不能说它是正当的或者不正当的,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使另一个人要做某事去伤害他。这个人受到伤害是不正当的,但是那个刚好失去工作的人借愤怒出气是正当的。这事虽然不能把面包摆在他桌上,但却是一种释放。我的意思不是逃避。我的确想为你得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她对道德问题作出明确回答的困难,她在建构海因茨问题时出现的紧张感都来自这些问题与她本人思维模式的差异:

“我现在甚至并不想用**正当**或者**不正当**这类词语,我知道自己没有使用道德这个词,因为我不肯定自己懂得它的含义。我们在谈论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我们正在谈论的所有事情都是不正当的,而且确实是错误的——我使用了自己并不经常使用的词——而且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改变无法控制。如果我能改变它,我的确会这样做,但我能做的只是日渐一日地奉献微薄之力,如果我没有故意伤害什么人,那就是我对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做出的贡献。因此,这部分贡献也不是把判断传达给他人,尤其是在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去做某些事情的情况下。”

不情愿作出判断仍旧是不情愿作出伤害,但这并非来自个人的脆弱感,而是来自对这个判断自身局限性的认识。因此,在后习俗水平上仍旧保持着习俗水平上女性视角的差异,这与其说是道德相对主义,不如说是一个重新建构的道德理解的组成部分。在人类行为的心理意识以及社会约定方面的道德判断被抛弃了,同时,道德关切也在对人们痛苦和苦难的现实认识中得到重新肯定:

“我有一件的确伤害了他人的事情,而且总是在发生,尽管它不时地变得更复杂一点,因为举个例子来说,你不想伤害自己的孩子。我也不想伤害自己的孩子,但是如果我有时没有伤害她,日后那将是对她更大的伤害,你知道,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可怕的困境。”

道德困境是可怕的,因为它们包括了伤害。鲁思把海因茨的决定看成是“痛苦的结局:我正在伤害谁?为什么我必须伤害他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问题就不在于海因茨作贼是否道德,而在于他宁愿为了救妻子而挺身而出,代替她的位置成为这个社会剥削的受害者——一个产生并且合法化了这个药剂师的不负责任,以及由此导致海因茨成为这个困境所表现出的社会不公正的受害者。

在另一位妇女以类似的根据来判断海因茨行为的回答中,对于涉及到的不正当问题也明显抱有同感,她说,“我认为剥削确实不应是件正当的事情。”当妇女开始作出直接的道德判断时,她们不断强调的是剥削和伤害问题。在这样做时,她们提出非暴力问题,这与埃里克森(1969)结束思考甘地的生活真理出现在完全相同的心理背景下。在那封给甘地的重要信件中(对他著作的评价围绕着这封信发生了转折),埃里克森面对着一个

矛盾——甘地对待英国人的非暴力哲学与他的心理暴力之间的矛盾,这种心理暴力体现在他与家庭、与在乡间冥思小舍中的孩子们的关系中。埃里克森承认,“这几乎使我达到感觉无法再继续写这本书的境地,因为我似乎感到在真理抗争中非真理的存在;感到当所有的话都在解释一种不真实的纯洁时,某种不洁的东西的存在;最重要的是在公开主张非暴力的情况下,被替换的暴力的存在”(230—231)。

在试图解决甘地的不合作主义与自己理解的心理分析真理之间的关系时,埃里克森提醒甘地说,“真理,一旦你说了出来,‘就排除了暴力的使用,因为人们不能认识绝对真理,因此也不足以惩罚’”(241)。不合作主义与心理分析的结盟在于它们同样都把生活看成一种“真理的尝试,”在于它们“在‘治疗’世界方面的某种服从希波克拉底原则的结合——人们只有通过避免伤害的行为(或者对疾病本身的控制)——或者更好的是通过扩大互惠的,以及缩小由单方面强迫或治疗造成的暴力行为来检验真理”(247)。因此,埃里克森责备甘地没有认识到真理的相对性。这种失误体现在他声称独占真理的强迫性,他的“除非在‘内在声音’赞同的情况下,否则不情愿从任何人那里学习任何东西”(236)。这种主张导致甘地在爱的掩饰下把自己的真理强加给他人,而没有意识到或者考虑到自己由此对其他人的正直所施加的暴力程度。

由真理冲突不可避免地产生的道德困境按照定义来说是一种“病态的局面”,因为无论它采取何种形式都没有提供消除暴力冲突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困境的解决并不在于合理化了暴力的自我欺骗:甘地说,“我是一个冷酷而善良的丈夫,我把自己看成她的教师,由于我对她盲目的爱而如此地折磨着她”(233)。

相反,这种解决在于以尊重和相互关怀来代替潜在的对抗性。

人们以一种判断来批评柯尔伯格作为道德判断第六阶段化身的甘地——埃里克森最初作为成年人伦理敏受力样板来探索的甘地,这种判断就是拒绝把目光从伤害的痛苦中移开或者是宽恕这种痛苦。在否定自己妻子不情愿为陌生人打开家门的正确性,以及对青春期性关系和诱惑力的不同现实视而不见时,甘地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对非暴力伦理作出让步,而他在公共场合却一直把这一伦理当作原则来坚持。

然而,这种让人为真理作出牺牲的盲目意愿一直是从生活中抽象出来的伦理学所面临的危险。这一意愿把甘地同圣经中的亚伯拉罕联系在一起,他准备用牺牲自己的儿子来证明自己信仰的完美和崇高。这两个限于自己父亲地位的男人与所罗门王面前的妇女形成鲜明对比,她通过为了救孩子而放弃真理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母亲身分。在评论甘地的生活时,埃里克森批评的正是这种原则化了的、牺牲关怀的成年伦理学。

在《威尼斯商人》中,同样的批评也被形象地戏剧化为两性之间的对比,在这一剧本中,莎士比亚全面研究了性别认同的不同寻常的复杂性,让女演员女扮男装,然后作为男法官出庭,把女性的怜悯论辩带入男性公正的城堡。契约化公正概念的局限性由它文字上有效的荒谬性得到说明,而对于“所有时候都存在着例外”的需要则在这一借赌事件中相应地得到证明。波蒂阿在请求怜悯时,申辩一种没有人受到伤害的解决,人们宽恕了借款人没有信守诺言和按期还款,安东尼奥转面也放弃了摧毁夏洛克的“正当性”。

流产研究说明妇女对道德问题的不同建构——根据冲突着的责任看待道德困境。这一建构通过一个三种视角的发展次序

来追溯,每一视角都代表着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更为复杂的理解,每一转折都包括对自私与责任之间冲突的关键性的重新解释。妇女道德判断的次序从最初对生存的关切发展到集中于对善的关注,最后发展到把对关怀反省性的理解作为解决人际关系冲突的最有力的指导。流产研究证明妇女在建构道德领域时,责任与关怀概念的重要意义,在她们的思考过程中,自我概念与道德概念的紧密联系,以及最终对于一种扩展了的发展理论的需要,这种理论在思考中应包括而不是排斥妇女的不同声音,这种包括似乎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仅是为了解释妇女的发展,而且也为了理解两性成年道德概念的特点和先兆。

第四章 危机与转折

在影片《野草莓》中，老博格怀有身孕的儿媳妇玛丽安同他一起去伦德旅行，他到那里去接受医学领域的最高荣誉。她将返回来结束自己的婚姻，因为她的丈夫伊瓦艾德强调，她必须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作出选择。抱着改变伊瓦艾德决定的希望，她来求助他的父亲，因此她被“某种愚蠢的想法”驱使，相信这位老医生会调解这种分离。然而，她发现在他那“儒雅和友善的风度背后暗竖着”一面同样“不可摧毁”的墙壁，他包容了自己儿子的反对意见，对他人缺乏考虑，并且拒绝倾听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人的意见。正像伊瓦艾德宣布已经作出很明确的决定不想要孩子，理由是没有“必要负起一种责任——迫使我活得比我希望的更长”一样，他的父

亲也不想插手玛丽安的婚姻纠纷,强调“我不管你们的事情”,不想“考虑这种精神上的痛苦”。然而,在汽车里老博格说出一种想法,即自己同伊瓦艾德是“极为相似的,我们有自己的原则……,我知道伊瓦艾德理解和尊重我”,当玛丽安回答说“这或许是真的,但他也恨你”时,他感到震惊。

影片以这个老人在原则上的退却,以及这位年轻妇女保持关系的努力开始。在博格的“邪恶而恐惧的梦”与玛丽安“在哪一方面必须依赖你是可怕的”的认识之间建立的联系把老人的失望与家庭关系的失败联系起来。埃里克森(1976)把伯格曼的电影作为自己解释生活的教材,把玛丽安作为参与到导致变化的危机中来的代表。他把玛丽安同科堤利亚进行比较,把老人的失望表现出来,通过揭示这种正在出现混乱的、但表面上仍旧正常的关系,使他面对这种不舒服的处境。埃里克森说明,这种正视如何搅乱了记忆和梦的次序,通过这件事博格从生命阶段的发展方面退步,获得一种亲密感,他在这里曾经失败过。他梦到一次讯问,在这次讯问中,他忘记了“医生的首要职责就是请求宽恕”,他不能说出一个妇女是死是活。检察官说他有“犯罪的内疚”,宣判为“当然是孤独的”。因此,通过把今昔联系起来,博格越发认识到自己的失败(我已经死了,尽管我还活着),但他在这样做时却释放了自己的未来,回过头来为玛丽安提供帮助。

埃里克森把玛丽安的角色限定在打破对周期的重复,这个周期在几代人之间延续着“比死亡本身还可怕的”冷酷的孤独,他在这个“直率、目光敏锐、娴静而独立的姑娘那里”发现了“把关怀摆在首位的决心”。但是,在追溯自己视为成年人生活力量的关怀美德的发展中,他再次转向男人的生活。既然在生命周

期的理论中,像在电影中一样,玛丽安的故事仍旧没有展开,那么人们也无法弄清她是如何逐渐地看出自己所见到的东西,以及如何认识自己所认识的东西。

在对流产决定的研究中,妇女面对与玛丽安相似的困境,对她们描述的分析揭示出一个理解责任和关系的次序。这个通过比较在流产选择上的不同观点而来的次序,在逻辑上由通过分析妇女思考中表露出来的这些观点之间的冲突来建构。但是,尽管通过比较分析能够看出差别,顺着逻辑思考能够描述出进步,但发展只能够通过时间来追溯。因此,通过对妇女生活直接的长期观察,人们有可能初步地检验出理论预言的变化是否与实际发生的变化符合。在把作出流产决定时的访谈与次年底的访谈加以比较时,我使用了把危机放大的方法以便揭示发展的转折过程,描述变化的方式。在这样做时,我借鉴了皮亚杰(1968)把冲突看成发展预兆的成果,也使用了埃里克森(1964)的研究,他在通过危机描述发展时,证明一种扩大了脆弱如何意味着一种潜力的出现,这一潜力创造了一个危险的发展机会,“一个更好或更糟的转折点”(139)。

我们联系 23 位妇女参加进一步的研究,有 21 位同意参加。访谈形式类似于作出流产选择的时候。尽管对流产决定的讨论是回顾性的,但所提出的问题却是相同的,它们涉及到选择,对自己生活以及自我的看法。我们以生活状况为标准测量这一年中发生的变化和变化方向,同时也根据妇女对自己的关系、工作以及感情生活的描述。有 8 位妇女的生活得到了改善,9 人保持原样,4 人变得更差了(Belenky, 1978; Gilligan and Belenky, 1980)。

这一分析考虑的是那些由于怀孕导致危机和遭遇失败的妇

女。在变化过程中,这种遭遇的痛苦以及失败的体验突出了危机本身的重要意义,揭示出人们关系中的困境。正如怀孕意味着由责任而来的最大范围的联系一样,流产也造成一种困境,在这个困境中,并不存在着对自我和他人没有影响的行为方式。就构成独立的现实和选择变化的基础来说,流产的困境扩展了来自关系事实的责任和关怀问题。在通过暴露危机来追溯发展的过程中,弗洛伊德把压力下的心理比作一块水晶,它被扔到地上“没有碎成危险的碎片,而是按照纹路劈成碎片,它的边缘尽管是看不见的,但却是由水晶的结构预先决定的”(1933:59)。在把这个比喻扩展到考虑压力下的关系时,我注意到这样一种方式——关系的破裂揭示出它们联结的路线,这一联结展露出道德和自我概念联系上的心理结构。

研究妇女生活描述了危机在转折中的作用,为发展以及承认失败的可能性奠定基础。对贝蒂和萨拉的研究解释了在关怀伦理学发展中的这种转折。对这两位妇女生活的研究表明在时间次序上从关注生存到关注善的转变,从关注善到关注真的转变。这两项研究解释了危机打破周期重复的潜在可能,指明危机本身可能标志着重新获得一个已经失去的发展机会。在那些无法找到“为什么关怀”这一问题答案的妇女那里,这些转折的画面伴随着失望的描述和道德虚无主义的解释。

16岁的贝蒂走进流产诊所,要求六个月内的第二次流产。顾问考虑到她的重复性流产,拒绝了她那天的流产要求,并介绍她参加研究,以便为她提供一个对自己的决定进行思考,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进行思考的机会。尽管通过贝蒂的故事来解释是牵强的,因为她在生活中属于一种极端现象,她是一个有着重复性流产历史的、行为不良的、进过少年教养所的、被领养的青少年,

但这个故事还是解释了在一种似乎是极为特殊的生活中发生变化的潜能。它也描述出标志着从“自私”到责任转折的从关注生存到关注善的转变。

在第一次访谈中,贝蒂一开始就强调,第二次怀孕像第一次一样不是她的错。感到在采取避孕手段上的孤立无援和无能为力,因为她没有钱而且相信她需要父母的允许,她也感到无力去对付男朋友的不断骚扰。最后她对他的保证作出让步,他保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不会使她怀孕,她也受到自己信念的影响,如果自己采取拒绝态度,他将断绝与自己的关系。既然她已经向男朋友和母亲请求避孕帮助而没有成功,贝蒂解释说,她的怀孕是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提供帮助。她现在仍希望自己采取了避孕手段,但她把自己没有这样做的责任归咎于他人,她说,当她刚发现怀孕时,自己不知道做什么:

“我想杀了自己,因为我不能面对这个事实。我知道自己去流产。我知道自己不能有孩子,但是我无法面对再次流产的事实。”

她提到上一次经历的肉体痛苦。

她不情愿与男朋友绝交的原因是,他待她的方式不同于以前认识的人:“他为我做一切事情。(什么样的事情?)给我打电话,接送我,带我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如果我想要的话,给我买烟、买啤酒。”她也抱有如果同他上床,他也会继续满足自己需要的期望,但当她发现“我同他上床之后,他刚好让我也去做他想做的一切事情,同女朋友相比,我更像一个妻子,我不喜欢这样”时,她感到极大的失望。她把这种关系描述成一种交换关系,并得出结论说,“他实际上只顾及一个方面”,他仅仅追求自己需要的满足而无视于“我想要更多自由的事实”。她也对顾问干预自

己的流产意愿表示气恼,不过她还是认识到顾问“想要确定的是,如果我离开这里,我的想法是否保持不变。我认为这是好事,因为至少他们是关心我的。”

或许一部分是由于关心的表示,贝蒂开始思考她曾经以什么方式来照顾自己。看到或许怀孕是自己的错误,她把这归咎于没有倾听自己的声音。她之所以听信别人是因为她想“摆脱某种事情,或者使事情变好,以及他们不再烦我”。但是,既然这些理由总是与自己的体验不相吻合,她开始反省这个从前指导自己行为和思考的假设。她仅仅根据身体上的痛苦来考虑流产,希望对怀孕的情况保守秘密以免得到一个“坏名声”,她关心保持自己的自由而不是必须为其他人做些什么,所有这些都表明她唯一关注的是自己的需要,以及为了确保自己在一个被看成是剥削的、威胁的、自我体验到没有人关心和孤独的世界中为了生存而斗争。对社会现实的这种建构形象地体现在她对海因茨偷药的判断中:

“在药剂师被盗和海因茨的妻子将死去的情况下,这个药剂师应该被盗。**(做这件事是正当的吗?)**或许是吧。我认为人们在生活中首先要为生存奋斗。我想它是最重要的,比偷盗更重要。偷盗可能是不正当的,但是,如果你不得不这样做以便保存自己,或者甚至去杀人,那你也应该这样。**(为什么这样?)**我认为自我保存是最重要的。它在生活中要摆在其他东西的前面。许多人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性是最重要的,但我认为自我保存才是最重要的。”

在描述人们的关系时,贝蒂对生存不顾一切的关注反映出她作为一个被领养的孩子的人生体验,以及由此她对自己的生存似乎处于十分危险境地的体验。当贝蒂流产决定关注的中心

从她本人需要转到孩子需要时,她在生存方面的不安全感也表现出来。这种转变是以道德语言的出现来标明的,这时她说出“在类似于我的情况下流产是要做的**正当的事情**,如果有人还在上学,如果他们像我一样必须回到学校”。她对自己需要的考虑从某种不同的,被看作义务的视角转到父母让她回到学校去,这进而导致把道德关切从自己扩展到孩子:“要孩子对我是不公正的,对孩子比对我还不公正。”

她上一次怀孕是在搭车旅行过程中被强暴导致的,当时她“一想到孩子便无法忍受”,但这一次她已经“为孩子想了很多”。她对公正概念的使用表明她的关心所具有的道德性质,这产生于她对孩子与自己之间关系的认识:

“想起孩子我就产生某种奇怪的感觉,因为我是领养的,我现在所想的同我母亲不打算要我是一样的,否则她就不会让人领养我。但我正在考虑的是如果我做了流产,或者可能打算去做,或者采取什么方法,这些给我各种奇怪的感觉。”

在把自己对孩子的感觉与自己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想要孩子的感觉联系起来时,贝蒂抚今追昔地开始考虑自己从生理上对做母亲的感觉,希望人们或许这样看待自己——孩子的母亲“的确喜爱这个小家伙,但却不能照顾他。”

但是,当她跨越辈分来变化视角时,贝蒂也想到未来,并想象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有能力照顾孩子的母亲。借助公平的概念,她表达了给予孩子自己想给予东西的愿望:“我认为如果一个孩子不能有自己的母亲,给他以生命就是不公平的。”在为这个孩子着想时,她也越发地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自己,并通过怀孕的联系认识到,关心孩子就意味着照顾自己:

“这次怀孕在许多方面帮助了我,因为我已经不再登高和喝

酒,这在近三年里是第一次。现在我已经这样做了,我知道自己能够这样做,我会把它完全地戒掉。(怀孕如何帮助你做到这些呢?)因为当我第一次怀孕时,我不肯定自己将要做什么,当我刚发现这次怀孕时,我是这样想的,‘这次是我的错,我必须保住这个孩子。’因而我不再喝酒和登高,因为我不想伤害这个孩子。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后,我又想到这个孩子,我说道:‘不,我不能要它,因为我必须回到学校。’”

正像贝蒂出于不想伤害孩子而开始关心自己一样,她必须回到学校的愿望一方面也出于“这样的考虑:有了孩子,自己无法受教育,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技能。”当她认识到没有任何生活手段就不能照顾好孩子,并且相信在怀孕没有确定之前自己所服用的药物已经伤害到孩子时,贝蒂明白了在能够照顾孩子之前必须先照顾自己的需要:“我猜想我必须开始更好地照顾自己。一个人迟早必须打定主意开始照顾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人,而不是让别人告诉你做什么。”

在一年后的进一步访谈中,自我中心的语言已经消失,最初在贝蒂谈论自己和孩子时明显表现出来的关系和关怀语言现在扩展到谈论她自己的生活。从关心生存到关心善的转变标志着她的思考从自私到责任的转折,这一转变与这一年来的调解过程中贝蒂生活中出现的变化相吻合。

回想起流产之后的那段日子,贝蒂描述了一个失望的时期,描述了自己放弃了一个自负的家伙之后的悲观和失落感:整天呆在家里看电视,与母亲争吵,体重也在增加:“我当时是迄今为止体重最重的时期,我非常消沉。我整个冬天都呆在家里。我从不出家门,我特别没脸见人。”但在六月里却发生了变化:

“我认为自己必须减肥,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改变,因为多年

来我一直很胖。我从不知道穿上瘦人能够穿的,看起来好看的衣服是个什么样子。我感到了不同反响的效果,因为许多人,许多小伙子都想同我一起出去。那是我第一个能够穿上泳装的夏天。”

如果怀孕继续下去,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也会出现在孩子出生之后。其他妇女的生活证明这这也是一个有意义的日子,标志着危机的结束以及向更好或更糟的方向发展。在那些流产决定标志着开始发展进步——即对责任有了新的设想,开始面对真理的妇女当中,这种倾向是结束消沉的时期,似乎怀孕期间代表着一个自然的、令人沮丧的时期,它的结束导致随后的改善妇女生活的行为。而对于那些用她们自己的话说,选择代表着一种退却的妇女来说,这是一个一切都分崩离析的时期。

对贝蒂来说这种进步是明显的。在家庭、学校里以及社会上经历数年麻烦之后,在第二次访谈时,她去注册了另一所学校,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并且积极参加学校的社会活动。她与男朋友也有了稳定的关系,这听起来完全不像是她以前描述的关系,因为相互关心和相互爱慕已经代替了强迫的和相互利用的交易。在学校的鼓励下,贝蒂准备第二年秋天进入社会大学。

从贝蒂对海因茨困境的反应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她在道德理解上的变化。她现在认为,海因茨应该偷药,“因为他的妻子即将死去,他爱自己的妻子。”尽管她解释说,她对选择本身的回答“同从前一样”,但她的判断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与她以前所表明生存第一的看法相反,现在她强调关系的意义。在从前她讲到权利的地方,现在谈到内疚。海因茨应该偷盗,“因为他爱自己的妻子,如果她死去,他将感到自己能够做某种事情但却没有做。”她从前把安全看成一种在一个人人偷盗、充

满剥削的世界里的自我保存,现在她则把它视为取决于与他人的关系,取决于爱和关怀的表示。

贝蒂在道德判断上的变化与她在自我观上的变化正相吻合。在第一次访谈中,她把自己描述成“那种难以相处的人”,任性、冲动、“容易被诱惑”;在第二次访谈中,她说,“我想我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我喜欢学习。我喜欢有趣的东西。我喜欢同人交谈。我非常敏感。”当被问到她看待自己的方式是否也发生变化时,她回答说:“的确如此,现在我真的关怀自己,当时我并不真心关怀。我曾对一切都非常厌恶。现在我开始有了较好的态度,我感到自己能够改变以前自认为绝对不能改变的许多东西。”她不再感到无能为力、被人利用、以及孤独和处在危险之中,贝蒂感到更能够把握自己。一年里,各种事情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她相信自己能够“创造生活。”

正像道德世界已经取代每个人都偷盗的世界一样,这个互惠的世界也成就了从前令人失望的“单方面”关系。尽管贝蒂把怀孕那段时期说成一段艰难的时期,但她认为这有可能“从艰难中得到更好的锻炼,因为当时情况摆在那里。你的确能学到东西。你的境遇粘着你,你刚好碰到了这种事。”

因此,在贝蒂的生活中,第二次怀孕带给她以往的冲突,暴露出现实中的矛盾。非常关心采取何种流产方式的流产顾问的介入,为贝蒂提供一个思考和反省的机会,并且引发了一个治疗上的危机,参与到发展的转折中来。在第一次与第二次访谈间隔的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发展的过程是由一个沮丧的、无序的以及失望的时期来标志的。

在这年年底的第二次访谈中,贝蒂表明了对自己往事的一种重新理解,以一种新的方式对未来进行思考。以往的冲突通

过一种方式被重新修正,这种方式允许她强调目前自己在青春期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允许她明确地把自己看作在与家人、与男朋友、与学校关系中的一个负责任的人。尽管第二次怀孕重演了过去,表明了行为的重复,但是它也展望了未来,使贝蒂面对责任和关怀问题,这对于她的发展至关重要。

R.科尔斯(Robert Coles, 1964)观察到,当危机为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面对困境的机会时,它们就能够导致发展。为了说明这个观点,他描述了一个贫穷的黑人青少年约翰,他的父母表现出“严重的精神紊乱”症状。但是,在自愿参加亚特兰大的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活动中,在不寻常的压力之下,约翰开始发展进步。当科尔斯问他什么使他能够做出这种选择时,他回答说:“学校同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它使我比自己曾经想象的更为强壮,所以现在我认为我将不能忘记发生了什么。我或许在今后的生活中不一样了”(122)。

通过遇到压力而导致发展的观点,以及冲突提供发展机会的观点是科尔斯分析的核心问题。在不同压力的情况下,贝蒂提供了相似的例证。在把自己的今昔进行对比时,她说道:

“我的确满意自己目前的生活处境。同去年相比,它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而且变得更好。我对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感觉更好了。我早晨起来去学校。过去的一年半里,我只是坐在那里无所事事。我不知道生活将走向何方。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现在我感到生活有了某种方向,我认识到了自己感兴趣的東西。”

伴随着危机的结局,贝蒂把自己牢牢地系在生活之中,把自己看成一个有生活目标的、在关怀他人和自我方面负责的人。

17岁的乔赛尔的思考也表明从自私到责任转变,她报告了自

己在选择流产之后生活中发生的类似变化。在第二次访谈前,她也“改变了许多,因为我正在用许多药品和所有东西,我在与父母、法院的关系上,以及药品的来源上遇到许多问题,这像是那种我要经历的阶段,当我回头看去时,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渡过了这一阶段。我像是从中发展而来。我有时仍旧遇到问题,但是这与以往不同了,我不再用药品了”。她也回到学校,与老师合著了一本关于青少年的书。但是,她对流产决定回顾性的描述预示了第二种视角的问题。在第一次访谈中,她坚持流产的决定,并把它看成是与“自私的”选择相反的“负责任的”决定,看成一个越发地变得“在决定的现实性以及照顾自己方面更为成熟”的决定。在第二次访谈中,她说自己是“被迫做流产”,她“没有任何选择”。在像贝蒂一样报告流产后的一段消沉时期,以及生活有了巨大改善的经历时,她被困在这两种知觉之间:流产是一个负责的决定和传统上把流产解释为自私的选择之间。

她说道,自己反对流产,但随后又把这个陈述批评为“虚伪的”,也批评了那些把流产“说成是谋杀,但又从未怀过孕,从未处在没有任何人提供帮助,没有任何钱的处境下”的人们。她也解释说,如果她有了孩子,“今后的六年中自己就要靠吃福利生活,而且孩子没有父亲,”然而,她并不“知道这是否合乎情理”。同样,她也不知道由谁来作出决定。“我想一年前,我可能说,这是我自己的决定和事情,我在某一方面认为它是我的决定,但是现在我不知道。”现在她把自己看成是有道德的和负责任的,乔赛并不想成为自私的和邪恶的。在第二次访谈中,贝蒂说道,“在思考流产时,我不知道去想什么,流产是什么,”像她一样,乔赛也不知道流产是否为一个自私的或者是负责的选择。如同这一转折观产生了第二种观点的二分法一样,乔赛不能确定是否

流产“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或者它是否“合乎情理”。

25岁的活泼动人的萨拉在第一次访谈时表现得聪明幽默，但在描述自己的挫折体验时也表现出伤心。在与同一个男人再次怀孕以及面临第二次流产时，她认清了这种无望的关系。既然在他离她而去时，她发现了第一次怀孕，她认为流产“几乎是一种快乐的体验，就像从我的生活中赶走了那个男人一样”。然而，这一次的“现实情况是这个孩子像垃圾似地抛在我的头上”。她面对的危机是男朋友作出的声明：如果她想要孩子，他就要离开她，除非她打掉这个孩子。

在认清没有情感和经济支持，自己没有办法抚养孩子之后，萨拉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她陷入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她自认为是个负责任的、有道德的人，另一方面她又相信第二次流产是“不负责任”和“自私的”。然而，她的想法也由于这一事实变得复杂起来，即似乎“要做的负责任的事情”——要以孩子来弥补一个人的过错——突然间也好像是“自私的”——即把一个孩子带入这个世界“为的是减轻自己的罪过”。在这些矛盾明显存在的情况下，她无法找到一种理想的或者是自我牺牲的解决办法，因为无论在这两条路中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她都可以把自己的行为解释成不仅是为了他人，而且也为了自己。

但是，在面对由于自己恋人拒绝这个孩子带来的选择时，萨拉注意到她本人也被拒绝了，认识到她的自我牺牲维持了一种不能保留孩子的关系，她改变了对自己处境的想法，把怀孕不仅看成一次失败，也看成是面对着真理：

“这是一种把我与这位父亲关系中的一切都暴露出来的紧张状态，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受着煎熬，所能有的只是不确定的理由，现在，它全都呈现出来，你不再能把问题隐藏起来。

所以你可能说它成为一段非常幸运的时期。对不起。”

因为怀孕已经表明这种关系不能再存在下去,萨拉才把它看作一件好事,看作一种变化的先兆;但是,既然它也带来一个能够存活的孩子,它也是一件令人后悔的事情。对萨拉来说,对结束这种生活负责也意味着对自己负责,在道德思考中把自己包括进来,面对自己关系的现实。在这样做时,她对自己从前的自我观产生疑问,以前她把自己看成事情中的一个善良的牺牲者,在受难于其他人不负责任行为的后果时履行了自己的责任。现在这种观点与这样的认识发生了抵触,即她认识到自己具有的力量比想象的要大,事实上自己“明确地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对萨拉来说,正视这种令人失望的关系方式不仅意味着清理了以往遗留下来的东西,即她父母的离异,以及把母亲想象为无休止的自己牺牲和引诱犯罪,而且在现实中也面临着判断问题,自己的生活也将按照这种判断标准来指导和权衡。在强调自己“讨厌总是服从他人标准”时,她借用了自己已经加入其中的教友派的传统,主张“没有人能把任何事情强加到你头上,因为你首要的责任是倾听自己的内在声音讲出什么是正当的”。因此,当内在声音取代外在声音作为道德以及真理的裁决者时,她从其他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同时也把判断和选择的责任留给自己。

最终的选择是流产:“你如何能够对剥夺一条生命承担起责任?”但是,你又如何能够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过”而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对萨拉来说,“转折点”来自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不伤害他人和自我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没有什么选择是“正当的”。在看到没有不包括冲突的选择,没有什么行为途径不排除他人之后,她在这种紧张的困境中发现自己先前思

维方式的局限性。因此,萨拉重新考虑自私与责任之间的对立,认识到这种对立没有代表自己与孩子之间联系的真理。在得出结论说没有一个要排除什么人的现成公式,以及看到把自己包括进来的必要性之后,她作出决定,在自己目前的状况下,流产是较好的选择,同时也认识到,如果情况不同,那么选择或许也应该是不同的。

尽管萨拉在危机中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面对自己和生活,这种观点的实现也是一条困难的道路。由于她希望结婚和有孩子,她留恋这次怀孕;因而它的结束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损失。萨拉生动地描述了这一令人沮丧的过程,她在六个月的月底打电话说,因为她将离开这座城市,或许我愿意以后再访谈她。结果萨拉第二次流产接近于怀孕的最后期限,如果过了这个期限怀孕将延续下去,其他妇女也报告说,这段时间是混乱的和苦恼的时期。

当萨拉第二次来访谈时,她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了,看起来憔悴、恐惧和屈从,一点也不见了从前的活泼。她说,这一直是一段难过的和损失惨重的时期。流产后她患上一连串的疾病,她把这归咎于与男朋友绝交,失去了工作,搬了几次家的“全面性激变”所带来的紧张。然而,她在苦恼之中,仍然继续思考真理问题,澄清了造成危机的事件,最终正视了自己:

“我认为怀孕几乎是一个蓄意的决定。我对孩子想了许多,偶尔也做过一两次梦。这是我的确想要的东西。当我做爱时,我脑海里闪过过‘好家伙,要是怀孕就好了’,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因此,这的确是一次有目的的意外。它甚至并不遥远。它几乎确实是有目的的。”

萨拉认识到,自己的目的是在已经知道结果将会怎样的情

况下,迫使关系中的问题暴露出来,同时她也认识到自己正在掩盖真理和自我“欺骗”:

“怀孕的确使所有问题暴露出来。如果我没有怀孕,我可能会选择另一种解决,因为关系中的所有错事都是那么明显,甚至使我不能再愚弄自己。这几年我已经为他仁至义尽了。怀孕也服务于这个目的。然而,另一方面,我的确想怀孕,这并不是为了达到任何目的——或者是进一步促进这种关系,或者是完全断绝这种关系,而是因为我真的想要一个孩子,而且现在仍旧这样想。”

结果,“我现在确实感到失去了许多。”

在第一次访谈中,她把自己描述成“劳累的”和“受挫折的”,试图以“努力工作”来“忍耐”,以及以一种只能导致失败的美德间接地让其他人对自己的需要作出反应:“现在情况不同了。这种局面不能继续下去了,我已经重复性地犯了几次同样的错误,我认为这足够了。”在第二次访谈中,萨拉描述的自我已经最终崩溃了。

(你如何对自己描述自己?)“我不知道。我想说我正在总结过去。我感到一切都被毁掉了,在上一次打击之后,我正在绝望地挣扎以使自己恢复过来。尽管同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相比,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至少是身体上的,可我还是决定(离开这个城市)。当我开始收拾东西时,我想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当你离开去某地时,你认为重要的东西是带着你的身体,当然还有你的所有物去其他什么地方,但我似乎总是感到我的所有物在重量上超过了我自己,因为所有那些东西都留给了我。我确实感到被打倒了、失败了,我感到很累。似乎对于我正在装在皮箱里的实际物品比对于我更有意义。我想,‘你装入自己生活中的

废物要比装入你自己体内的东西更为丰富’。”

因此萨拉表达出以某种方式失去了的感觉，留下了不能拼凑的碎片，一个身体和装满物品的皮箱，以及她先前自我的残余。再回头看看流产，她发现这也超出自己的理解，她不再能够找到一条把流产所唤起的思想和情感包括进来的道路：

“因为作为一名妇女和孕妇，有某种东西是你不能否定，不能解释清楚的。这个世界里任何东西都具有最充分的理由，我肯定我做的是正确的事。可它对那个可怜的孩子和对我自己都是地狱。但是，我不知道是否你能够理解我的认识，因为我自己都不能理解自己正在认识的东西。这个理由并不足以概括全部。当我把它们分开时，不知什么缘故全体总是大于各部分的总和。当我把它们放在一起时，出现了在我把它们分开，并且试图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时并不存在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在试图发现已经分离开的全部事情时，萨拉阐明了在新旧方式之间转折的时机。当她的体验不再能够适合自己的理解，不“知道”带来这种孤寂的东西“是什么”时，她在危机中已经达到她所感觉到的全部就是失落这一点。这种失落和令人沮丧的感觉保留到第二次访谈中。她在评论中表示，当她想离开这座城市时，产生了“一种我把孩子留在这里的感觉”。这种失落也体现在这种感觉中，“我已经寄托错了某种东西，进而我也意识到‘你已经穿过这个城市留下了你的孩子’”，同时也体现在这种信念中，“如果有一天我有三个孩子，我也会感到我有这三个和另外两个不在身边的孩子。我有五个孩子，这里是他们其中的三个。”

对萨拉来说，记忆的意义不是去重复历史，因为她把第二次

流产归咎于自己没有吸取第一次的教训。她感到“真的伤心”和“控制不住”，她“让球转了起来，现在我站在球上，整个夏天都一直在极度地发疯”，这是“我个人天翻地覆的时期”，一个崩溃的、令人沮丧的，危机的和痛苦的时期，然而，在她看来这也是一个变化的时期。

流产一年后，萨拉又回到了这个城市，前来进行第三次访谈，说明了变化并把它描绘成“一种可见的东西——就像是转了一个圆圈，我又转回到整个旅途的出发点。”她的这一行程大约始于12岁，那时她开始把自己同家庭分开：

“我的童年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童年。我记得当时有意地作出了一个决定，大约12岁左右。我突然间把自己同家庭分开，突然间特别意识到我所喜欢的东西，以及我认为全都是正确的，但在我家里却没有人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我将不会走母亲为我设计的路，按照这条路去走，整个生活的结局就会像她对我的期望那样。因此，我必须做的就是保持和平，直到我离开这里，这就是那种严格地服从命令，但并不真心服从命令，这就是我所做的。”

父母离异后家庭的变化令萨拉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复杂化了，遗留下来与青春期主题相互缠绕的问题，提出认同问题以及她那时就开始着手自己解决的道德问题。在“厌倦许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后”，她试图去发现生活的价值：

“我想表面上扔掉所有我一直被教导的道德价值，自己决定对我来说什么是重要的。我想如果我失去了什么东西，我就会知道什么是有意义的，如果我把它扔到窗外说，‘见鬼去吧’，接下来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真正感到苦恼，因为它在我的生活中已经不存在了。我也就因此知道这种东西对我的意义。因此，

这像是把什么东西扔出去,然后我又有选择地拣回了我想要的。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我已经又转了回来,并不是按照母亲已经给我的那种生活方式,但要比我想象的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当我回过头来时,它是那么的有趣,我想,‘嘿,我从未想到我走上了这样一条路’。”

在具有了更多的自信并且清楚了自己对内在声音的发现之后,萨拉说道,她的决定从前是“基于什么地方,我确实无法肯定在哪里,但它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来的”。相比之下,她现在感到,“这的确与我有内在的联系,这确实很好。我不知不觉地感到自己强壮了,着实地把握住自己的生活,而不是随它而去了。”正像萨拉描述的那种把握住生活的感觉一样,她使用的代词也从“它”变为了“我”,这是漂泊期结束的标志。萨拉在第一次访谈时已经批评了自私与责任之间的对立。当她意识到本人参与了使自己失败的事情,以及她间接地寻求反应的事实时,她把流产决定看作一种包括了自己的选择,在考虑中没有排除自己,在确定做什么最有利时,不仅考虑到他人的需要,而且也考虑到自己的需要。

但是,这种见解同萨拉生活的结合,通过危机导致的转折实现却包括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这一过程差不多持续了一年的时间。通过这般体验,她有了更多的反省:“我看清了自己正在走的这条路,看出了作出选择的方式,以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她现在正致力于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有关工作和关系的“令人吃惊的古训”的“坚实基础”上。认为“你自己造成了这种危机,因此你必须自己来处理”,她把自己的发展想象为从一个圆圈变成了一个螺旋,因为成为一个圆圈暗示着“在同一个地方发展”,而一个螺旋则“取代了在同一个地方发展,尽管你仍处在

同一个位置上,但在其他别的地方已经有所提高。你已经进步了,我想要的正是这一结果。”

萨拉在生活中以及对自我感觉上的变化也同她在道德判断上的变化一致,后者从消极转变为积极,从“决定谁将失去最少,谁将受伤害最少”转变为一种“同情”——关怀和尊重自己以及他人的需要。先前她把道德等同于“法律的束缚”,同时也以“愚蠢”为由拒绝了法律。现在她提出一个判断法律的标准,其根据在于它是否有害于社会,是否在同情和尊重方面“建立起障碍”。当她的判断从“正当”是由他人来定义的,责任针对他人的习俗方式转变为包括对自己负责的反省性方式时,她的行为也从分离和反叛转变为承诺工作和关系的态度。

像贝蒂一样,萨拉也说明了在危机中发展转折的潜力,证明承认失败如何标志着对一种新方式的发现。但是,危机的转折点也包括虚无主义和消沉的潜在可能。萨拉通过上升的、螺旋式变化来比喻发展和进步,以至于她最后能够逐渐地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同一个事物,这种比喻与安妮对失败的比喻形成对比,安妮感觉到在“走圆圈”,并且失去了“我所拥有的自信”。这个比喻出现在与安妮的第二次访谈中,这位妇女解释了第一次转折的困境,把自己的感觉表达为“重新得到我以前拥有的某种东西,而没有想到什么新东西”。在进行咨询的一年里,她已经把自己的生活看得一塌糊涂。在断绝关系和辍学之后,安妮感到自己已经失去“干得出色”的能力。

15岁的利萨也表达出这种失望的感觉,她相信男朋友爱她,对自己“不要谋杀他的孩子”的想法表示赞同。然而,当她决定不去流产后,他离开了她,因此也“摧毁了我的生活”。利萨在家里孤独地照顾孩子,依靠生活补助过活,父亲宣布同她脱离关

系,男朋友把她抛弃,她已经变得不能认识自己了:

“我同一年半以前相比判若两人。那时我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我现在已经不再是我自己了。现在我感到失去了所有朋友,因为我成了别的什么人。我不是我了。我并不喜欢我自己,我不知道是否其他人也是如此。我不喜欢自己目前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为什么这样不幸福的原因。在我有孩子之前,我是自由的,而且有许多朋友。我对那种生活感兴趣,我是幸福的。我享受到许多东西,现在完全不同了。我是孤独的,也很寂寞,我不再像自己过去的样子,我已经完全变了。”

以前她把自己描述为“友好的”,但现在她把自己说成是“令人迷惑的”,因为“男朋友离开后我不知道去做什么。我仍旧爱着他,不管他做了什么,这的确是令人迷惑的,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是这样”。她在失望中徘徊,找不到回学校的办法,不能上学,也就没有办法维持自己和孩子的生活,“一切都乱七八糟,因为我无法忘掉他,”她不明白一种爱的行为怎么能够导致这般的孤独和失落。

S·托尔斯泰(Sophie Tolstoy, 1865/1928)在建立联系的过程中,得出了一个似乎是合乎逻辑的结论:

“人们一直告诉我说,妇女必须爱自己的丈夫,被人尊敬和做一个贤妻良母。他们在启蒙书中写下了这些东西,这全都是一派胡言。要做的事情‘不’是去爱,聪颖羞涩,把一个人所有的缺点隐藏起来——似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错误!重要的东西不是去爱。看看爱他如此之深我都做了什么!这是痛苦的和令人羞愧的;但是他认为这仅仅是愚蠢……我只不过是……一个无用的病吟着的生物,一个大肚皮,两颗腐烂的牙齿,一副坏脾气,一身落破的尊严,一种没有人想要的和几乎逼

得自己发疯的爱。”

道德虚无主义也是那些寻求通过流产斩断自己的情丝和不去关怀的妇女得出的结论。在把道德意识的语言翻译成人们关系的日常用语时,这些妇女自问:在由强者来断绝关系的世界里“为什么要关怀?”当她们怀孕并且希望在一个扩大了的家庭联系圈中生活时,她们遇到了自己丈夫或者情人的断然否定和拒绝。在把自己的关怀解释为脆弱,看出男人的优势地位之后,她们得出结论说,强者是不需要道德的,只有弱者才操心关系。按照这个结论,流产对妇女便成了一种力量的检验。

在达成这种认识的妇女生活中,道德虚无主义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但她们的共同问题是被他人抛弃了,她们的共同反应是抛弃自己。在一位身为学生的妇女那里也表现出拉斯克涅克夫(Raskolnikov)的意象,她在孩子出生后一直病着,独自生活在一间小房子里。她把流产说成一种谋杀的行为,但也是一种自己并不悔恨的行为,她在第二次访谈时说道,“有许多杀人的方法,我看到了比死亡本身还残酷的事情。在她怀孕时,她的恋人对她说不,她不能“指望他”。她自己则认为流产是一个“自私的选择”。她无法说清是谁作出了这个决定,因为在第一次访谈时她说自己将去做流产,她曾强调说,“唯一能使我改变主意的事情是出了什么事和我们结合在一起。”

因此,她把所发生的事情并不看成是“我的错”。把流产描述成“把我同自己感到需要的东西,感到强烈需要的东西割裂开来,”她坚持自己对结果负责,但不对选择负责。这就意味着她坚持自己对“在我必须作出这个决定时,不得而被牺牲的那个人负责”。然而,在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容忍了流产的人”以及自己的世界“已经变得小多了”时,她不能“肯定是否一个人要付出这

种代价”。她宁愿“去说我做了自己做过的事,也不愿意说有许多杀人方式。如果我不杀人,也不意味着什么,一切都是那么一回事,没有什么是真的,你也就没有任何责任感”。在把自己说成是按照他人命令来行为的过程中,仍旧不清楚的是,为什么自己作出这样的选择。她认为,自己坐在一条“错误的船上,其他的任何东西都绝对是发疯的。一个人又如何能把孩子带到这个可怕的世界呢?”当她注意到自己在对“其他人的责任”时,却忘记了对自己的责任。

还有另一种虚无主义的观点,一个已婚的妇女有了一个孩子之后再次怀孕,并做了流产,因为她丈夫说,如果她不这样做,他就要离开她。出于对他的责任,她“完全麻木”地执行了他的决定,进而又故伎重演,又一次怀孕并做了第二次流产。然而,这次怀孕之后,她最初决定要这个孩子,但是,当她丈夫再一次坚持自己的意见时,她发现上一次的自我背叛完全是不必要的。这种认识驱使她去做第二次流产,为的是结束这场婚姻,照顾好自己和一个4岁的孩子。

对这些妇女来说,道德的核心是关怀,但在没有得到他人关怀的情况下,她们也不能关怀孩子或者自己。这是一个责任问题,生活被看成取决于关系。在对那些对“个人权利”的强调胜过“责任问题”的人们进行批评时,一个妇女把流产的困境定义为卷入了情感的旋涡,因此要对强加在头上的“一种人们宣称的信念等级制”进行抵制:

“如果你从它们本身来看待,有时这种等级结构还是不错的,但是,当你试图把它们用于自己的决定时,它们就变得四分五裂了。无论怎样也无法组织它们作出现实生活的决定,而且也没有为责任留下足够的余地。”

道德虚无主义的观点意味着从关怀到关注生存,最终是自我保存观点的倒退。但是,在得不到关怀的生存努力中,这些妇女最终又回到关系的真理。一个学生在谈到自己努力“在我想做的事情上,在我能做的事情上,以及在自己如何感觉方面对自己更为诚实”时,也发现自己“依恋他人”的需要。在承认自己要比“已经认识到的自我有更丰富的情感或者从前留有余地”时,她努力去更多地“关怀”别人,并且也更多地关怀自己。因此,与排除他人、抛弃情感和抛弃关怀不同的是,她在与自己的关系上变得更为诚实,对自己也更加负责。

关于妇女对流产困境反应的研究结果提出了关怀伦理学的发展次序,在这里,责任概念的变化反映出在关系体验方面以及理解上的变化。这些发现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被收集起来,样本数量不大,这些妇女并没有被选择去代表更多的人。这些局限性妨碍了普遍概括的可能性,并留下进一步的研究任务——解决由于文化、时代、场合、性别而产生的不同变量问题。为了使所描述的次序准确合理,我们也有必要对妇女道德判断进行纵向研究。我们也需要通过研究人们对其他现实困境的思考来澄清这种流产选择的特点。

“危机暴露出性格”,一个妇女在研究自身的问题时说道。暴露性格的危机也是发展探讨的本质。妇女在思考关系和责任过程中所描述的变化也表明:责任和关怀能力是通过一个连贯的情感和思考次序来发展的。当妇女的生活与经历同她们的情感和思考交织在一起时,对个人生活的关注便逐渐地打上了“自私的”标记,并同生活关系中的“责任”对立起来。转而,按照习俗水平的解释,责任变得与对他人的反应——妨碍自我承认的反应混淆起来。但是,关系的真理性在对联系的重新发现中再

现,而且它也再现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即自我与他人是相互依赖的,不论生活本身的价值如何,它都只能通过关系中的关怀来维系。

第五章 妇女的权利与判断

1848年的夏天，E. C. 斯坦顿和 L. 莫特在纽约州的塞内卡福尔斯举行会议，讨论“社会、公民、宗教状况以及妇女权利”问题，她们提议通过了一个仿效独立宣言写成的《观点宣言》。问题是简单的，她们明确达成共识的是：妇女生而俱有各种自然权利，这些权利不能被男人剥夺。塞内卡福尔斯会议是由于斯坦顿、莫特连同其他女代表在 1840 年伦敦召开的世界反奴隶制会议上遭受排斥而引发的。出于对自己的代表被赶到楼厅去旁观会议的义愤，这些妇女于 1848 年开始在一个声称民主的国家里争取自己的公民权，而不仅仅是像她们八年前那样试图为他人争取权利。在把这个要求置于平等的前提下，以及运用社会契约和自然权利概念

的同时,塞内卡福尔斯宣言争辩说,对妇女不应以另眼相待,这仅仅是由于“这些不证自明的真理:所有的男女生来都是平等的;造物主赋予她们某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存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

但是,这种自身权利的要求从一开始就使妇女看上去与美德对立起来,M.沃斯通克拉夫特 1792 年就对这一对立提出挑战。她在《女权辩护》一书中争辩说,自由而不是被允许是“母亲的美德”,因为奴役不仅造成悲惨和失望,也带来犯罪和欺骗。她的这种胆敢“发挥我自己的理性”的“傲慢”,以及对“奴役我性别的错误概念”的挑战,随后得到斯坦顿有胆识的呼应,斯坦顿在一篇报告中提出“把它用大写字母写下来:**自我发展是比自我牺牲更高的职责**。最能阻止和妨碍妇女自我发展东西就是自我牺牲。”在抵制自私谴责的过程中(自私不仅在与上帝的关系中,而且在与男人的关系中被看成实现完美奉献,以及自我克制理想的女性美德阶梯上的首要罪恶),这些早期女权倡导者把自我牺牲和奴隶制等同起来,主张妇女像男人一样的发展将有助于增进普遍幸福。

在要求权利时,妇女也主张对自己负责,因此,在行使自己理性的过程中,她们也开始强调社会关系中的责任。这种理性的运用,以及妇女控制影响自身生活状况的企图在 19 世纪后半叶导致了各种社会改革运动,从禁酒和公共健康的社会净化运动到更为激进的自由恋爱和节育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与要求选举权联系起来,作为妇女,她们坚持自己的智力(尽管有程度上的不同)、性别都是人类自然的一部分,寻求通过投票在历史形成过程中包括自己的声音,寻求改变现行的,正在对现在以及未来的人们构成伤害的社会风气。尽管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由于

许多妇女没有投票,而另一些妇女在投票时只倾向于追随丈夫的意见而宣告失败,但事实上,20世纪还是目睹了早期女性主义者力争过的许多权利的合法化。

在妇女权利发生这些变化的情况下,产生了这些权利的影响问题,这是目前重新开始的女权斗争,以及由于女性主义者倡导妇女教育而出现的许多女子学院在百年庆典时提出的问题。在试图把妇女的自我发展同她们对理性的运用联系起来的过程中,早期女性主义者认为,如果妇女想把握自己的生活,教育对她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由于最近的平等权修正案辩论中重复了许多以往出现过的问题,所以在妇女发展问题上,自私的幽灵又在重新作祟,唯恐妇女的自由会导致她们在关系中放弃责任。因此公开的、以心理表达形式出现的权利与责任的对话都集中在考虑责任和关系时把妇女包括进来产生的冲突。当这些对话解释了针对妇女权利来说,妇女本身的一些较令人迷惑的问题时,也表明权利概念如何介入了妇女对于道德冲突以及选择的思考。

女权运动大体上以两本小说的发表作为跨世纪的标志,这两本书都是妇女写的,而且提出同样的道德困境:女主人公爱上了自己表妹露西的恋人。在她们平行的三角关系中,这些小说为考虑妇女权利对她们道德判断的影响提供一个历史的框架,也提供一条用来说明百年来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什么东西依旧如故的途径。

在G.艾略特的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中,麦琪“为人正派”。困于她对自己表妹露西的爱和对露西的未婚夫斯蒂芬“更强烈的感觉”,麦琪坚定地作出判断,“我没有必要,也不能以牺牲别人的幸福来建立自己的幸福。”当斯蒂芬说他们的爱

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使得“我们应该结婚是正当的”时,麦琪回答说,“当爱是自然的时候,真正的怜悯、忠诚和记忆也是自然的。”甚至在“已经太迟了不得不造成悲剧”之后,麦琪也拒绝“以其他人的痛苦来换取自己的利益”,选择了拒绝斯蒂芬,独自回到圣·奥格斯。

当牧师肯恩先生说道,“在结果的平衡中,她的行为原则是一种更为安全的指导”时,这个描述者的判断并不那么明确。G. 艾略特把她的女主人公置于不允许有效解决的困境之中,小说以麦琪的溺水身亡结束,然而,它却首先告诫读者,“显然,热情与责任之间变化着的关系不是男人能够把握的”。既然“我们生活的神秘复杂性”不能被“束缚在公式上”,道德判断也不能通过“普遍的准则”来注定,而必须“通过一种生活中活生生的、足以强烈到建立一种广泛的、所有人都具有的感觉来判定。”

然而,在这部对生活认真观察的小说中,麦琪最终露出一张“厌倦的和被打了的脸”,并不令人吃惊的是,追随 19 世纪的传统小说,面对 20 世纪女性主义问题的 M. 德莱布尔(Margaret Drabble)选择回到艾略特的故事里解释另一种解决的可能性。在《瀑布》(1969)一书里,她重新建立起麦琪在弗洛斯河磨房里的困境,但是正像题目所暗示的那样,社会困境的变化已经使情况不尽相同。德莱布尔的女主人公简并未恪守正派而是投入了露西丈夫的怀抱,拒绝脱离关系,而且是“在第一章中落水”,淹没在自我发现海洋里,“不管谁落下来,只要我能爬上岸”,当简试图去寻找自己生存的奇迹,找到一个方法讲述这个故事时,她也受困于判断问题。她对詹姆斯,也就是露西丈夫的爱是通过两种不同的声音来叙述的——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他们不停地为了判断和真理问题争吵,为承担和摆脱道德责任以及道德

选择问题争吵。

尽管激情与责任之间的平衡在 1860 年至 1969 年间已经发生变化,两本小说中的道德问题仍旧相同。横跨这个冲突的世纪,自私的判断仍旧困惑着两位女主人公。迫使麦琪脱离关系的同样谴责也回响在简对无助的哀叹以及原因的解释中,“我只想保护自己免受自私的谴责,对我的判断宽容一些,我认为自己并不像其他人说的那样,我痛苦和发疯,所以我不得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自私的谴责所暗示的行为与欲望的问题不仅使简运用逃避和伪装的策略,而且迫使她面对这个谴责得以存在的一个根本性的前提。剖析以往作出的道德判断,它似乎“在某种意义上说拒绝自己要好于拒绝他人”,简寻求以一种能够“接纳和包括自己”的途径来重新建构这一意义。因此她努力去建立“一个新的阶梯,一种新的美德”,它能够包括行为、性别和生存,而且并没有抛弃古老的责任和关怀美德:“如果我需要理解自己现在正在做什么,如果没有我自己的赞成,我就不能行为——我必须行为,我已经变化了,我不能再迟钝——我将创造一种宽恕自己的道德。尽管在这样做时,我所做的一切都冒着被谴责的风险。”

因此,这些小说证明了自私判断以及它蕴含的自我否定道德对妇女的持久影响力。这是在女性青春期小说中定期出现的作为支点的判断,而转折点在于把童真般的无懈可击同成年人的参与和选择责任分开的**自传体文学**(Bildungsroman)那里。妇女美德在于自我牺牲的看法已经使妇女发展的进程复杂化了,它把美德与成年人的责任和选择问题对立起来。此外,自我牺牲的伦理与权利概念直接抵触,而权利概念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一直支持着妇女对于公正地分享社会正义的主张。

但是,进一步的问题出现在权利道德——在支持个人权利要求时消除了“自然纽带”的道德——与责任道德——把这种要求编织到关系网中,通过表现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而模糊了自我与他人区别的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中。这个问题关系到沃斯通克拉夫特、斯坦顿、艾略特和德莱布尔。这种关注也在70年代对学院妇女的访谈中出现。所有这些妇女都谈到同样的冲突,所有人都揭示出妇女思考中自私判断的巨大力量。但是,在当代妇女描述的道德冲突中,这个判断集中于权利概念在妇女道德发展中的作用。这些冲突通过作为妇女道德关注核心的责任伦理(把自我置于关系世界里,并且产生关怀行为)出现的次数来表明它的持续性,同时也表明由于承认了权利探讨的公正性,这种伦理是如何发生变化的。

在大学生研究中,对一位高年级女生内恩的访谈表明了1973年女性道德关注的范围。这一年最高法院宣布流产的合法性,妇女有权选择是否继续怀孕。两年前内恩选修了道德和政治选择课程,因为她寻求“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感兴趣于“保护个人自由的争论”。在自称“痛苦于一种较低的自我意象”时,她报告了在高年级时对道德进步和发展的一种感觉,她把这种感觉归结为由于已经怀孕和决定流产的原因,她已经对“过去对自己的许多看法进行重新思考”。在把怀孕说成是“自我控制和决策方面的失误,而且是非常愚蠢的”时候,她认为流产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但却是救命的解决(“我强烈地感觉到,要想拯救自己就必须这样做”),但她还是把这看成一种道德罪恶,“即便我不这样看,至少在社会看来,这也是一种道德罪恶。”

在她“自我感觉是非常邪恶的”情况下,她发现“无论人们以什么方式对我进行帮助,都在我对他们和自己的感觉方面帮了

大忙”。在她等待和考虑流产的那个月里,她思考了“许多作出决定的问题,这是自己在生活中第一次想控制局面,并且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因此,她的自我意象发生了变化:

“因为现在你将把握自己的生活,你不再感到像是其他人手中的一个卒子。你必须接受你已经做了某种错事的事实,它也给你更多的正直,因为你总是不可避免地遇到这些事情。许多冲突被解决了,你也有了重新开始的感觉,这种感觉根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相信自己能够行动起来。”

因此,她“站出来从根本上支持自己,并不是作为一个善人或者恶人,而只是作为一个在任何方面都有许多东西要学习的人”。现在她认为自己有能力进行选择,以一种新的方式感觉到对自己的责任。但是,尽管选择的体验已经使内恩具有更为强烈的个人正直感,她作出的选择判断显然还是相同的。尽管她逐渐对自己有了一种更全面、更宽容的理解,有了她相信将允许自己“有更鲜明的自我和更多独立”的一种新的关系概念,但道德问题仍旧是一个责任问题。

这样,她在解释从前的不负责任时,把怀孕看做“对我逐渐进行的帮助”:

“它极为严肃地使我认清自身的问题,诸如我对自己的感觉,我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我感到,我所做的事情是那樣的错误,使我认清自己并没有在能够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承担起责任,而且我仍能够像以往那样继续逃避责任。因此,这个局面的严重性把问题刚好摆在你的面前。你对它们看得十分清楚,而且答案也垂手可得。”

当把自己的不负责任看成已经造成了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她无法找到一条不带来伤害的途径时,她开始在道德上“摆

脱陈腐的观点”，这种道德现在似乎对实现她将不给“人们造成伤害”的生活目标构成障碍。在这样做时，她提出自私与道德的对立问题，察觉出“自私这个词是棘手的”。在承认了“个人自由”并非“全都是与道德不能协调的东西”之后，她扩充了自己的道德概念，把它定义为“关心另一个人和关心自己的感觉”。然而，道德问题仍旧存在着，“你将带来多大的伤害？”以及“为什么你有权利给人们带来痛苦？”这些问题不仅适用于他人，而且也适用于自己。与自我牺牲分开的责任转而又同对痛苦原因的理解，同预言什么行为可能导致伤害的能力联系起来。

在道德责任范围内包括自己的权利，对于 70 年代的女大学生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产生于不同背景下的问题提出一个把自己包括进来的包括问题，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公正的逻辑，通过把自我与他人等同起来的公平才能够得到解决。。但是，它也提出了一个关系问题，它的解决需要对责任和关怀进行重新理解。27 岁的希拉里在解释自己道德思考上的变化时，描述了自己跨进大学校门时对道德的理解：

“当时我是一个思想非常简单的人。我经历了一个自认为对生活中的正当与不正当都有极为简单答案的时期。我甚至经历了一个现在看起来简单得令我吃惊的时期：我认为只要我不伤害任何人，一切都会相安无事。我很快就理解到，或者最终理解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你注定要伤害别人，他们也注定要伤害你，生活充满了紧张和冲突。人们注定会有意无意地彼此伤害感情，但这正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因此，我抛弃了以前的看法。”

这种抛弃发生在她进大学的第一年里：

“我与一个小伙子谈起了恋爱，他想安顿下来结婚，我不能想象一种比这更坏的命运，但我的确非常喜欢他。我们分手了，

他为此搞得心烦意乱竟离开学校一年,我感到自己已经极为严重地伤害了他,我并不是有意那样做,我已经违背了自己道德行为的第一原则,但是我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在解释自己“没有可能与他结婚时,”希拉里感到一方面对自己所面临的困境有一个“容易的答案”。然而,另一方面,在坚持自己反对伤害的道德命令时,这种处境也带来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即没有不造成伤害的行为路线。这种认识使她对自己从前认为绝对的道德命令提出疑问,也使她去“思考这个原则(不伤害)并不总是可行的”。她所发现的局限性直接关系到个人的正直问题;那个原则甚至并不试图达到“对你自己来说的正确东西”。在表明她已经开始更多地思考坚持自己的个人正直时,她认为这种体验使她得出结论,“你不必担心不伤害他人;尽管去做你认为是正当的事情。”

然而,由于她不断地把道德同关怀他人等同起来,并且一直相信“自我牺牲的行为,为他人服务的行为,或者出于仁慈善良的行为是善的行为”,她对不伤害他人原则的抛弃也就等于对道德关心的抛弃。在承认自己决定的正确性,并且意识到它的痛苦结局之后,她能够看到在关系中恪守关怀伦理学的同时,没有办法保持自己的正直。在寻求避免冲突,以“尽管去做你认为是正当的事情”来对选择作出让步时,她事实上也产生对自我让步的感觉。

这种感觉再现于她在律师工作中所面临的困境,当时,对方的辩护律师在审判中忽略了一份可以为自己的委托人“值得称赞的主张”提供有力支持的文件。在认真考虑过是否告诉自己的对手那份有助于他办案的文件时,希拉里认识到,这种敌对的公正制度不仅妨碍了“对真理应有的探求”,而且也妨碍了对另

一方的关心表示。最后她选择遵循这个制度,这一方面是出于自己职业地位的不稳定,她认为自己不仅没有奉行自我牺牲的道德理想,而且也没有遵循个人正直的标准。因此,她对自我的描述与她对另外两个人的描述形成对比,她把自己的丈夫描述为“一个绝对正直的人,从不做任何自己感到不正当的事情”,她也把自己的母亲看成“一个非常关心他人的人”,对他人“无私”奉献的人。

至于她本人,希拉里有些辩解地说,进了大学之后,她已经变了,变得更为宽容、更能理解人,不那么想去谴责她从前会谴责的人,更具有能力发现不同观点的正直的一面。尽管作为律师她已经接受了权利的语言,明确地承认自我决定和尊重的意义,但是权利概念仍旧处在与关怀伦理的紧张关系之中。然而,自私与责任的持续性对立并没有给她留下一条途径,使她能把对自己来说的真实命令同关系中的责任理想调和起来。

在大学生研究中,另一个学生詹尼所描述的道德危机也体现出权利道德与责任伦理之间的冲突。她也表达出一种无私道德和自我牺牲的行为,并以自己的母亲作为理想的楷模。

“如果我能发展得与这个世界中的某个人相像的话,这个人就将是我母亲,因为我从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无私的人。她会为任何人做任何事情,直至达到给自己造成许多伤害的程度,因为她为别人做了许多,而且不求任何回报。因此,理想地说来,那就是一个人应当做的人,一个无私的和给予的人。”

相反,詹尼把自己说成“在许多方面都是很自私的人”。但是,在发现自我牺牲包含了伤害他人(与自己亲近的人)的潜在局限性之后,她试图消除自私与关怀之间的紧张关系,修订自己“你可能成为的最好的人”的定义,给这个定义补充基本的成分,

“做最有利于他人的事情”，同时也有资格“发挥你自己的潜力”。

在两年前的道德与政治选择课上，詹尼着手根据“你应向自己付出多少？”和“你应向他人付出多少？”的问题来审查道德。在把道德定义为义务问题时，她试图通过自我与他人的等同对自我牺牲的前提提出挑战，并且把自己的责任概念与对权利的理解结合起来。但是，当时她家里出现了一次危机，它证明权利概念并不适于解决关系中的责任问题，这使詹尼的这一努力出了逻辑问题。这次危机是由一位亲属的自杀引起的，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由于她祖父患病，一直需要照顾而变得拮据。尽管在课程上一直从个人权利出发讨论自杀道德，但在詹尼看来，这次自杀事件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仅为其他人增加了照顾的负担，也进一步加深了痛苦和伤害。

在试图把自己的愤怒情感与逻辑理性联系起来时，她由于发现自己原有的思维方式已不再起作用而陷入困境：

“整个学期我们一直都在讨论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什么是善的，你应向自己付出多少和你应向其他人付出多少，然而，我的（亲属）自杀了，那是正当的，是一次道德危机，不是吗？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件事，因为我的确不再由于他这样做而恨他，我知道自己实在不能这样做。我的意思是说这样做是错误的，但是，他怎么能对自己的家庭作出这种事情呢？我确实必须认真地重新评价整个过程，因为它已经不再起作用。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所有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在被谈论时是完美的。我记得我们讲到的小故事，好像是如果你在执行一个任务，率领一艘巡逻艇，有人必须去扔一颗手榴弹或别的什么东西。那么好，这就是完美的，但当它是某件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情时，这种想法便不再起作用。我必须认真地重新评价在那个课堂上

自己所讲的一切,如果我相信所有那些东西,为什么我能以这种强烈的仇恨而告终?”

这个问题令人担心的方面是,基本的公平逻辑,即一个人相对于他人应向自己付出多少的逻辑开始激烈的变化,继而崩溃了:

“突然之间,所有的概念和术语都崩溃了。成了你不能对其作出任何价值判断的东西,你不能说,‘是的,它是道德的,’或者‘不,它不是道德的。’它是那种非理性和不可确定性事物中的一种。”

詹尼认识到,无论什么样的判断和行为本身都是不可改变的,也都具有影响他人生活的结果。既然在这种情况下,权利与责任、自私与自我牺牲不可避免地混淆在一起,她也无法找到一种思考方式,只有说在一种意义上它似乎是一次道德危机,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恰好是以“非理性和不可确定性”的形式出现。

在五年之后的又一次访谈时,詹尼说这些情况已经通过自己对“整个事情都关系到责任”的集中思考而发生变化。当自私与道德的对立持续时,她既没有对他人,也没有对自己作出反应;既不想去“对自己的祖父承担责任”,她也不想对自己承担责任。在这种既自私又无私的意义上,她看到了对立本身的局限性。当她认识到“我过去让别人对我的生活方向负责的做法简单得无法生活”时,她对自己提出挑战,以把握并“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向”。

从根本上把道德建构为责任问题,以及妇女对自己生活负责的努力在其他大学生描述的困境中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大学生也参与了权利与责任研究。对其中三位妇女所描述的困境的比较表明,在相当普遍的范围,自私与责任的对立如何使妇

女的选择问题复杂化了,让她们在无私的理想与她们自身行为的真理性以及需要之间徘徊。由道德和真理的对立产生的发展问题体现在,这三位妇女都试图找到一条途径克服这一对立,在继续对其他人作出反应的同时对自己更为诚实。在寻求一条途径消除自己感觉到的对他人负责同自我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时,她们所描述的困境全都集中在个人正直与家庭关系中忠诚的冲突。这三位妇女都遇到选择困难,并把自己的困难同她们不希望造成伤害联系起来。她们对这一问题的各种解决不断地揭示出自私与责任对立的自我蒙蔽本性,并以权利概念对无私的美德提出挑战,通过理解权利的方式改变对关怀和关系的理解。

大学二年级的艾莉森把道德定义一种权力意识:

“一种你能够影响别人的生活,影响你自己生活的意识,一种对人性的敏感,你有责任不危害他人的生活或者伤害他人。因此道德是复杂的,我把它极为简单化了。道德包括认识到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你将必须对这两者负起责任。我一直使用**责任**这个词;它就是你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产生影响的意识。”

在把道德与权力意识联系起来,把责任与不伤害他人等同起来时,艾莉森认为责任的含义在于“你对他人的关怀,你对他人需要的敏感,把它们当成自己的需要,因为你依赖于他人”。这种道德与关怀他人的等同使她把“自私”命名为责任的对立物,这一对立体现在她的判断中:个人满足的体验危害了行为的道德性,否则这些行为就会被看作是负责的和善良的:“当家庭教师几乎是一件自私的事,因为它使我感到为他人做事的幸福,我高兴这样做。”

因此,尽管道德被看作来源于自我与他人的相互影响,但也被归结为自我与他人的对立,并且最终同依赖他人联系起来,同关怀他人的责任等同起来。道德理想与其说是合作和相互依赖,不如说是履行义务和偿还债务,所采取的方式是为他人付出而不求任何索取。然而,这一建构显然是盲目的,正如艾莉森最初在描述自己时所讲的那样,“我对自己并不是很诚实的。”这种不诚实根源于自我欺骗的需要,而这一需要产生于她看待自己时遇到的一个明显的矛盾:

“我是一个对事物有许多构想的人,一个希望通过爱来使一切更美好的人,但我也是一个自私的人,许多情况下我并没有以爱的方式来行为。”

在试图解决自私的问题时,艾莉森作出一种持之以恒的努力,“去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并经历了“一个作出决定的艰难时期”。在明白了自己有权伤害但却不想那么做之后,她难以启齿告诉父母说自己想休学一年,因为她知道自己呆在学校里对他们有多重要。困在不希望伤害他人和希望真实地对待自己的矛盾之中,她试图澄清自己按照一种不被指责的方式来行为的动机。她努力在“为什么我在这里不快乐,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我想要什么等问题上对自己保持诚实”,发现不仅是对父母、而且对自己也难以解释清“为什么我必须休学一年,为什么它对我真的那么重要”。在把学院看成“自私”的场所,在这里竞争胜于合作,因而人们都“为自己工作,为自己做事,不帮助其他人”时,她渴望成为“关怀的,敏感的和给予的”,而这些要建立在合作而不是竞争关系基础上。但是,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她难以找到把个人和道德正直的理想与责任和关怀伦理结合起来的途径,如果她离开学校将会伤害父母,而她留在学校将会伤害自

己。她在描述自己对既诚实又关怀的希望时,明显表现出这种紧张关系,“有人在奉行某些观念的同时能够与他人联系起来,在尊重他人看法的同时又不作出让步,而且并不是仅仅服从和一味地迁就他人。”

第二位妇女埃米莉澄清了这种努力如何保证了权利概念。当被问及作为一个高年级学生,是否她曾在不明确道德原则的情况下面对一个决定时,她描述了自己第二年在是否应当上医学院问题上与父母发生的冲突。在解释父母的看法——她不该走得太远时,她在道德和自私的证明之间进行了比较:

“他们以道德原则来证明,而希望我留在这里的证明既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是我能够进行道德分类,坏的一面是这仍旧是依照自私的分类。”

在用权利的语言建构这个困境时,她解释说:“我父母在一定的时期里有权希望以某种方式看待我。我认为坏的一面是对这种权利的滥用,这提出了自私的问题,就我这方面的道德来说,我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把自己的离开看成与家庭脱离关系。”

在把权利与愿望、道德与关系中的责任等同起来的过程中,她表明了自己并没有“与家庭脱离关系的目的或企图”。相反,“我过去和现在仍旧认为,在某些方面与不同人在不同环境下生活我会成长得更快。”在把自己“分离的积极方面”——试图对自身发展负责与“对我来说的消极方面”——父母将被伤害进行比较时,她遇到了一个解释问题。古老的道德语言又得以再现,但当她描述自己的观点时又马上成为相对的东西:

“我的动机有一部分是自私的,或者并不是那么高尚的。我们的家庭不仅是一种给予,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给予,这是我的道

德义务,所有的事物都是相对的,采纳不走和留在这里同样是我的道德义务,我正在以自己的某种无私来把握这种局面。”

她对于自私和无私或许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判断的感觉,或许是一种解释或者视角问题而不是真理问题的感觉,扩充了两个道德概念,一个集中于权利,另一个集中于责任。当她定义自己所面临的道德冲突时,明显地表现出在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摇摆:

“当我并不把自己的离开看成是对其他方的伤害,而且没有构成这种伤害时,冲突就在于我是否有权作为独立一方来行为。他们那一方把离开看成是消极的,尽管我不这样认为。冲突并不在于我的解释,而在于我们对道德有着不同的解释这一事实,然而,我们的解释也是极为相似的,因为我认为两种解释相对来说同样都是凑合起来的,我设想选择他们的解释呆在这里,我也猜想到这是一种冲突。”

艾米莉以往一直认为,“总是有一种道德观点存在,一个更高尚的观点,只有百分之零点二五的人能够具有这种观点,但我相信有可能接近这个目标。”然而,她在这种情况下发现,“不可能作出道德决定”。在根据自己的信念——这样做并没有伤害到他人——来证明自己作为独立一方行为的权利是正确的之后,她最终还是接受了父母的解释,即她的离开是自私的,因为他们将受到伤害。在解释自己决定留下的“重要理由”时,她描述了自己如何把这个困境建构成自私的平衡,而且得出结论说自己的自私是“更大程度的自私”:

“他们实际上确实被整个局面所伤害,而我并不感到有很大损失,也不会有很大损失。所以我猜想开始把自己看得比他们还自私。两种自私起初是平等的,但不知为什么他们似乎受到

更大的伤害。”

因此,这种本身按照责任语言建构成自私平衡的权利建构,最终对责任的考虑——谁将受到更大伤害的问题作出让步。这种把困境建构成权利冲突的企图转而又把这一冲突变为自私的较量,排除了道德决定的可能性,因为任何一种解决都能以一种或者另一种视角解释为自私的。最终对责任的关心胜过了对权利关心,艾米莉通过“以自己的某种无私来把握”的方式解决了困境,因为她发现自己的父母比她本人更容易受到伤害。

在把对自己的伤害看成可以忽略和不予考虑(“没有新的体验在一种绝对的意义上说并不是一种伤害”)时,她也把这同负疚的行为进行比较,她感觉到自己为父母带来“很大损失”的责任。在把责任理解为“关系到道德”时,她把责任建构成“一个期望的链条,如果你打断了它,你就打断了整个的进程,这不仅仅是对于你自己也是对于你周围的所有人”。因此,基于独立设想的权利考虑对打断这一关系链条构成威胁,因此要以关系的考虑与之抗衡,并在价值上胜其一筹。最后,选择依据哪里的“责任更大些”来确定,根据易受伤害性的评价来确定,根据比较而言谁将受到更大的伤害来估算。

然而,在放弃自己“作为独立一方来行为”,而代之以让自己的“无私来把握”时,她已经怀疑自己对责任道德的解释,在这种怀疑的同时,她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感可见于艾米莉把自己比作“一粒豆形的胶质软糖,四处滚动,到处粘雪,但雪的份量从未真正地渗透到表皮里”。访谈接近结束时,她表明希望通过自己对关系更充分地“思考”,通过更关心认识自己是如何“与他人相互作用的”,而不是通过“顺其自然”来更安全地稳定自己。同以前她考虑自己在关系中做什么时的那种“防御心

和担心”相反,她现在认为,“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已经没有了那种担心,因为当你思考自己在做什么时,你也知道它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你也就是那种顺其自然的人;你不知道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

在整个访谈中,这种随它而去或者顺其自然意象的再现,表明妇女在自私与责任对立中的体验。在描述自己由对他人需要的感知所牵引的一种反应性生活时,她们如果不冒着似乎是自私的,因而在道德上是危险的维护权利的风险,就无法找到把握局面的途径。如同《瀑布》中的女主人公在小说开始时所讲那样,“如果我要淹死了,我不能伸手救自己,我实在是不情愿与命运抗争”,甚至没有思考“这或许是真理”,像她一样,这些妇女也不加思索地被消极的意象吸引,寻求像简一样通过沉入“不动的冰期”来避免责任的要求,以便“毫无抗争地顺其天命”。

但是,随它而去的意象似乎在免除责任义务,提供安全的同时,也带来一种面临更为痛苦的选择的危险,就像流产决定时的那种僵硬的抉择一样,或者像麦琪所认识的那样:自己已经无意中做了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因而,在认清结果的时候,责任问题又重新出现,并带来相关的选择和真理问题。

麦琪由于瞬间失去了抵抗而使自己对斯蒂芬的感情占了上峰:

“感到自己正被带入四周都是玫瑰的花园,在有力而温情的呵护下走上了一条船,船上有为她准备的脚垫,她的太阳伞也为她张开怀抱(她已经忘掉了它)——这个强壮的人出现后,她似乎一直都在身不由己地被牵着走。”

但是,当她意识到他们已经走出好远时,“一种可怕的惊恐占据了她的”,她的那种“渴望潮水为他们实现这一切的想法”立即

荡然无存了,首先“感觉到抗拒斯蒂芬的愤怒”,她谴责他一直想剥夺自己的选择权利,利用自己的轻率,但是由此也意识到自己的参与。当她不再“麻木”之后,她承认“短短几个星期的感情已经催促她犯下了令自己的本性极度退却的罪行:信念的背叛以及残酷的自私”。进而,麦琪“渴望完美的善”,选择“真实地对待我自己更平静的感情,在没有爱的快乐中生活”。

但是,在麦琪渴望善的时候,相应地,简却在寻求真理。在发现自己对詹姆斯的欲望“如此深切地自私”,以至于她在“像麦琪一样重提失去的关系的努力”中考虑淹没自己的时候,简作出了不同选择,对这种脱离关系提出疑问,最终把“自己同爱等同起来”。在看到尽管“麦琪从未与自己的恋人上床,但她已经伤害了所有的人,包括露西、她自己,以及爱她的两个男人,然后像一个自己要避开的另一时代的妇女”之后,简面临着“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件事,而以往是以一种方式看待同一件事,这个唯一的方式便是忍受,”结果,令她“犹豫不决的是,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将要做的是什么呢?”

麦琪越发地清楚了自私与无私行为之间的道德区分,而简对这种区分却越发地模糊起来。她“寻求德性”,结果发现自己“无法攀登上其他人似乎攀上的台阶”,因此,她便去寻求“在克制、否定和脱离关系中”的清白,她这样想道:

“如果我能充分地否定自我,我就能够达到某种清白,尽管那些周而复始的噩梦刺激着我真正的本性。我认为能够否定自己,把自己清除出去。”

但是,她发现无论以什么方式讲这个故事,无论以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最终她都面对这样的真理,尽管所有人都放弃了关系,她最终还是“淹没在意愿的海洋里”。

正是这种抵制脱离关系的拉力,通过自我否定来达到清白的看法使妇女开始去寻找自己体验的真实性,去谈论把握问题:

(回想过去的一年,它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把握住我自己的生活。”

第三位妇女,新入学的研究生凯特由此开始讲述了自己为了克服自私与责任的对立,为了把握自己生活所进行的努力。她是在大学高年级时进行这种努力的,当时她发现自己无法实现为了去做“其他对我来说有意义的事情”而离开学校体育队的愿望。在反复思考对自己生活中“无疑以往是特长”的体育说不这个激烈行为时,她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麻木的”,不能作出决定:

“我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这个决定是困难的。我好像无法作出这样的决定,我被难住了。我试图去思考它,它好似竖起来的一面墙,我甚至试图去想象为什么它这般地困难,为什么我会经历这样一个困难时期。它最终渐渐地变成一种危机的局面,因为教练对我说,‘目前看起来你必须作出决定,这样做或者那样做,’我感觉到自己无法决定。无论就情感和一切来说事情的确变糟了。所以,有意义的是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能够思考,我承认自己遇到大麻烦了。”

她的麻烦出于这样的事实:在说不时,她就是在向自己从前认为无可置疑的“全部伦理”提出挑战:以往她一直以父亲所代表的世界观思考成长——“在你能做的任何事情上以及体育道德上取得成就”,她把这看成“唯一合理的东西”,现在她认识到,“采取我自己的人生态度已经变成如此具有根本性的东西”。因此,在发现“存在着其他对我来说更有意义的事情”之后,她感觉到“对长期以来我一直奉行的,根深蒂固的假设构成了真正的威

胁或者挑战”，这个假设便是一直维系她认同的假设，把父亲同自己结合在一起的假设。

在描述自己从前在学校里“游荡”，“具有一种自己想做的事情都不现实的感觉，以至于没有任何抵抗”时，凯特已经通过“愈来愈多地做我想做之事，愈来愈少地做我认为自己应当做的事情或者被认为应当做的事情”来把握自己。这样她变得“越发地明确自己的位置”。在认识到不同世界观都具有合理性的同时，她更为依赖自己的解释。因此，把握的过程，逐渐产生的“对我应当做什么的一种更为确定的感觉，以及选择的可行性，所采取途径的合理性”就呈现出新的意义：

“这意味着我越发地走近自我，因此，我在判断方面变得更自信了，因为我有了某种判断的基础；感到自己更强大了，更依靠自己去作出决定和评价局面；而且不接受我父母或者（学院）的判断；在这样的局面下发现了自己，即我能够有一种观点，其他人能够有另一种观点，这两种观点似乎都是合理的，并没有哪一种是正确的，而且也懂得了如何去接受这种局面；尝试着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而且能够接受现实，或者开始对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正确，做一种事情比做那种事情更好的整个看法提出疑问。”

在开始对这样一种观点——存在着一条唯一正确的生活道路，差异总可以分为更好或更差的观点——表示怀疑过程中，她开始用一种新的方式看待冲突，把它视为关系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一种威胁。在把自己现在的道德观同从前的信念“总有正确的答案”进行对比时，她联系到自己在大学二年级时经历的一个道德发展过程：

“在道德推理的最高水平上，人们就一个问题被召集成一

组,理想的是他们应当取得对我来说合乎情理的一致。尽管它是那样地令人迷惑,但它还是令我吃惊。它过去和现在都是那样地明确,所以人们就有了这样的看法:存在着正确的答案,每个人都将获得正确的答案。”

既然一致的观点是权利概念的前提,在这个阶段它与凯特的女性主义理解联系起来。对妇女权利的承认“合法化了许多我曾经因为感到是妇女的选择而表现出的报怨和不满”。同样,道德与尊重权利的等同证明她所追求的选择自由的正确性,并且通过把义务限定在互不干涉的互惠而规定了责任的范围。但是,现在她看到了这种“以个人为中心”平衡权利倾向的局限性,在这种探讨没能说明现实关系的情况下,主张“一种完全是另一种范围的人类体验”。在把个人生活看成是联系着的,体现于社会关系背景中时,她把自己的道德视角扩大到包括“集体生活”的概念。现在的责任包括了自我和他人,这两者被看成是不同的,但却是相互联系的,而不是分离和相互反对的。相互依赖的共识而不是互惠的关心体现在她的信念中:“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全都有责任彼此关照。”

既然道德问题是在冲突情况下产生,而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任何一条路,某事或某人都将不被照顾到”,那么它们的解决“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是与不是的决定;而是一个更复杂的事情”。在一个通过一个复杂关系网络扩展的世界里,某人被伤害的事实影响到所涉及的每一个人,它把任何道德决定都复杂化了,不存在着明确或者简单解决的可能性。因此,道德与其说是与正直相对立的,或者与一致的理想相联系的,不如说是与“这样一种正直”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正直来自“通过对于你想象包括进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有意义的一切因素的思考所作出的决定”,

也包括对选择的责任。说到底,道德是一个关怀问题:

“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考虑一切,当你知道还有其他将会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时,基于一两种因素的不慎重或者仓促的决定就是不道德的。道德的决定方式是尽可能去思考,尽可能知道得更多。”

在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强者”(尽管认识到自己并不总是感到强大)时,凯特把自己看成是“深思熟虑的和认真的”,看成“痛苦地开始学会如何表达自己和更为开明起来”,而不是像从前那样持一种“斯多葛派的态度”。她在参加体育运动,“从身体上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同时”,对女性主义的介入也使他认真对待自己的思想和感觉。现在她对自己有了更多的反应,对他人的反应也更为直接,她通过对责任的一种新理解描述了包括权利逻辑的道德。不是把生活看做“一条途径”,而是把它看成“一个网络,在任何时候你都能选择不同的途径,所以,它并不像是只有一条路”,她认识到,冲突总是要存在的,“没有什么因素是绝对的”。唯一“真正持久的东西便是过程”,遵循关怀精神作出决定的过程,这要以你所认识到的东西为基础,在看到其他解决方式或许合理的同时,承担起选择的责任。

在把责任与关怀,而不是不伤害等同起来时,凯特认识到局限性问题的:“我们根据对他人的帮助来彼此负责,而我却不知道走了多远。”尽管包括是道德意识的目标,但排除或许是生活的必要。她所敬佩的人是“在自己生活中真正能与具体情况联系起来的人们,”他们的知识并不来自分离,而是来自生活中与自我和他人的联系,来自生活的状况。

因此,从一种意义上说,她并没有太多的变化。G.艾略特观察到,在作出道德决定时,“我们并没有适于所有皮箱的万能

钥匙”，继而她转向了“具有微弱辨别力的，被扭曲了精神的”决疑论者，看到对于眼睛和心灵过于经常被致命封锁住的人们来说的真理阴影——道德判断的真理性仍旧必然是虚幻的和空洞的，除非它们被不断的、标志个人命运的特殊情形所检验和启蒙”。因此，道德判断必须通过“发展着的见识和同情心”来表现，通过由经验获得的知识来诱导，这种经验便是“普遍的准则”，它无法使人们“以现成的专利方法作出判断，而不遇到任何滥用耐心、歧视、不公正的麻烦，不关心自己是否有见识——对诱惑进行艰难的预料，或者来自活泼紧张生活的，建立在人们共同情感基础之上的见识。”

然而，对艾略特来说，至少在这部小说中，道德问题仍旧是一个失去关系的问题，是一个“是否这个时刻已经到来——男人已经跌落到失去将有效关系的可能性中，而且必须接受他一直当作冒犯来抵抗的激情影响”的问题。因此，激情和责任的对立把道德束缚于无私的理想，也就是麦琪所渴望的“完美的善”之上。

权利概念，以及构成自我与他人是平等的公正观念基础的假设对这种激情与责任的对立，以及道德等于无私的理想提出问题。在70年代大学生的思考中，权利概念的引入对自我牺牲和自我否定道德提出挑战。在对自我否定的怀疑论提出质疑，以选择意识去代替天真幻想的过程中，她们努力把握权利的本质含义，把自我利益看成是合法的。在这个意义上，权利概念改变了妇女的自我概念，允许她们把自己看成是更有力量的，并且正视了自己的需要。当主张权利似乎不再危险时，关系的概念也从持续性依赖的契约转变为相互依赖的动力。因此，关怀概念从麻木的不伤害他人的命令扩展为对自我和他人的反应性行

为,并由此而保持住联系。对人们关系动力的意识因此变成道德理解的核心,并且把心灵和眼睛结合在一种把思维活动和关怀行为联系起来的伦理学中。

因此,妇女权利的变化也改变了妇女的道德判断,由于妇女认识到关怀自己同关怀他人一样是道德的,公正与仁慈便协调在一起。女性主义者率先提出的在公共领域包括妇女的问题在妇女心理方面得到呼应,因为妇女们开始意识到自身的排除。当对关怀的关注从不伤害他人的命令扩展到社会关系中的责任理想时,妇女也开始把自己对责任的理解看成道德力量的源泉。但是,权利概念通过把第二种视角加入到道德思考而改变了妇女的道德判断,使其判断结果更具包容性和不那么绝对。

正如自私和自我牺牲构成权利紧张关系中的解释和责任问题一样,道德真理也因为心理学真理而复杂化了,判断问题也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德莱布尔的努力去写“像石子一样圆润而坚硬的诗句”的女主人公,仅仅发现词句和思想是挤出来的,因而得出结论说,“一首如此圆润的诗什么都没有讲”,并且开始描述人们对一个事物从各个角度看到的多样化的边缘,最终也没能发现统一的真理。不同的是,从视角的最终转变中,她把自己的怀疑归结为“被摆脱的第三者”,并且不再避开自私的谴责,把自己同第一人称的声音等同起来。

第六章 成熟观

依恋和分离维系了人类的生命周期,描述了人类繁衍的生理学和人类发展的心理学。描述婴儿发展本质和秩序的依恋与分离概念在青春期以认同和亲密关系出现,在成年期以爱和工作出现。然而,这个在人类生活中重复出现的对应关系在形成一种发展秩序时,倾向于消失在把发展和分离等同起来的线性递减过程中。人们能够通过关注孩子和青少年的发展部分地追溯这种消失,通过测量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距离可以容易地勾画出他们的进步,但是,这样做的局限性很大程度上在于说明成年发展时对妇女的忽略。

在选择像弗吉尔那样“歌颂武器和士兵”过程中,心理学家对成年的描述一直集中于自我

的发展和作品。尽管人们推测,青春期分离的最高点在成年期伴随着依恋和关怀再现,但是,近来从研究男性中浑然生出的对成年发展的描述,却没有对有亲密关系和有生殖力关系的生活进行充分说明。D. 莱文森(Daniel Levinson, 1978)着手在全部是对男性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贯穿于发展的概念,它能够包括成年人生活中出现的不同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变化”(8),尽管他显然苦恼于在自己必要的小范围抽样中把妇女排除出去。

莱文森的概念是由“梦”的观点来预示的,它以朱庇特对埃涅阿斯旅途辉煌命运的预言方式排列男人生命的时期。莱文森所描写的梦也是一种对辉煌成就的展望,它的实现或调整将形成男人的性格和生活。在莱文森对表现出来的关系所进行的分析中,“指导教师”促进了梦的实现,而“特殊的妇女”是鼓励这个英雄形成以及按照自己设想生活的协助者:“如果刚成年的人试图摆脱自己家庭以及成年之前的世界,进入到成年世界,他就必须与其他成年人形成重要的关系,这些人将促使他实现自己的梦想。在这个数据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是“指导教师”和“特殊的妇女”(93)。

因此,成年早期的重要关系被解释成实现个人成就的手段,随着成功的到来,这些“转折性的人物”必须被抛弃或者重新建构。然而,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像黛朵一样变为梦想实现的障碍,那么这种关系就必须被抛弃,“从而使发展过程”继续下去。莱文森明确地把这个过程定义为个体化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的生命周期,但尤为体现于转折的关键时期……个体化的发展过程将继续下去”。这一过程也关系到“一个人自我以及外部世界关系的变化”,这些是构成他本人“生活结构”的关系(195)。

如果在这个“成为一个自为人”的过程中,人们的这种发展结构是错误的,并且威胁到所梦想的远大抱负,那么为了避开这种“严重的错误或者倒退”,这个人就必须“冲出来”挽救自己的梦想。这个冲出来的行为以一种分离的“代表性事件”为标志达到顶点,诸如“离开自己的妻子,放弃自己的工作,或者搬到另一个地方”(206)。因此,通向中年拯救的道路或是经历成功,或是经历分离。

从人类经验的排列上看,莱文森的选择与弗吉尔的选择是相同的,把成年发展过程描述成为了一个辉煌的命运而艰难奋斗的过程。像虔诚的埃涅阿斯建立罗马的过程一样,莱文森研究中的男人一生致力于梦想的实现,根据自己与理想彼岸的距离来衡量自己的成功。因此,在莱文森重新讲述的故事中,无论关系特有的程度如何,它们都在成年人个体化发展的数据中起着一种相对服从的作用。

在G.维兰特(George Vaillant, 1977)对适应生活的说明中,也体现出对工作的重视。像访谈所得到的数据一样,相关于成年人适应性的变量主要取决于职业,这就对扩展埃里克森的阶段论提出要求。在填补埃里克森留下的“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在他看来“无法勾勒发展的时期”时,维兰特把三十岁描述成“事业巩固”的时期,在他的抽样研究中,这个时期的男性“像‘泡沫共和国’的莎士比亚的战士一样”(202)。与莎士比亚的罗马相似,人们中断亲密关系以及生殖力的延续以便为进一步的个体化和成就阶段留下余地,而这种个体化和成就是通过工作来实现的,也通过成功所得到的社会承认而达到顶峰。

然而,在重构的过程中,埃里克森的生殖力概念(1950)发生了变化。在把生殖力设想为“关系到生产和指导下一代”时,埃

里克森吸取父母的“生产力和创造力”的文字和象征意义作为成年阶段关注关系和致力于关怀行为的一种比喻(267)。在埃里克森的说明中,生殖力是成年发展的重要阶段,包括“人们与自己生产力和后裔的关系”(268),而在维兰特的数据中,这种关系被推至中年。

在把生殖力断定为“不只是使弱小事物成长的一个阶段”时,维兰特提出争辩反对埃里克森关于父母地位的比喻,埃里克森告诫说,“这个世界充满了不负责任的母亲,她们在生育以及爱两岁以内的孩子方面是出色的,但在随后的过程中令人失望”。为了排除这样的妇女,生殖力被人从早期的泥土芳香中连根拔了出来,被重新定义为“对生物随之而来的生长、引导和幸福负责,而不仅仅是生产庄稼或者生育子女”(202)。因此,埃里克森概念的扩展被限定在中年期的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对关怀定义作了更多的限制。

结果,维兰特强调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把对他人的依恋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关于工作、健康、压力、死亡以及家庭关系变动的访谈中,维兰特认为在自己的研究中,对男性提出的“最难的问题”是,“你能够描述自己的妻子吗?”这个事实发出的告诫大概出自他在男性抽样方面特有的经验,但也表明这些男人在适应性方面的局限性,以及心理上的消耗。

因此,“健康生命周期模式”是那些在关系上疏远的男性,发现难以描述自己妻子的男性建立起来的,不过他们还是意识到妻子在自己生活中的意义。在莱文森的结论中,也同样显现出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距离感:“在我们的访谈中,友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才被认识到。作为一种尝试性的概括我们将指出,美国男人很少体验到与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妇女的亲密友谊。”由

于这种印象的影响,莱文森在讨论成年期的三个“任务”(建立和调整生活结构,为这种生活结构的唯一部分而工作以及变得更为个体化)时,停顿下来提供了一个解释:“一个美国男人可能会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在这个网中他是和蔼可亲的,同许多男人或者是一些女人保持‘友谊’关系,然而,一般说来在对童年或者青年的美好回忆中,大部分男性都没有一个亲密的男性朋友。许多男人同妇女偶尔也发生亲密关系,或许是一些复杂的性爱关系,但是大多数男人都没有同一个妇女保持一种不掺杂性因素的亲密友谊。我们有必要思考为什么友谊如此地难以获得,这种损失对成年人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335)。

因此,一方面一些研究说明一种关于成年的看法,认为在这一时期关系服从于正在经历的个体化以及成就的过程,然而,它们的进步依据先前的依恋来预言,被认为增强了亲密关系能力。另一方面,也有这样的观察,在那些按照成年发展模式生活的男性中间,在某种意义上说关系的能力被减弱,这些人在情感表达上受到限制。通常通过成就的语言来建立关系,并根据失败或者成功形成特色,而在情感上却是枯燥无味的:

“在研究中发现,45岁的卢勒基享受着一种最美好的婚姻,但是当他写下‘当我说我们从来没有一次或大或小的争执时,你们或许不相信我’这句话时,或许这一婚姻并不像他暗示得那样完美。”

“卡森博士的传记表明他从认同到终止亲密关系的迹象,通过事业的巩固,最终形成了最充分的‘关怀’能力……他经历过离婚、再婚、从做研究到私人开业的变化。他个人的变化一直继续着,这个默默无闻的研究者已经成为一个有魅力的医生……和蔼、轻松、善良和自制……这些构成他青春期特点的充满活力

的能量又恢复了……现在他的抑郁显然是一种情感；他可以不知疲倦地做任何事情。他接下来承认，‘我是一个性欲很强的人，这也是一个问题。’然后他对我进行了令人兴奋的描述，不仅告诉我他自己最近的风流轶事，而且表达出自己对病人父亲般温暖的慈爱。”(Vaillant, 1977:129、203-206)

尽管维兰特和莱文森重新解释了分离导致依恋，个体化导致成熟的概念，这个概念还是与他们为了支持自己而列举的生活不相吻合。同样，在埃里克森对路德和甘地的研究中，当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在辉煌的结合中得以实现时，这两个人在亲密关系能力方面却略逊一筹，而且过着远离他人的生活。因此，路德在对信仰的献身中，像甘地对真理的献身一样，忽视了紧紧围绕在自己身边的大多数人，仅仅为了上帝的光荣奋斗。这些人显然在细节上与弗吉尔史诗中的埃涅阿斯相似，他也斩断了妨碍自己建立罗马进程的亲情关系。

在所有这些说明中，除了黛朵的哀怨之外没有妇女的声音，她徒劳地哀求和威胁着埃涅阿斯，最后在他用剑的威逼下沉默下来。因此，通常人们对成年发展的描述似乎失去了一条发展的路线，即没有描述关系走向相互依赖的成熟进程。尽管在关于发展的大多数文献中承认了分离的真理，但继续联系的现实却丢失了或者被贬至出现妇女人物的背景之下。这样，不断涌现的成年发展概念把相似的阴影笼罩在妇女的生活上，再次指出她们在分离上的不彻底，把她们描述成关系的泥潭。对妇女而言，相继被分配到青春期和成年阶段的分离和依恋的发展标志，在某种意义上似乎融合在一起了。然而，当这种融合让妇女在赞美分离的社会中冒险时，也表明心理学文献中通常被模糊了的一个更为普遍的真理。

对于刚刚成年的人来说,当认同和亲密关系聚集成相互矛盾的义务冲突时,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就显露出来。男女在关系体验方面的不同是文学领域关于人类发展,以及我的研究发现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标志着男女青春期体验的认同和亲密关系的差异,导致男女性别认同形成中分离与依恋的不同动力,男女的声音也由此有代表性地讲出不同含义的真理,分离角色的男性声音定义了自我并为它赋予权利,关于不断发展的依恋过程中的女性声音建立并维系了人类社会。

既然这一对话包括了导致人类发展紧张关系的争辩,在描述成年发展时,妇女的沉默也扭曲了人类发展的阶段和次序。因此,我打算部分地恢复失去的妇女发展的文献,因为它们描述了成年早期的自我与道德概念。在着重于男女之间解释差异的过程中,我的目的是通过把两性的视角包括进来扩展人们对发展的理解。尽管所涉及到的判断出自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样本,但它们也表明了一种对比,使人们不仅有可能认识到在妇女发展中被忽视的东西,而且也知道它们在何处。

在女子学院的文学课上,学生在讨论 M. 麦卡锡(Mary McCarthy)和 J. 乔伊斯(James Joyce)小说所描述的道德困境时,这一认识问题得到解释:

“我感到自己陷入了一个对我来说是新的,但因此而变得可怕的相似的困境:成人生活的陷阱,我被困在井里,挣扎着,没有力量去行为,因为你能看到两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说来不久我就会作出让步。”(《一个信天主教的姑娘对童年的回忆》)

“我从来不为自己不再相信的东西服务,无论它本身被称为我的家园、我的祖国还是我的教会:我将以尽我所能地自由、尽我所能全面地以某种生活方式和艺术方式表达自己,用我唯一

允许自己使用的武器保护自己,这就是沉默、放逐和狡猾。”(《一个年轻艺术家的肖像》)

在把斯蒂芬“非奴性的”(non serviam)确定性同麦卡锡的“曲线过程”(zigzag course)相比较时,妇女们在确定斯蒂芬的选择是更好的选择方面达成共识。斯蒂芬有坚定的信仰,而且施计去避免矛盾;他的认同形成是明确的,并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明。他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了一种立场。

在希望自己的决定以及欲望的确定性更像斯蒂芬的同时,这些妇女把自己看得更像 M. 麦卡锡,无助、无力而且不断地作出让步。在她们的解释中,无助与权力意象的比较关系到由妇女发展困境导致的依恋与分离,正直与关怀之间的冲突。在斯蒂芬更为简单的建构中,分离似乎赋予了自由以及充分自我表现的权利,而依恋似乎是一个麻痹人的陷阱,关怀是让步的不可避免的序曲。对于学生来说,M. 麦卡锡的描绘肯定了她们自己对这种说明的认可。

然而,在这些小说中,对于通往成人生活的道路进行了比较描述。对斯蒂芬来说,告别儿童时代意味着抛弃关系以便保护自我表现的自由。对玛丽来说,“告别儿童时代”意味着抛弃自我表现的自由以便保护其他人和维持关系:“我内心充溢着权利意识和凯撒大帝般的宽宏大量。我变得含糊其辞了,不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是在社会利益方面,像一个长大了的负责的人”(162)。这些在自我表现或者自我牺牲上的不同的认同建构带来进一步发展上的差异问题——前者带来人类的联系问题,后者带来真理问题。然而,这些似乎不同的问题是紧密联系的,因为对于真理的退缩导致了关系上的距离,而且分离也部分地摆脱了真理。在对刚步入成年期的大学生进行的研究中,男性从

放逐和沉默中恢复过来与女性从含糊其辞中恢复过来相资并进,直至亲密关系和真理聚集于对正直与关怀之间联系的发现。因而,在声调上的一种唯一的不同揭示出男女自一开始便知道的东西,以及他们只是在后来通过经验发现的东西。

英语课上妇女赞成斯蒂芬当场自相矛盾的选择与大学生研究中妇女孩子般的易于道歉吻合起来。参加这项研究的男女数目是不等的,表明在道德和政治选择课堂上男女生的分布。研究中的5位女性27岁时全都在事业上积极进取——2人从事医学工作,1人从事法律工作,1人在读研究生,还有1人是劳动工会的组织者。她们在毕业五年之后有3人结了婚,1人有了孩子。

27岁时,当她们被问及“你如何对自己描述自己时,1名妇女拒绝回答,另外4人对访谈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是我认为自己充满了母性,百分之百的母性。我以一种教养的角色看待自己,或许现在是不正确的,但无论在何时,做医生也好,做母亲也罢……对我来说都难以在不考虑我所关照的周围人的情况下先想到自己。”(克莱尔)

“我相当努力地工作,非常认真也很负责,至于弱点方面,我有时在作出决定方面犹豫不决,不自信,害怕做一些事情和负责任,我想这是我所具有的最大的矛盾之一……我生活中其他重要方面是我丈夫,我试图使他的生活轻松并且尽力去帮助他。”(莱斯利)

“我是一个歇斯底里的人。紧张而富于激情。我对人也很尖刻……我也很温柔,并不那么冷酷。我是一个更容易变得善良而不是发狂的人。如果我必须说出一个对我来说包括许多含义的字,这个字便是“被收养”。”(埃里卡)

“我变化了许多。在上次访谈时(22岁),我感到自己像一个感兴趣于发展和试图努力的人,似乎对我来说,最近几年没有进取,也没有什么发展,我认为这是最困扰自己的事情,我一直在想自己没有发展。这并不是真的,我发展了,但是,似乎是一种失败的是我与汤姆分手了。与汤姆的关系使我感到自己好像没有发展……我最近遇到事情是描述自己的方式,我的行为有时并不是这样。类似于我对汤姆造成很大伤害这样的事一直苦恼着我。我把自己看成试图不伤害他人的人,但最终我还是给他人造成很大的伤害,因此这是压抑我的东西,我是一个在无意中伤害人的人。近来产生一种感觉,即坐下来谈你的原则是什么,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我如何看待自己是容易的,但在现实中,有时行为方式却完全不同。你能说自己努力不去伤害人,但你可能因为自己的事情伤害人,或者你可以说这是你的原则,可一旦面临实际情况时,你并没有真的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所以我把自己做是矛盾的、混乱的。”(内恩)

人们在妇女发展中反复注意到的认同与亲密关系的融合或许在这些自我描述中再明确不过地表达了出来。在对描述自己的要求作出回答时,所有的妇女都描述了一种关系,在与未来的母亲、现在的妻子、被收养的孩子、或者过去恋人的联系中描述自己的认同。同样,她们用于进行自我评价的道德判断标准也是关系的标准,是一种教养、责任和关怀的伦理。在通过依恋行为(“给予关照”,“帮助”,“是善良的”,“不伤害”)衡量自己的力量时,这些颇有成就的妇女在描述自己时并没有提到她们在学术上以及职业上的差别,即便是提起,她们也把自己的职业活动看成对自身感觉的威胁,她们遇到的成就与关怀的冲突令她们或是在判断中被分离,或是感到背叛。内恩解释道:

“当我第一次申请医学院校时，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关心他人的人，能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关怀他人，最近一些年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是否能够奉献我自己、我的时间、我为其他人做的事情。至于医学，尽管它似乎一开始便是要求精益求精的职业，但似乎或多或少地妨碍你去做它。我好像感到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发展，我是一条细流，试图去对付我所做的一些令自己十分气愤的事情，因为事情并没有按照我的意图去发展。”

因此，在所有妇女的描述中，认同是在关系背景下来定义的，根据责任和关怀标准进行判断。同样，道德被这些妇女看成来自联系的体验，被想象为一种包括，而不是平衡权利要求的问题。克莱尔对道德来自依恋的基础性假设作了详尽的说明，这一说明是她在回答海因茨是否应当去偷一种价格昂贵的药，以便救妻子的问题时作出的。在解释海因茨为什么应当偷药时，她把自己的判断建立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

“对我自己而言并不意味着什么。这好像用一只手来鼓掌，无论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都缺少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有意义的是集体，在某种原则指导之下的集体，原则之一便是每个人都属于这个集体，你的一切都来自这个集体。你必须爱其他的每个人，因为即便你可能不喜欢他们，你也不能同他们分开。爱他们如同爱你的右手。他们是你的一部分。其他的人是你与之联系的大集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于这个有抱负的充满母爱的医生，用一只手来鼓掌似乎并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而是一种人类的荒谬，一个孤立者在相互联系的现实中的幻想。

男性认同的曲调则不相同，它更清晰、更直接、更有特点、边缘也更清楚。即便是在认同概念本身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他们

也对真理的确定性表现出信心。尽管男性描述的自我世界不时地也包括“人们”和“深切的依恋”，但却没有什么特殊的人或者关系被提起，也没有在自我描述背景下勾勒出关系行为。他们以分离的形容词——“理智”、“逻辑”、“想象力”、“诚实”、有时甚至是“自负”和“骄傲自大”来替换妇女使用的依恋性动词。因此，男性的“我”在分离中被定义，尽管男人们也将有“真正的关系”、“深切的情感”，或者是对他人的期望。

在随意选取的半数样本中，与妇女职业和婚姻状况相似的男性最初对自我描述的要求作出这样的回答：

“有逻辑性、谦让和外表上的平静。这似乎像我的陈述一样简捷明快，这是由于我的身世和教养。建筑学的解释必须简单明了，能够让人接受。这些是基于情感的东西，我把自己看作是有教养的和知书达理的。”

“我把自己描述成充满激情的人，甚至有点骄傲自大。我是关心的、负责任的人，现在我很累，因为昨晚没有睡好。”

“我把自己看作在理智和情感方面都很完美的人。相对于我的职业和现实的社会关系而言，我的朋友和相识的圈子要小一些。比较起来我对自己的理性才能和发展感到自豪，满足于情感的这种发展，并不把它作为自己刻意努力追求的目标。我想在情感上更豁达。”

“理性、知觉——我现在冷酷地保持着诚实，对于一些包括其他人，尤其是权威的社会状况仍有些保留和不现实的态度。我现在比以前有了好转，更轻松了，不那么紧张和拖拉。多少有

点懒惰,尽管难以说清这与同他人的矛盾有多大联系。我有想象力,有时还过于丰富。有点业余爱好,对许多东西感兴趣,但对它们没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尽管我准备改正这一点。

我想首先通过重述一下我个人的身世、我生长的地方,那种我不满意却又做了千百遍的事情来描述自己。这似乎不能把握我这个人的本质如何,我或许在另一种徒劳的努力之后能够确定下来,因为并不存在着我这人本质如何一类的东西,整个事情都非常令人厌倦……我认为并不存在自我一类的东西。我的自我此刻就在这里,我的自我也有明天。”

“逐步成长的和诚实的。”

“我猜想,表面上看来我似乎是容易相处的和没有什么架子的,但是我认为自己或许比这包裹得更紧一些。我很容易把自己包裹起来。有点自作聪明,或者可能是骄傲自大。我并不像我应当那样的完美。我猜想自己有点倔强,是一个并不为情感或情绪所干扰的人。我有深切的情感,但我不是那种有许多不同朋友的人。我一直依恋于少数人,非常深切地依恋。或者是对许多事的依恋,至少在能够说明的意义上。”

“我认为自己是那种有创造力的人,也是有点神经质的人……许多是由于我成长环境的影响。有一种对牧羊人生活的渴望,但同时也有一种追求华而不实,追求名誉,以及通过出去闯荡而得到承认的欲望。”

这些人中有两个以更为试探性地、泛泛地谈论人开始,但

是,他们最后转到一些重要的看法、或者是对有特色的成就需要上面:

“我认为自己基本上是一个正派的人。我认为自己很喜欢别人,我喜欢讨人喜欢的人。我喜欢做从人们中、从他们的全部生活中得到快乐的事。即便是我并不怎么认识的人们。当我说自己是一个正派人时,我认为这几乎是使我成为正派人的事情。这就是正派的品格、好的品格。我认为自己很聪明,我没有失去什么,行为起来也不完全像自己灵感所刺激的那样——无论它是否为一个缺乏灵感的问题,我不知道,而且不能完成什么事情,成就事情,不知道自己想往哪里走,或者正在做什么。我认为大多数人,尤其是医生都要对自己在4年里将要做什么进行思考。我自己(一个实习医生)实在是一片空白……我有许多想法……但我无法想象去实现它们。”

“我猜想,我乐于去想象的,对自己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自己意识到周围正发生着什么,周围人的需要,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乐于为他人做事,这样做我感觉良好。我认为这对自己来说是好的,但我并不能肯定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我想可能有些人也为他人做事,可这并不能让他们感觉良好。有时,我也是这样,例如在房子周围工作时,我总是在做其他人正在做的事情,最后自己对这样做也感觉到不满。”

在这些男性的自我描述中,把他人包括进来是与认同资格,而不是与它的实现相联系的。取代依恋的是,个人成就吸引了男性的想象,许多观点或者有特色的行为定义了自我评价和成功标准。

因此,在青春期到成年的转折中,认同与亲密关系的发展秩

序更适于男人而不是妇女。权力和分离促进了男人通过工作成就而得到的认同,但也使他与其他人拉开距离,其他人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存在于他的视野之外。克兰利在督促 S. 代达罗斯为了母亲而履行复活节的义务时提醒他说:

“你的母亲一定经历过许多苦难……你为什么试图使她摆脱苦难,甚至还使她承受更多的苦难呢?你为什么还要增加她的苦难呢?”

斯蒂芬说,如果我能够,这将并不损失我什么。”

在这种距离中,亲密关系变为使自我恢复与他人联系的重要体验,使人们有可能看到两面——既看到这对自己构成的损失,又发现行为对他人的影响。关系的体验结束了孤立,否则这种孤立就会变成冷淡,缺乏对他人的主动关心,尽管这或许出于尊重他人权利的意愿。因此,亲密关系对男人来说是起着变革作用的体验,青春期的认同通过它变成了成年人爱和工作的生殖力。在这个过程中,正像埃里克森(1964)观察的那样,通过亲密关系获得的知识把青春期的道德观念变为成年人的关怀伦理。

然而,既然妇女通过亲密关系和关怀定义自己的认同,她们面对的道德问题也就成为不同种类的问题。当关系通过掩饰欲望来保护时;当冲突以模棱两可来避免时,便产生了责任与真理之间的混乱。麦卡锡在描述自己在祖父母面前的“表现”时解释说:

“无论我同他们讲什么通常都是非常含糊的和解释性的,并努力迎合他们的喜好(因为,除了其他别的因素之外,我喜欢他们,并试图使自己同他们保持一致),除了回答直接的提问之外,我很难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是假。我的确试图,或者我自认为

要避免说谎,但对我来说,似乎他们是以自己对于事物的不同看法强迫我这样做,因此我总是为了他们把事实变换成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为了做事对得起良心,我尽可能在任何时候都避免作出绝对判断,出于一种谨慎,我也没有给出明白的真理。”

因此,这种关键性的体验不再是亲密关系而成为了选择,并使自我面临着澄清责任和真理的任务。

因此,在从青春期到成年的转折中,困境本身对两性来说是相同的,一种正直和关怀间的冲突。但是,由于探索视角的不同,这种困境导致人们承认相互对立的真理。这些不同的视角反映在两种不同的道德意识中,因为分离被权利伦理证明是正确的,而依恋则通过关怀伦理来支持。

权利道德根据平等来断言,集中体现在公正的理解上,而责任伦理依赖于公平的概念,承认需要的差异。当权利伦理成为一种尊重平等的体现,对自我和他人的权利要求进行平衡时,责任伦理则依赖于产生同情和关怀的理解。因此,标志儿童与成年时间跨度的认同与亲密关系的呼应通过两种不同的道德表达出来,它们的相互补充便是成熟的显示。

在研究中,这种相互补充可以通过个人在道德冲突与选择上的体验来追溯。抽样选出的两位律师解释了两性在判断上的分歧是如何通过发现其他人的视角,以及发现正直与关怀的关系来解决的。

希拉里重复了麦卡锡描述的责任与真理的困境,她是一名律师,她说自己在经历了“一周非常紧张的工作”之后,感到简直难以形容自己。她也像麦卡锡一样把自我牺牲的行为看作是“勇敢的”和“值得赞扬的”,并且解释说“如果每个人实际上都以对他人关心和勇敢的表现方式来行为,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人们将不会犯罪,也不可能有贫穷”。然而,当每个人情感相互冲突的事实使伤害不可避免时,这种自我牺牲和关怀的道德理想不仅在关系中遇到麻烦,而且也在法庭上遇到麻烦,在法庭上,尽管她关心另一方的委托人,但她决定不去帮助对手打赢这场官司。

由于这两个事例,她发现不伤害他人的绝对命令对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实际道德冲突不足以提供指导。她对于动机与结果之间不一致的发现,对于选择的实际局限性的发现致使她认识到,在一些情况下没有办法不造成伤害。在面对个人和职业生涯中的这类道德困境时,她并没有放弃选择的责任,而是主张在那些她认为不伤害是道德的人们当中也把自己包括进来的权利。现在,她那更具有包容性的道德包括了对自己真实的命令,使她奉行两个判断原则,尽管她还不能明确地把这二者的结合起来。她认识到的是,正直和关怀必须被包括在一种道德中,这种道德能把成年人生活中出现的爱与工作的困境包括进来。

W.培里(William Perry, 1968)认为,伴随放弃绝对标准而来的宽容趋向描述了成年早期的智力和伦理发展过程。培里描述了标志转折的思考中的变化——从知识是绝对的,回答是明显对错的信念到理解了真理与选择的情境相对性。这种转折和它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可以在毕业五年之后男女两性在道德理解上的变化中看到(Gilligan and Murphy, 1979; Murphy and Gilligan, 1980)。尽管在这一时期里两性都摆脱了绝对性,但对每一性别来说,绝对性本身是不同的。在妇女的发展中,关怀的绝对性最初被定义为不伤害他人,但随着对个人正直需要的认识而变得复杂起来。这种认识产生了体现于权利概念中的平等要求,权利概念改变了对关系的理解,也使关怀的定义发

生变化。对于男人来说,由平等和互惠来定义的真理和公平的绝对性遇到了表明自我与他人之间不同存在的体验所产生的问题。因此,多重真理的意识导致在公平指导下的平等相对化,产生了宽宏大量和关怀的伦理。对两性来说,两种道德决定情境的存在使依据定义的判断与情境联系起来,并且对责任和选择产生新的理解。

在大学生研究中,律师亚历克斯描述了对于不同现实的发现,以及由此对道德与真理情境性质的发现,他刚进法学院时“认识到人们的确不懂任何东西”,“甚至不知道存在着什么绝对的东西。我想,人们甚至不知道存在着什么绝对正确的东西。人们所能知道的只是自己必须走这条或者那条路。你必须做出决定。”

他的这种不懂任何东西的意识更为痛苦地来自一种其结束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关系。近来他发现妇女的体验不同于自己,并意识到在自己看来如此密切的关系已经拉开了多大的距离。因此,他先前称为绝对真理的道德价值逻辑等级秩序似乎逐渐地成为亲密关系的障碍,而不是人格正直的堡垒。因此,他的道德概念开始变化,由于对人与人依恋关系有了新的理解,他对于关系和不公正的关注也变得复杂起来。在描述最初表明他看待道德问题方式的“依恋原则”时,亚历克斯看到超出公平,在关系中考虑道德的必要性:

“人们有依恋某种东西的现实情感需要,平等并不能为你提供这种依恋。平等分裂了社会,给每个人增加了立足的负担。”

尽管“平等是你能坚持下去的脆弱的东西”,但它并不足以解决生活中出现的选择上的困境。在对责任和选择的实际结果有了这种新认识之后,亚历克斯说:“你不想去观察如何平等,而

想去看到人们将如何能够把握自己的生活。”尽管意识到对两种判断情境的需要,他还是感到这二者的结合是“难以完成的工作”,因为有时“无论你选择那一条路,都会有人会受到伤害,有人将受到永久性的伤害”。因此,他认为,“人们已经达到冲突无法解决的境地,”选择成为“选择受害人的事情”,而不是获得好处的事情。在认识到这种选择所包括的责任之后,他的判断越发地趋于与行为的心理结果和社会后果一致起来,并且与人们生存的实际历史环境相吻合。

因此,从迥然不同的起点出发,从公正与关怀的两种思想体系出发,在研究中,男女两性在走向成年的发展过程中,都对这两种观点有了更为充分的理解,因此也带来了更为分歧的判断。在认识到公正与关怀的两种情境之后,他们都意识到判断取决于建构问题的方式。

但是,这样看来发展概念本身也取决于构成发展的情境,当通过妇女而不是男人来描述成年时,人们也能够看到成熟观方面的变化。当由妇女来建构成年领域时,关系世界便呈现了出来,而且成为人们注意力的核心。麦克莱兰(1975)在注意到妇女权力想象上的这种变化的同时也观察到,“妇女比男人更关心相互依赖的关系双方”,而且“更迅速地意识到自己的相互依赖”(85-86)。这种对相互依赖的关注体现在把权力等同于给予和关怀的想象中。麦克莱兰报告说,当男人把强有力的行为表现为武断和攻击性时,妇女则把养育行为看成力量的化身。他在思考自己对于权力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成熟特征研究”的过程中强调说,成熟的男女可能以不同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发生关联。

妇女在权力上的不同趋向也是J. B. 米勒分析的主题。在对主从关系的关注上,她发现妇女在这些关系中的位置提供了

“理解心理秩序的一个决定性的关键环节”。这个秩序来自于不同的关系——男女之间以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建立起“作为媒介的家庭,正如我们所认识的那样,人们在家庭中形成了思想”(1976:1)。因为这些关系在多数情况下都包括了不平等的成分,它们也圈出了关系到权力运用方式的道德范围。在此基础上,米勒区分了暂时性和永久性的不平等,前者代表着人们发展的情况,后者表明了压迫的条件。在暂时性不平等的关系中,例如父母与子女,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中,理想地说来,权力被用于促进发展和消除最初的差异。在永久性不平等的关系中,权力稳固了统治和压迫,而且压迫通过“解释”自身有必要延续下去的理论合理化了。

米勒以这种方式关注人类生活中的不平等,她把妇女心理上的差异看成是她们在暂时性和永久性不平等关系中地位的综合反映。暂时教养关系中的支配地位随着不平等的消除而消失,但妇女却处于永久性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关系中。此外,尽管妇女的社会地位从属于男人,她们同时也被束缚在亲密而紧张的成年性关系以及家庭生活关系中。因此,妇女的心理反映了两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得以产生的道德可能性。所以理想地说来,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妇女来把握在人们联系中关怀与压迫的潜在可能。

这种不同的观察视角表明了 C. 斯塔克(Carol Stack, 1975)和 L. 鲁宾(Lillian Rubin, 1976)的工作。她们进入先前从男人眼里认识到的世界,然后回过头来给出一份不同的报告。在城市的黑人居住区,斯塔克在别人看来社会混乱和家庭无序的地方,发现了描述贫困黑人家庭组织的家庭交换网络。观察白人工人阶级家庭的鲁宾打破了“富足而幸福的工人”的神话,描述

了在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养家糊口的“痛苦的世界”。两位妇女都描述了维持家庭保护和关怀功能的一种关系的成年,也描述了维持经济依赖和社会从属地位的社会关系制度。因此,她们都说明了阶级、种族和人种如何被用于证明和合理化了通过牺牲一些人来使另一部分人获利的,永久性的不平等的经济制度。

在她们各自独立的分析中,这些妇女都在其他人看来混乱的地方——在妇女心理方面,在城市黑人家庭中,以及社会阶级的重新说明方面发现了秩序。为了得出能够赋予她们所看到的成年生活以秩序和意义的结构,这些发现需要一种新的分析方式,需要进行一种更具有人种特色的探讨。斯塔克在把“家庭”重新定义为“最小组织化的,日常生活中相互影响的亲属以及非亲属关系的人们所结成的持续性网络,它为孩子提供家庭的需要,并且保证人们生存下去”之后,她才能够在“公寓”世界里发现“家庭”。只有“对这些研究中出现的家庭、亲属、父母和朋友概念赋予特有的文化定义,随后的大量分析才得以进行……而以普遍接受的家庭定义则是武断和不可能的……它为理解如何描述公寓里的人们,如何秩序化他们生存的世界设置了障碍”(31)。

同样,米勒呼唤“一种新的妇女心理学”,这一理论承认妇女发展的出发点不同,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妇女处于、成长于和发展于依恋他人,与他人亲密结合的背景之下”,以及“妇女的自我意识更多地围绕着能够建立,进而维系的亲密结合和关系来组织”,“对许多妇女来说,亲密关系破裂的威胁最终并不仅仅意味着关系的损失,而且也被看成更贴近自我的某种东西的全部损失。”尽管人们目前通过精神病理学的描述已经熟悉这种心理

结构,但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心理的出发点包括了对生活及其功能进行完全不同的(更为进步的)探讨的可能性……在这种探讨中,亲密关系具有与自我提升相同的,或者更高的价值”(83)。因此,米勒提出一种成年心理学,这个理论认为发展并没有在价值上取代正在发展的依恋关系,并且强调关怀在关系中的持久意义。

在鲁宾的探讨中,同样也表现出先前衡量标准的局限性,以及一种更依赖于情境的解释方式的需要。鲁宾打破了家庭生活普遍相同,或者亚文化差异能够脱离各阶级社会经济现实来评价的幻想。因此,工人阶级家庭“自身的再生产并非由于他们有某种缺陷或者文化上的畸形,而是因为他们的大多数子女别无选择”,尽管“人们极为信奉流动生活的神话”(210-211)。因此,工人子女的暂时性不平等转变为工人阶级成年人的永久性不平等,造成破坏家庭生活质量的社会流动浪潮。

像描述妇女权力幻想的故事一样,对妇女成年的描述也揭示了一种对社会现实的不同感受。在关系的描述中,妇女以对爱情和工作中自我同他人相互依赖的表示来取代男人倾向于分离的偏见。妇女在把观察发展的镜片从个人成就换成关怀关系的过程中,也把正在发展的依恋关系描述为走向成熟的途径。因此,发展的范围朝着标明亲密关系的进程变化。

在对中年妇女的观察中,这种变化是明显的。在勾勒人们不熟悉的成年发展与人们熟悉的青春期分离和发展趋向时,中年妇女的生活易于表现为一个回到青春期末尽事业的时期。这个说明一直是特别有力的,因为生命周期的描述主要来自对男性的研究,并且已经形成一种看法,只要妇女的发展是不同的,她们的发展就是不足的。女性的发展偏离尤为表现在青春期,

这时女孩似乎通过以同他人的关系来定义自我,把认同和亲密关系混淆起来。这种认同定义方式保留下来一个自我——被视为软弱得难以应付中年期出现的分离问题的自我。

但是,这种建构揭示出以男性标准衡量妇女发展在解释上的局限性,以及对一种不同的真理可能性的忽视。如此看来,这一观察——妇女置身于关系生活中;倾向于相互依赖;把成就置于关怀之下,以及竞争成就方面的冲突给她们中年带来个人风险的观察,就更似乎是对社会的评论而不是妇女发展本身的问题。

按照青春期的概念来建构中年,正像认同与分离的危机一样,忽视了这期间所发生的事情的现实性,割裂了爱情与工作的历史。从妇女的观点来看,如果在这先前的一些年里养育孩子,那么生殖力从中年开始——正如维兰特的男人数据所表明的那样——对两性来说似乎都来得太迟了。同样,中年妇女孩子似的意象和对他人的依赖被养育和维系家庭关系的关怀掩饰起来。因此,问题似乎在于建构和判断,而不在于真理本身。

鉴于妇女的知觉和对社会现实的解释与男性不同的事实,鉴于这些不同围绕着依恋和分离体验的事实,人们能够期望必然关系到这些体验的生命转折以特有的方式把妇女包括进来,因为妇女的正直感似乎与关怀伦理紧密相联,所以把她们当妇女来看待就是在关系中看待她们,妇女生命中的主要转折似乎包括对于关怀的理解以及行为上的变化。从童年到成年的转折的确目睹了一个重要的对关怀的重新定义。当帮助和取悦之间的区分把关怀行为从希望得到他人赞扬中解放出来时,责任伦理也变成一种自我选择的个人正直与力量的依靠。

然而,中年发生的同样事件——绝经以及家庭和工作上的变

化也能以影响妇女自我意识的方式改变她们的关怀活动。如果中年结束了关系,妇女失去了依赖性的联系感,妇女借以评价自身价值的关怀活动便停止下来,那么伴随整个生命转折的哀怨便对自我否定和失望忧郁症作出让步。因此,对妇女来说,中年事件的意义反映出她的思维结构与生活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

当人们在过于敏感与现实冲突之间作出区分,把不情愿选择与无从选择的现实区分开来时,就有可能更清楚地看到妇女体验如何为把握成年生活的重要真理提供一把钥匙。如果不把女性解剖学看成势必给她留下的一块劣势的疤痕(Freud, 1931),人们就能够看到这种解剖学如何产生各种体验,它们解释了一种对两性来说共同的现实:在生活中你从未看到它、看不到的事物通过时间发生变化,有多种获得满足的途径,自我与他人的边界有时比看上去还不清楚。

因此,妇女不仅以不同于男性心理的历史步入了中年,面对这个时期在爱和工作上有着不同可能性的社会现实,而且对人类的关系知识也有了基于自身的不同体验。既然这种联系的现实是通过妇女的体验而不是自由的契约提供的,她们便对反映出自主性以及控制局限性的生活获得了一种理解。结果,妇女的发展描绘了一条不仅是更少暴力的生活道路,而且也是通过相互依赖和关怀走向成熟的道路。

在儿童道德发展的研究中,皮亚杰(1932/1965)描述了一个三阶段的进步过程,通过这三个阶段,压抑变成了合作,合作变成了宽容。在这一研究中,他指出学校里同一个班级,每天都在一起玩的孩子花费多长时间才能一致理解游戏规则。然而,这个一致标志着完成了行为和思想上的重要的重新定向,通过这种定向,压抑的道德变成了合作的道德。但是,他也注意到儿童

对他人与自我之间差异的认识如何导致在平等方向上的平等相对化,标志着一种公正与爱的融合。

目前在男女共同分享的成年中似乎只有一部分是相同的。在缺乏相互理解的情况下,两性关系以各种不同的压抑程度得以继续,显示出皮亚杰描述的“自我中心的似非而是”,一种对规则的神秘的尊重,这个规则把每个玩耍的人随心所欲地结合起来,而不关注自己邻人(61)。因此,一种生命周期的理解强调了成年关系的发展,这种关系以合作、宽容和关怀为特征,这种理解也必须既包括男人的生活又包括妇女的生活。

成年发展研究日程表上最紧迫的任务便是需要以妇女自己的语言描述妇女成年生活的体验。我在这个方向上的工作表明,把妇女包括进来导致对于发展理解上的一种新的关系视角,它改变了解释的基本结构。认同的概念也扩展到包括相互联系的体验。道德范围同样也由于把关系中的责任和关怀包括进来而得到扩展。基础认识论相应地也由古希腊的形式与心灵统一的知识理想转变为认识人们关系过程的圣经概念。

在男女成年表现出不同视角的情况下,有必要去研究说明这些不同对于婚姻、家庭以及工作关系的影响。我的研究表明,男女可能讲出他们自认为是相同的不同的语言,使用相似的词去编辑对自我和社会关系的不同体验。因为这些语言是相互涵盖的道德词汇,因此也就包括了一种系统地误译的倾向,造成妨碍交流的误解,限制了关系中合作和关怀的潜在可能性。然而,这些语言同时也是在彼此批判中产生的。正像责任语言提供了一种像网络一样的关系意象,用以取代随着平等的到来而消失的等级秩序一样,权利语言也强调在关怀网络中不仅包括他人而且包括自己的重要意义。

正如我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倾听男人的声音,以及以他们的体验来标明发展理论那样,我们现在也越发地不仅注意到妇女的沉默,而且注意到在她们讲话时听出她们在讲些什么的困难。然而,妇女的不同声音体现出关系伦理学的真理,体现出关系和责任之间的联系,以及在联系失败情况下攻击性的起源。人们之所以看不到妇女生活不同的现实,之所以听不出她们的不同声音,一方面是根源于这种假定,即只存在着一种社会体验和解释方式。通过提出两种不同的方式,我们更为复杂地再现了人们的体验,这种体验看到男女生活中分离和依恋的真理性,认识到这些真理如何通过不同的语言和思考方式来获得。

若想理解责任与权利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保持了人类发展的辩证性,就要看到这两种最终联系起来的不同体验方式的完整性。当公正伦理依据平等——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同样对待的前提发展时,关怀伦理也依据非暴力的前提——没有人应当被伤害来发展。在成熟的表现上,两种视角都集中于这样的认识,正像不平等对于不平等关系中的双方都产生不利影响那样,暴力对所涉及到的每个人都具有破坏性。公平与关系的对话不仅对两性关系提供一种更充分的理解,而且也给出成年人工作和家庭关系的一幅更为完整的图景。

正像弗洛伊德和皮亚杰要求我们去注意儿童在情感和思考上的不同,以便我们能够以更多的关怀和尊重对孩子作出反应那样,对妇女体验和理解不同的认识也扩展了我们的成熟观,指明发展真理的背景特性。通过这种视角上的扩展,我们能够开始展望通常描述的成年发展与开始被认识到的妇女发展之间的联姻,如何能够导致对人类发展的一种新的理解,如何能够导致对人类生活的一种更富有活力的理解。



译后记

1995年参加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之后，我感觉到我们对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还知之甚少，因而便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做点儿事情，可当我着手进行翻译时，最初发现本书时的那种欣喜若狂，联系出版社的那种急不可待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本较为难译的著作。在翻译过程中，我常有一种对一些问题纠缠不清的困惑；一种传递作者原意，甚至是睿智辩论和微妙躲闪的责任感。因而，我的内心无法随着这本译著的出版而坦然，我诚恳地希冀着各行的专家和读者对我的译文批评指正，这不仅是为了我本人学术的长进，也为了我们能够更深入、更完整地理解西方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

的一本最流行的必读书籍，解读和研析作为本世纪西方世界被引用最多、争议最大的女性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理论。我相信，我国的读者也一定会像西方的读者一样关注这本著作。

在这里，我首先要衷心感谢牛津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尼古拉斯·布宁博士，感谢他慷慨地从英国给我寄来本书的原著；我也十分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在授予本书中文版权过程中所作的积极努力；中央编译出版社副总编王吉胜先生连同他的同仁们为本书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我也表示由衷的谢意。

参考书目

- Belenky, Mary F. "Conflict and Development: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Impact of Abortion Decisions on Moral Judgments of Adolescent and Adult Women."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8.
- Bergling, Kurt. *Moral Development: The Validity of Kohlberg's Theory*. Stockholm Studies i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3. Stockholm, Sweden: Almqvist and Wiksell International, 1981.
- Bergman, Ingmar. *Wild Strawberries (1957)*. In *Four Screen Plays of Ingmar Bergman*, Trans. Lars Malmstrom and David Kushn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0.
- Bettelheim, Bruno.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In E. Erikson, ed., *The Challenge of Youth*. New York: Doubleday, 1965.

- . *The Uses of Enchantmen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6.
- Blos, Peter. "The Second Individuation Process of Adolescence." In A. Freud, ed.,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vol. 2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67.
- Broverman, I., Vogel, S., Broverman, D., Clarkson, F., and Rosenkrantz, P. "Sex-role Stereotypes: A Current Appraisal."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8 (1972): 59-78.
- Chekhov, Anton. *The Cherry Orchard* (1904). In *Best Plays by Chekhov*, trans. Stark Young.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56.
- Chodorow, Nancy. "Family Structure and Feminine Personality." In M. Z. Rosaldo and L. Lamphere, eds.,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Coles, Robert. *Children of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1964.
- Didion, Joan. "The Women's Movement."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uly 30, 1972, pp. 1-2, 14.
- Douvan, Elizabeth and Adelson, Joseph. *The Adolescent Experienc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66.
- Drabble, Margaret. *The Waterfall*. Hammondsworth, Eng.: Penguin Books, 1969.

- Edwards, Carolyn P. "Societal Complexity and Moral Development: A Kenyan Study." *Ethos* 3 (1975): 505-527.
- Eliot, George. *The Mill on the Floss* (1860).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5.
- Erikson, Erik H.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W. W. Norton, 1950.
- . *Young Man Luth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58.
- . *Insight and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W. W. Northon, 1964.
- .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W. W. Norton, 1968.
- . *Gandhi's Truth*. New York: W. W. Norton, 1969.
- . "Reflections on Dr. Borg's Life Cycle." *Daedalus* 105 (1976): 1-29. (Also in Erikson, ed., *Adulthood*. New York: W. W. Norton, 1978.)
- Freud, Sigmund. *The Standard Edit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trans. and ed. James Strachey.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61.
- .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1905). Vol. VII.
- . "Civilized Sexual Morality and Modern Nervous Illness" (1908). Vol. IX.
- . "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 (1914). Vol. XIV.
- . "Some Psych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Anatom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xes" (1925). Vol. XIX.
- .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1926). Vol. XX.

- .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1930/1929). Vol. XXI.
- . "Female Sexuality" (1931). Vol. XXI.
- .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1933/1932). Vol. XXII.
- Gilligan, Carol, "Moral Development in the College Years." In A. Chickering, ed., *The Modern American Colleg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1.
- Gilligan, Carol, and Belenky, Mary F. "A Naturalistic Study of Abortion Decisions." In R. Selman and R. Yando, eds., *Clinical-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Development, no. 7.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0.
- Gilligan, Carol, and Murphy, John Michael. "Development from Adolescence to Adulthood: The Philosopher and the 'Dilemma of the Fact.'" In D. Kuhn, e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Beyond Childhood*.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Development, no. 5.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79.
- Haan, Norma. "Hypothetical and Actual Moral Reasoning in a Situa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2(1975):255-270.
- Holstein, Constance. "Development of Moral Judgment: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Males and Females." *Child Development* 47 (1976):51-61.
- Horner, Matina S. "Sex Differences i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Competitive and Noncompetitive Situations."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8. U-

- niversity Microfilms #6912135.
- .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Achievement-related Conflicts in Wome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8(1972): 157-175.
- Ibsen, Henrik. *A Doll's House* (1879). In *Ibsen Plays*, Trans. Peter Watts. Hammondsworth, Eng.: Penguin Books, 1965.
- Joyce, James.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1916).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56.
- Kingston, Maxine Hong. *The Woman Warrio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7.
- Kohlberg, Lawrenc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s of Thinking and Choices in Years 10 to 16.”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8.
- . “Stage and Sequence: The Cognitive-Development Approach to Socialization.” In D. A. Goslin, ed., *Handbook of Socializ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9.
- .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Childhood and Adult Moral Development Revisited.” In *Collected Papers on Moral Development and Moral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Research Found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73.
- . “Moral Stages and Moralization: The Cognitive-Developmental Approach.” In T. Lickona, ed., *Moral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Theory, Research and Social Issu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6.
- . *The Philosophy of Moral Development*. San Francisco:

- Harper and Row, 1981.
- Kohlberg, L., and Gilligan, C. "The Adolescent as a Philosopher: The Discovery of the Self in a Post-conventional World." *Daedalus* 100(1971):1051-1086.
- Kohlberg, L., and Kramer, R.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Child and Adult Moral Development." *Human Development* 12(1969):93-120.
- Langdale, Sharry, and Gilligan, Carol. Interim Report to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980.
- Lever, Janet. "Sex Differences in the Games Children Play." *Social Problems* 23 (1976):478-487.
- . "Sex Differences in the Complexity of Children's Play and Gam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1978):471-483.
- Levinson, Daniel J. *The Seasons of a Man's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8.
- Loevinger, Jane, and Wessler, Ruth. *Measuring Ego Developmen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70.
- Lyons, Nona. "Seeing the Consequences: The Dialectic of Choice and Reflectivity in Human Development." Qualifying Paper,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80.
- Maccoby, Eleanor, and Jacklin, Carol. *The Psychology of Sex Differ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May, Robert. *Sex and Fantasy*. New York: W. W. Norton, 1980.

- McCarthy, Mary.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46.
- McClelland David C. *Power: The Inner Experience*. New York: Irvington, 1975.
- McClelland, D. C., Atkinson, J. W., Clark, R. A., and Lowell, E. L. *The Achievement Motive*. New York: Irvington, 1953.
- Mead, George Herbert.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 Miller, Jean Baker. *Toward 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6.
- Murphy, J. M., and Gilligan, C. "Moral Development in Late Adolescence and Adulthood: A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of Kohlberg's Theory." *Human Development* 23 (1980): 77-104.
- Perry, William. *Forms of Intellectual and Ethical Development in the College Year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8.
- Piaget, Jean. *The Moral Judgment of the Child* (1932).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5.
- . *Six Psychological Studies*. New York: Viking Books, 1968.
- . *Structur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 Pollak, Susan, and Gilligan, Carol. "Images of Violence in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Stor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2, no. 1 (1982): 159-167.

- Rubin, Lillian. *Worlds of Pai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 Sassen, Georgia. "Success Anxiety in Women; A Constructivist Interpretation of Its Sources and Its Significance."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50(1980):13-25.
- Schneir, Miriam, ed., *Feminism: The Essential Historical Writing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2.
- Simpson, Elizabeth L. "Mo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A Case Study of Scientific Cultural Bias." *Human Development* 17 (1974):81-106.
- Stack, Carol B. *All Our Ki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4.
- Stoller, Robert, J.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Gender Ident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45 (1964):220-226.
- Strunk, William Jr., and White, E. B. *The Elements of Style* (1918). New York: Macmillan, 1958.
- Terman, L., and Tyler, L. "Psychological Sex Differences." In L. Carmichael, ed., *Manual of Child Psychology*. 2n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54.
- Tolstoy, Sophie A. *The Diary of Tolstoy's Wife, 1860-1891*, trans. Alexander werth,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28. (Also in M. J. Moffat and C. Painter, eds., *Revelatio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5.)
- Vaillant, George E. *Adaptation to Life*.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 Whiting, Beatrice, and Pope, Carolyn. "A Cross-Cultural Analy-

sis of Sex Difference in the Behavior of Children Age Three to Eleve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91 (1973): 171-188.

Woolf, Virginia. *A Room of One's Ow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29.